

# 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 通讯

第7期（总第403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23年7月5日

- 
-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农业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陈之秀(1)
  - ◆ 学习施一公新著《自我突围》感言.....郭书田(5)
  - ◆ 大国小农背景下农业经营格局重构的长期思路.....张红宇(6)
  - ◆ 马克思主义乡村转型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刘守英 陈 航(10)
  - ◆ 论群学复兴.....景天魁(27)
  - ◆ 筑牢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孔祥智 何欣玮(47)
  - ◆ 大食物观：结构变化、政策涵义与实践逻辑.....程国强(58)
  - ◆ 诗画合璧传千载.....何 迪 郑 立(63)
  - ◆ 有了DHI，多产奶育好牛.....冯建伟(69)
  - ◆ 光皮楸木果食用油项目简介.....胡益文 姚 军(75)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农业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

## ——专访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陈文胜

陈之秀

近日，记者阅读了陈文胜的新作《中国农业何以强》一书，该书从中国之问、时代之问、现实之问、改革之问四个维度，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农业效益与粮食安全、农民增收三大重点，详细论述了“强不强”“怎么强”，并提出了新时期的战略重点以及如何激发动力等问题。记者阅读后，始终有问题在耳边萦绕，比如，为什么要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为紧迫的任务是什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何处突破？政府怎样助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等。为此，记者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问题，专访了著名“三农”问题专家陈文胜。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农业政策的改革和完善

陈文胜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彻底打破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预言，从根本上告别了食品短缺时代。伴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消费水平的快速提升，农产品消费进入结构转型期，主要矛盾由数量要求转变为质量要求，由总量不足转变为阶段性供不应求和供给过剩并存所呈现出的结构性矛盾。在此背景下，是农民的生产与市场脱节导致农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不平衡、农业的质量发展不充分，农业生产的规模与效益不平衡、农业的效益实现不充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利用不平衡、农业国际市场和资源开拓不充分的矛盾，造成供不应求与供大于求并存，农业呈现阶段性、结构性供需不对称的过剩特征。尽管农产品数量供给确实多了起来，但消费者满意的农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农业的多功能开发不够，难以适应市场消费结构转型的需要，导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低，人力、资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农业市场竞争力与效益难以提升。”

陈文胜表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基于阶段性的变化，主要解决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结构的问题，着力于少种点什么、多种点什么的总量平衡与数量满足，而是基于中国农业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重大判断，着力于实现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安全转变、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由政府直接干预向发挥市场决定作用转变、由单纯粮食安全战略向多重战略目标转变这样一个从田间到餐桌的深层次、全方位变革，是农业发展思路的战略转型。因此，“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系到中国农业的长远发展

陈文胜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全面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实现农业由总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确保农业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确保农民持续增收，确保农村持续稳定，关系到中国农业的长远发展，关系到乡村振兴的顺利推进。”

陈文胜从“农业结构优化”“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提高农业体制机制创新”“农业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作了进一步阐述。

一是实现农业结构优化。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结构升级、方式转变、动力转换的平台期，结构性问题成为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品种结构、品质结构、生产结构、经营体系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多个方面。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减少低端供给，拓展高端供给，这就需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以顺应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立足比较优势，调优产品结构、调绿生产方式、调新产业体系，优化区域结构，使大宗农产品突出优质，其他农产品突出特色，从而避免同质化，实现农产品差异化竞争和错位发展。

二是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以市场导向为关键切入点，从供给端发力，优化农业供给结构和资源配置，淘汰落后的生产模式，推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优化升级，使供给数量、品种和质量不断满足市场需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全面提升农业市场竞争力提供了主要着力点，即加快农业发展方式由“以量取胜”的低端路线向“高品质、高附加值、高盈利”的品牌路线跨越、由外延扩张型向内涵集约型跨越、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跨越。

三是加快农业体制机制创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一次广泛的生产力调整，也是一次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关键在于完善体制、创新机制来释放活力红利，以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解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问题，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因此，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通过变革体制机制来破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为目标、以适度规模经营为抓手的体制机制。

四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一些地方为了追求农业增产，过度消耗土壤肥力和地下淡水资源、超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等，不仅造成产品积压、资源浪费，还引发了资源破坏、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一系列问题，不仅需要有效解决国内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更需要解决农业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实际问题。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迫任务，不仅要保障农产品供给确保粮食安全和增加农业生产者收入，而且要保持农业可持续性。主要是尊重农业发展的生态规律，维护生态资本，提高生态效益；立足不同区域资源环境条件，以严格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为前提；因地制宜明确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重点，以区域优势互补为目标，实现农业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 **农产品区域品牌化经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

对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陈文胜认为，实现由农产品规模化生产向农产品区域品牌化经营转变，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

陈文胜表示，农业生产过程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紧密结合的过程，那些品质优良、独具地域特色的农产品，是特定地域生态环境的产物，因而具有与生俱来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价值。

为此，陈文胜从“优化农业品种结构”、“特色品牌为导向优化农业区域结构”、“区域品牌经营为引领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三方面作了进一步阐述。

一是以农业地域资源环境为基准优化农业品种结构。农业生产过程是人类借助劳动手段利用土、水、光、热等自然资源，控制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有机体的生命活动，生产满足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

产品的过程。与其他物质生产部门不同，农业生产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受生物的生长繁育规律和自然条件的制约，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季节性、周期性，不同生物的生长繁育规律不同，各自要求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因此，生态环境的区域差异是农业生产地域分工的自然基础。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的土、水、光、热等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分布不同，决定了不同区域生产的农产品品种、品质存在差异。正是农业生产的这种自然规律，决定了什么样的区域生态环境生产什么样品质的农产品，是优化农业品种结构的主攻方向。

二是以特色品牌为导向优化农业区域结构。农产品生产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在特定的生态环境条件下生产的农产品都有其特定的品质。在中国各地，或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或经过人们对农产品品种、生产方式的不断探索，或通过与自然规律相适应的现代技术手段，去芜存菁，形成了众多品质优良、独具区域特色的农产品。这些农产品不仅形成于特定的生态环境，具有区域特定条件下独特的文化底蕴、工艺技术，而且是经过自然和人工手段优胜劣汰的，能适应或引领消费者对品质的需求，因而在市场上往往表现突出的比较优势。由于这种优势根源于“自然垄断”的区域生态资源，是其他区域所不能模仿的，因而也是最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品牌价值的。因此，什么样品质的农产品决定着什么样的市场品牌价值，就必然要求立足各区域品牌农产品进行区域分工，推动区域资源优势 and 生态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全面优化农业区域结构。

三是以区域品牌经营为引领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农产品的生产，取决于区域的生态环境和人们对生态资源的利用方式，对应的是特定农产品品种和人工培植手段。从区域生态环境来看，农产品生产的品种和品质取决于特定的生态环境，同一农产品离开特定的生态环境就会形成不同的品质差异；从人工培植手段来看，种养密度、规模、工艺等必须与生物的生长繁育规律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尽管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突破可以改造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产品的产出率，但前提仍然是遵循农业的自然规律，如果超越生态环境的阈值就会适得其反。因此，什么样的产地区域范围决定着什么样的品牌产品生产规模，盲目扩大产业规模必然会损害品牌农产品的可持续发展。不少地方农产品大面积滞销，要么是忽视地域资源承载力追求产能不断扩大；要么是超越地域范围盲目扩大产业规模。这类案例比比皆是，教训十分深刻，其启示就是：区域农业产业结构，必须遵循农业发展规律，以特定地域范围及其资源承载力为基准，走符合区域实际和市场趋势的特色道路。

### **政府工作的重点是破解农业资源要素错配与市场扭曲问题**

陈文胜认为，农业结构性矛盾实质上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失衡，导致农业供需结构失衡，这就要求破除制约供给瓶颈，畅通农业供需通道，以制度变革释放改革红利，激活市场活力、要素活力、主体活力，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使农业供给不断满足市场需求的变化。最为关键的是如何找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黄金结合点，既要完善产权制度，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又要进行政府职能转换的改革，清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行为边界，使有为的政府不包办一切，而首先成为公共事务的承担者、责任者。同时，更需要激活要素和主体，加快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市场主体的赋权与培育，不断增强市场对农业经营主体的行为主导性和对农业供给侧要素的配置能力与配置效率，以破解政府过度干预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滞后、经营主体行为扭曲导致的农产品市场供求不协调困境。

因此，政府应改变依靠行政手段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传统做法，着力改善市场环境、弥补市场失灵和提供公共品，也就是优化制度供给、政策供给、服务供给，充分发挥市场对结构性调整的决定性作用，

把不该管的“放”给市场，推动有效市场的形成与完善，而不是大包大揽去干预农民具体的经营行为和生产行为。重点是破解农业资源要素错配与市场扭曲问题，严格以“一县一特、一特一片”为农业长期政策的支持依据，规范政府对每个区域支持种植的品种和相应品质要求、以及限制和限期退出的品种，建立各区域农产品品种与质量的“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的约束机制，推进品牌认知、品牌营销、品牌推广以减少无效供给并扩大有效供给，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品种和质量不断满足市场需求，实现农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尤其是要注重需求端的市场体系建设，优质不能优价、增产不能增收是当下中国农业发展最突出的短板。在数字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需要强化政府对电商平台的有效监管，防止对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寡头垄断，导致对农民利益的剥夺。在城乡差距依然突出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迫切需要政府改变农业利润远远低于社会平均利润、农民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平均水平的基本现状。对农民而言，没有比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信号更直接激发从事生产的动力了，因为农业补贴再高也无法超越其在市场中获得的实质效益。一方面，需要推动乡村的农业向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转变，以扩大社会化服务规模来弥补耕地规模的先天性局限，并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另一方面，要把提质增效的农业科技创新摆在政府的首要位置，对鲜活农产品的储存保鲜，人粪畜粪的转化使用，特别是耕地的质量保护和农药化肥的减量使用，必须取得技术的不断突破，才能加快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推动地域特色鲜明、区域分工合理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建立，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本期人物】：**陈文胜，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央农办乡村振兴专家委员，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农工作专家组组长《中国乡村发现》主编，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湖南省中国乡村振兴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主要从事三农问题研究，出版著作有《中国农业何以强》《论大国农业转型》《论中国乡村变迁》《大国小村》《大国村庄的进路》《论道大国三农》《乡镇视角下的三农》《乡村振兴蓝皮书:湖南乡村振兴报告》《中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丛书)》等，其中《论大国农业转型》《论中国乡村变迁》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论大国农业转型》被翻译为英文和阿拉伯文、《大国小村》被翻译为哈萨克文正式出版。

**(作者：《食品界杂志》记者。来源：《食品界杂志》2023年第6期)**

## 学习施一公新著《自我突围》感言

郭书田

首先感谢5月23日收到杨红军同志从昆明快递寄来《自我突围》这本珍贵的好书。开封以后立即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用了三天时间（每天不超过二小时）细读了全部内容（300页），深受感动，获益匪浅。

施一公是当代著名的生命科学家与杰出的教育家，是当代中华优秀儿女的一面镜子，是青年学子学习的楷模。这本宏著，他以浓郁的笔墨，实实在在详细记述前半生的多彩经历，生动感人，留下了最大而又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部教育青年的好教材。

把祖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与教育强国，培养出世界一流人才，既是施一公宏伟意愿与大志，又是他一生的神圣责任与追求目标。为此他不懈地努力，排除难以想象的阻力与风险，毫无畏惧，自我奋斗，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收到显著成效。最为突出的是他依靠社会力量创办了世界一流的西湖大学，震撼中外，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这一创举将载入中华教育史册。

《自我突围》全书有一条红线，贯穿始终的是他的人生哲学——价值观与思维方式，这是最值得学习的核心。他现已进入“知天命”之年，前半生是辉煌的，相信后半生在攀登生命科学高峰与培养新一代世界级人才中创造出更加辉煌的跨越。他说，他的爷爷施平是他前行的后盾，这还是很重要的。施平是共和国老一辈著名的教育家，先后担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代校长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在教育战线上享有盛誉，功垂千古！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高级经济师。2023年5月25日）**

# 大国小农背景下农业经营格局重构的长期思路

张红宇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最大的变化是工业化、城镇化，而后是农业现代化。这个过程实现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这是非常重大的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最大的变化，从事农业的从业人员大大减少，但是农产品的产出不断增加，工业化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产生的“虹吸效应”，以及农村土地制度和经营制度创新对农村劳动力产生的“挤出效应”，正催生着一种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格局的形成。

## 一、相关数据背后的经济学分析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最大的变化有两个方面。

工业化、城镇化推动了农业 GDP 不断下降。1978 年是 27.5% 的农业增加值，2022 年的数据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公布，所以只能用 2021 年的数据，2021 年农业占比下降到 7.27%，这是非常值得观察的数据。这个过程中农业从业人员数量也在不断下降，1978 年全部农业从业人员占比有 70.5%，100 个劳动力有 70 多个是搞农业的，是种田的，是搞养鱼养猪的。现在农业从业人员占比下降到 22.9%。绝对的农业从业人员，四十多年前当时是 2.75% 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最高点是 2003 年从事农业的有 3.66 亿，到 2021 年下降到 1.7 亿。一个劳动力 44 年，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以上，2002 年到 2021 年共 19 年期间，绝对农业劳动力下降了接近 2 亿，每年减少 1000 万。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宏观效应，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移进城，促生了土地制度变革，使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成长，产生了土地规模经营。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超过 5.5 亿亩，流转率达 37%，土地的规模经营在形成之中。另外一方面服务的规模经营也在形成之中，到目前各类的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成长，家庭农场达 390 万家，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达 222 万家，合作社联系农户数超过 50%，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达 104 万家，服务面积约 19 亿亩次，服务农户超 8900 万户。

在这种情况下，四十多年最大的变化，经营方式已经由改革开放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下的“家家有地，户户种田”演变为到现在“家家有地，户户不一定种田”的基本格局。而这个格局背后有强大的理论支撑，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拥有承包权，但经营权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流转，三权分置这种经营格局基本形成。在这种格局形成下，促使了中国经济大大上了一个台阶。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二大板块，换句话说全球经济总量第二，来源于工业化、城镇化、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来源于由原来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演变为三权分置之下，土地经营权的不断流转。在这个背景下，农业劳动力显然有了快速增长，尽管到今天为止，农民的收入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还不那么高，全国劳动力在一二三产业就业比例由 1978 年的 1: 7.5: 4.5 提升到 2021 年的 1: 4.3: 3.5，表明农业生产经营有了规模化、专业化的基础。这个

现象要求我们继续减少在农业内部的农业从业人员。

由此出现了第三个情况，大量农民工由于工业化的“虹吸效应”，由于农业现代化的“挤出效应”，在城乡之间出现了2亿多的农民工，他们的身份，他们从事的职业发生了分割。从身份的角度来讲，他们还是农村户口，还是农村居民，但从事的职业99.5%是二三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讲，表现出他们的身份特征和职业特征。正是由于第三类群体，区别于城市群体，区别于留在农业内部的从业人员，他们亦工亦农，随时可以回乡种地，可以随时随着外部环境改变出去打工，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这类群体，我把称为第三类群体。而第三类群体使中国的工业化有了低成本的源源不断的源泉，这也是中国迅速由农业大国成为工业大国很重要的因素。

农村劳动力下降的数字，GDP变化的数字，背后揭示的是工业化，为什么我们能够成为全球工业门类齐全，最大的工业化制造大国，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以为跟农民、农业、农村的贡献高度相关。

## 二、农业经营方式演变的实践规律

全球现代化发展到今天也就两百多年的历史，但农业现代化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1900年有了蒸汽拖拉机，到现在农业经过一次革命，也就是机械带来的革命变化，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次革命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数字革命带来的第三次革命性的变化。三次革命对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全球来看，合作社+家庭农场成为农业经营的主流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发达国家农业经营方式变迁的共性越来越明显。

全球农业到了今天，上千年的变化，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在工业化、城镇化之后，农业现代化不断蓬勃发展，按照总书记的话讲，这是一个串联式的过程，先有工业化，而后城镇化，再有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到今天一百多年，生产关系怎么样适应生产力的变化，我以为有如下几个方面非常值得观察。

全球农业经营。发达国家农业经营，农业强国的农业经营，是采取家庭经营的模式，家庭经营模式的规模越来越大。我去了瑞典、丹麦、美国调研，数据更具有真实性。瑞典1900年家庭农场有51万家，到最近是6.7万家，相应的平均规模由原来的39公顷扩大到2015年的46公顷。丹麦1903年有家庭农场26万家，到1964年减少到17.5万家，到2015年再减少到3.8万家，相应的平均规模则由1970年的21公顷扩大到2015年的70公顷。美国家庭农场从1953年的681.4万家下降到1990年的215万家，平均每年减少8万家，2016年美国农场总量再度减少到206万家。

这些年家庭农场扩张，包括农民合作社经营面积扩张，土地买卖的现象越来越少，而土地租赁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为什么？因为买卖土地的价格太低，原来的老地主不愿意卖掉土地。反过来，无论是美国也罢，欧洲也罢，土地价格相对较高，他们没有钱，不愿意买。一个不愿意卖，一个不愿意买，土地的租赁市场应运而生。在美国，无论是资源性的小麦、大豆、玉米，特别是水稻，家庭农场的表现越来越突出。我们以为原来西方所谓的家庭农场是耕耘自己的土地，其实现在是自有土地加租赁土地，等于家庭农场经营面积的总面积。在这个前提下，从美国来看，所占农场数量的比例从1935年的25%提高到2012年的54%，欧盟诸国此现象也普遍存在，租地现象越来越突出。

中国家庭农场为什么能扩张？合作社企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合作社数量在减少，但是单个合作社的规模在扩张。为什么？要求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保障供给链、完善利益链，这个过程中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让从事农业的从业者收入有所增加，获得社会平均利润，要求合作社的规模，由原来的单一产业分工向综合产业迈进，由原来的聚焦农业终端产业向产前和产后加工、营销、储备各个方面延伸，而且这种现象发展到今天，跨国型的农民合作社在西方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荷兰、丹麦、法国、美国都有跨国性的农民企业，这种农民企业更多表现在乳制品、畜产品等特色产品的产出。合作社企业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在座的各位，今天我们的合作社企业化倾向也越来越凸显。

国内表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显然有中国自身的国情，有自身的农情，但是显然也绕不开现代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由于这种发展的结果，我以为现在全国的农业经营方式绕不开家庭农场+合作社+社会化服务模式，这个模式是现实存在的，也是未来的方向。

在这个前提下，国内的表现怎么样？

家庭农场规模不断扩大，现在家庭农场已经达到 390 万家，无论怎么样，家庭农场在成长过程中，它的面积是在不断增加的，所以典型的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什么叫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四个核心——家庭经营、规模适度、一个产业为主、集约生产。

经营规模越来越大，中化集团的数字是不错的。

社会化服务作用日趋凸显，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建设农业强国，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需要组织农民，帮助农民，提高农民，发展农民，富裕农民。在此目标任务下，国有、民营企业及农民自主创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蓬勃发展，体现出服务产业多元、服务方式多元、服务主体多元和服务对象多元的多元化特征，促进了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区域化大发展。2022 年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 104 万个，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面积 18.7 亿亩次，带动小农户超过 8900 万户。

企业进入农业现象突出。供销合作社系统，2022 年供销合作社全系统生产性全程托管服务面积 8657 万亩，同比增长 25.6%；配方施肥、统防统治、农机作业等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 6.42 亿亩次。2021 年全系统销售总额 6.26 万亿元，化肥销售量占全社会用肥量比例超过 70%，实现农产品销售额 2.76 万亿元；截至 2021 年底，全系统建设运营农产品市场 4485 家。中化集团着力打造 MAP 模式，截至 2022 年底，中化集团在全国已建成 628 个 MAP 技术服务中心，提供农业生产性托管服务，发放金融贷款，并推出智农、慧农平台，帮助农民提高产品品质，打造产品品牌。此外，各类大型民企进入农业势头迅猛。

### 三、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中国农业体系构建最重要的任务是努力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1、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继续促进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转移进城，分工分业，最大化减少留在农业内部从业劳动力。2、到 2050 年左右，使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下降至 5%，从业者数量减少到 3000 万以下。与此同时，更加积极地培育促进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各类农业企业快速成长，充分发挥他们组织农民、帮助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的作用。

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把握“三权分置”制度内核，使经营权要在更大范围、更长期限内，以流转、租赁、入股等方式盘活土地经营权。在全力维护原承包农户权益基础上，促进形成“农地农用

农民用”转变为“农业农用全民用”格局。城里人种地也是一种宣传，农地农用，只要没有非农化、非粮化，谁来种地我以为都应该持欢迎态度。所以农地农用农民用，可以变为农业农用全民用。

构成多元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要成为农业的基本经营单元，合作社服务于农业从业者全部产业经营所需，纵向“从田间到餐桌”，横向由生产向生活、生态全方位转变。农业企业做大做强，在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区域品牌、企业品牌塑造上瞄准国际水平，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从长期思路看，中国农业经营方式是多元的。从一般经营形态观察，“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将是适应全国各地区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与此同时，在一般农户拥有承包权，并有回乡务农可能的前提下，培养一批专职农业生产经营的从业队伍，形成“家庭传承者兼业+外来从业者专业”的普适性农业生产经营格局。从这个角度来讲，山东金丰公司为每个农民提供全程服务，全程方案，这些人不是本村的人，不是本乡的人，甚至不是本县的人，他们是外来者。比如四川崇州有的农业服务组织，农民是从黑龙江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家庭传承者兼业+外来从业者专业”是一个大趋势。

认真研究中国当代以及未来的生产经营方式，“谁来种地”是绕不开的要认真研究的大问题，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怎么样在不丧失农民承包权，在严格保护农民承包权的情况下，认真地好好研究一下，“不在地承包者”的现象非常值得研究，如果放在西方国家叫“不在地地主”，这个在中国显然不合适，“不在地承包者”这个话非常准确，下一步怎么把这个问题研究透，并且使我们在全世界真正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农情、国情的现代农业经营方式，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来源：中国农网 2023 年 5 月 27 日）**

# 马克思主义乡村转型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刘守英 陈 航

**【摘要】**：城乡关系与乡村转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探讨了乡村的独特形态及其特性，并分析了城乡关系变化所引发的乡村系统转变，研究了影响乡村变革、引发乡村发展困境的作用机制，提出了乡村现代化的可能路径。马克思主义乡村转型理论对解决当下中国的乡村问题、实现乡村振兴有重要启示：第一，中国当下的乡村问题是城乡关系演变的集中反映，按照城市的逻辑重构乡村系统只会加剧乡村问题。必须重新思考乡村系统的独特性和内在逻辑，寻找乡村系统的复兴机理。第二，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动方法对中国乡村变迁的分析表明，当乡村生产关系变革适应生产力实际时，乡村制度变革绩效显著；乡村生产关系变革超越生产力现实时，则会加剧乡村发展困境。实现乡村振兴需要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第三，要依循马克思关于乡村现代化的路径深化乡村土地制度改革，促成农业要素的重新组合与持续升级，以实现农业工业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乡村转型、乡村系统、制度变革

## 一、乡村特性与转型困境

### （一）乡村形态及其特性

1、乡村作为一种独特的形态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乡村溯源角度论述了乡村作为一种独特的形态存在。乡村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特的形态，有三个原因。一是人类生存方式发生了从迁徙到定居的重大转变。“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随种种外界的，即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性质——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二是土地性质的变化。土地最初仅仅“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无须人类的协助便向人类提供食物等现成的生活资料。随着部落共同体实现定居，人类自然地将脚下的土地视为部落共同占有的财产，并且越发依赖土地提供生活资料，这使得土地由一般的劳动对象转变成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资料。为便于在土地上开展日常生产活动，部落成员通常在共有土地所决定的空间内居住，并依靠粗糙的工具（例如栅栏）将聚居点外围防护起来，以便保护土地并隔绝来自其余部落共同体的骚扰，由此形成了村落产生的基础。“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三是村落的出现。随着生产力发展、技术进步以及对生活资料生产技能的掌握，人类不再将全部劳动花费于搜寻食物，开始有了一定闲暇，能够利用木、石、韧皮纤维等天然材料制造生活器具并且建造房屋，出现了“定居而成村落的某些萌芽”。定居、土地具有了财产属性以及村

落的出现三个方面的原因使乡村成为一种独特的形态。

2、乡村的特性。作为独特的形态存在的乡村，承担着维系乡村在旧有经济条件下进行稳定再生产的功能，并具有了独有的特征。一是对土地的依赖。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农业生产为主，土地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农民依赖一定范围的土地而生，乡村成为进行农业生产以及农民赖以生活的空间。二是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经济活动。由于农业生产受动植物生长规律的支配，存在“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的不一致（后者仅仅是前者的一部分）”。这使得农民家庭在农忙之外存有闲余，可以兼顾手工副业，满足家庭生活以及村庄存续的日常需要。“农业部落、家庭公社或家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既包含农业劳动，也包含工业劳动。二者是同时并进的。狩猎、捕鱼、耕种，没有相应的工具是不行的。织和纺等等当初是农业中的副业。”三是提供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农业剩余以维系乡村社会。农民家庭依赖土地以及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可以通过劳动生产出家庭存续所需的一切生活资料，包括食物、织物以及工具等，基本实现自给自足。同时，农民家庭还通过赋税等手段向非生产人员提供一定的剩余，满足统治阶级的消费和享乐，用于“公共储备”或“支付共同体本身的费用”，以此支持大规模的灌溉、交通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以及政治、军事和宗教等活动。四是隔离与分散的村落形态。一定数量的人口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上从事耕作，传统村庄呈现隔离、分散的状态。“除少数较大的城市外，全国分解为村落，这种村落具有一种完全分离的组织，而且自成一个小世界。”由此可见，马克思勾勒的乡村的基本特性具有一般性，即乡村是一种以土为生、工农结合、自给自足、自成一体的结构，它具备“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农民保持着与土地的紧密联系，维系着农业为主、工农结合的生产方式，能够不断再生产出基本满足家庭存续需要的物质资料，其活动范围局限于村庄，使乡村保持了超稳定状态，确保了乡村社会的自我运行。

## （二）乡村变革的动力机制

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引起整个社会关系包括城乡关系的演变。这一系列变化虽然对乡村构成了革命性冲击，但也推动了乡村变革。

一是工农分工带来城乡分离。城乡关系最初是“无差别的统一”。早期的城市通过赋税等手段寄生于乡村之上，以各公社有限的农业剩余为生，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城市仅作为“经济结构上的赘疣”——单纯的消费集团而存在。随着农业生产力进步带来工农分工，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开始成为独立的劳动部门。恩格斯强调，“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工农分工所导致的城乡分离，引起城市和资本脱离乡村和土地实现独立发展。工业发展要求生产的集中，人口等要素的聚集带来工业城市的产生与发展，城市开始具备相对独立的产业基础，从单纯的消费集团向生产集团转换，减少了对乡村和土地的依赖。城乡的这一分离，不仅使得传统乡村工农结合、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发生松动，乡村居民开始接受少量的交换行为，与城市居民互换劳动产品以满足生活需要，还导致原本隶属于乡村的各种资源不断流向城市，从而影响乡村自身的持续发展。“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

二是不平等的权利导致城乡关系发生变化。随着生产力发展以及剩余产品的增多，私有制开始产生和发展，城乡关系由单纯的分离逐渐转向对立，城乡之间围绕物质利益不断爆发矛盾与冲突，这影响了乡村系统的运行，致使乡村结构被摧毁。在古典时期，农民集中于城市居住，按照军事方式组织起来以

保护乡村的土地财产，共同抵御来自外界的骚扰。此时的乡村附属于城市，耕地表现为城市的领土，连绵的战争导致乡村结构遭受破坏。到了中世纪时期，乡村统治强权对农奴的高度压迫致使农奴不断向城市逃亡，以寻求城市行会组织的庇护，从而引起城乡对立以及乡村反对城市的战争，乡村处于动荡之中。同时，乡村经济结构也受到城市工商业发展的冲击。由于货币逐渐取代实物成为普遍交易手段，乡村贵族开始向城市居民贷款并购买城市的产品，导致城市能够通过“它的垄断价格、它的赋税制度、它的行会、它的直接的商业诈骗和它的高利贷在经济上剥削农村”。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乡村因为“圈地运动”的冲击以及资本家对农民的剥夺而陷入无序状态，这使得“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做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

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乡村的根本改变。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大工业时期之前，乡村仍然存续着“古老朴拙的自然经济”，守旧的小农依然维系着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即便有部分农民兼营纺纱和织布，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与城市隔离的状态，只需将纱和布交付给流动代理商就能取得工资。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大工业的发展、机器的发明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乡村的侵入，彻底改变了传统乡村的封闭结构，使得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就业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切从农村旧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关系就会解体。”具体而言：第一，彻底割裂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一方面，放弃农业生产、转型成为城市织工是当时农民的理性选择，由于市场的扩大以及对布匹需求的增加，从事纺织工作的工资不断提高，部分兼业农民放弃农业，以便在织机上赚取更多收益；另一方面，机器在工业中的应用带来劳动生产效率普遍提高，缩短了生产工业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引起工业品价格暴跌，在市场竞争机制的影响下，乡村家庭手工业发生衰落，“最古老的封建的家庭工业也渐渐瓦解”，农民的生存来源只剩下农业。第二，农民服从于租地农场主的直接管理。农民遭受资本主的剥夺，同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相分离，只能沦为农业工人，从属于为了获取利益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租地农场主成了这种农业工人的实际指挥官，成了他们的剩余劳动的实际剥削者，而土地所有者现在只和这种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发生直接关系，而且是单纯的货币关系和契约关系。”第三，乡村发展完全屈从于城市发展。为服从城市和工业发展的要求、满足资本家开拓市场和扩大交换的需要，乡村不断为城市提供健康的劳动者及其所需的食物，为工业发展提供必需的原料与土地，为资本投资提供更大的空间范围，为工业消费品提供广阔的农村市场。由此，大工业的发展导致农村从属于城市，“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乡村和农民只能在城市和资本家的统治与支配下被动发展。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和乡村的渗透使得封闭且稳定的传统乡村结构出现松动，直至发生根本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具有不可逆性。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下，粗糙的手工业无法再与小块土地耕作彼此结合；留守乡村的农民转化为农业工人，进入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生产中，其劳动过程受到资本家的控制，不再仅仅为了自给自足；村庄遭受城市的统治和剥削，与城市进行频繁的物质交换，无法再维系封闭隔绝的状态。由此，乡村无法再生产出传统的乡土结构，只能走向新的发展路径。

### （三）乡村发展的困境

乡村向何处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乡村的渗透实现了城市和工业对乡村和农业的完全统治，这一冲击给乡村带来了结构重塑与转型的可能。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高度发达也为推动乡村变迁、实现乡村转型创造了充分的物质前提。当时的乡村发展存在两条路径：乡村

城市化和农业社会化。从乡村城市化角度看，尽管城市已经呈现资源集聚、交通便捷、市场集中、采购容易等优势，但乡村也能凭借成本较低、环境较好等条件与城市形成竞争。“今天优势在城市方面，明天农村的工资又降低到在农村开办新工厂可以获利更多的程度。”资本家在乡村成立新工厂，在工厂周围营建工人住房，带来人口、需求和资源在工厂附近的集中，使得工厂周围的住房、商店和市场也逐渐发展起来，“这种工厂乡村有许多已经变成了后来形成的整座工厂城市的中心”。从农业社会化角度看，工业发展进一步推动农业的变革，大片土地的所有权得以明确，土地被集中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并由农业资本家租种。在农业资本家的直接管理和持续投资下，农业开始按照社会化、集约化方式经营，能够大规模应用科技和机械，促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土地产量得以不断增加。“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

然而，以上两条路径都存在弊端。乡村城市化导致乡村出现和城市一样的弊病，农业社会化以破坏土地和农业劳动力为代价，农业持续发展受到阻碍。土地所有权归属于并不实际从事耕作的土地所有者，这会阻碍农业资本家对土地进行投资，限制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农民受土地所有者与农业资本家的共同剥削而出现境况持续恶化的状况。

一是乡村出现弊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乡村城市化的实质是将城市已无力解决的问题转移到乡村，从而疏解城市的压力，但这也使得乡村产生同样的问题。资源向城市集中本来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人口过度集中又会造成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基础设施供应不足等“城市病”，提高经营成本，影响资本的运行效率。这使得资本家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造就的大城市，重新迁移到乡村去经营，并将同样的生产方式复制到乡村，继续侵占农民土地以建造并经营新工厂，促使乡村演变成新的城市，乡村也就自然会出现“工厂城市所产生的一切弊害”。在乡村，更多的空间被卷入工业革命，更多的乡村劳动力进入工业并在劳动过程中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和榨取。资源、住房以及基础设施方面本就相对匮乏的乡村，难以适应“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过程中人口过度聚集带来的剧变。开辟街道、修建铁路等改造行为又进一步提高了住房的短缺程度，工人只能挤在贫民窟中，受环境恶劣、空气污染、卫生恶化、疾病肆虐的影响，劳动力遭到毁灭性破坏。

二是农业发展受阻。实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农业社会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但同时也会引发农业的发展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的应用，会破坏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发展，阻碍对农业的投资，影响农业的持续发展。第一，人与土地之间存在的必要的物质交换，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会破坏这种物质交换，进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为保持土壤的持续肥力，“人应当把取自土地的东西还给土地”。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将人口集中于城市，将农业转换为从属于工业、受资本支配的一个部门，只向城市单向输送粮食和原料以满足城市的生活需要和生产需要。这一过程割裂了城乡之间的物质交换，进而破坏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使得“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乡村的土地肥力下降，而城市的粪便污染则难以得到处理。第二，先进农具的应用迫使农业劳动者沦为机器的附属物，从而破坏劳动力的全面发展。受租地农场主逐利目标的影响，农业大规模地应用科技和机械以提高生产效率。这一变化推动了农业技术进步，促成了土地产量的提高，但也使得农业劳动者为了熟练操作农机而接受单一分工的训练。他们只能束缚于固

定的岗位、局部的职能和一定的工具，活动区域局限于乡村和土地，精神和肉体的发展基础遭到破坏，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被抑制，劳动力只能得到片面且畸形的发展。“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的手段、剥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贫穷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第三，土地归属于不从事农业也能得到地租的土地所有者，这将影响农业资本家的投资决策。发展资本主义农业需要对传统农业进行改良，包括集中土地、改良土壤、采用较好的农具、建设基础设施和农用建筑等。因此，需要进行较大规模的农业投资，其中部分投资会永久性地改良土地的物理性质。然而，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并不属于直接管理农业的资本家，因此，农业资本家难以获得农业投资所带来的全部好处，并且面临着土地所有者抬高地租的风险。这将会“限制租地农场主所进行的、最终不是对他自己有利而是对土地所有者有利的生产投资”，阻碍土地和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

三是农民状况恶化。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的租地集中、对先进农具的应用以及小租佃者和自耕农破产等现象，使得农业人口持续过剩，在加大农业工人竞争程度的同时也使得农业工资不断降低。第一，在集中的土地上大规模应用机械带来对农业劳动力的普遍节约，产生了大量农业过剩人口。“如果说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机器使工厂工人遭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损害，那么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过剩’方面却发生了更为强烈的作用。”第二，农业部门也服从市场机制的竞争规律，受到日益增长的竞争压力。占优势的大租佃者不断将小租佃者和自耕农从市场上排挤出去，致使小租佃者和自耕农接连破产，“使他们穷困潦倒”，只能被迫放弃自己的耕作，到大地主和资本家那里当雇农，从而壮大了农业后备军队伍。第三，城市工业发展放缓以及机器的不断改进使得城市和工业难以吸纳更多的乡村人口，这进一步推动了乡村失业人口的增加，加剧了农业工人的竞争程度。“工人彼此间的竞争达到了最高峰，而工资则降到最低限度。”然而，由于农业的自然属性，在农忙季节农业生产会短暂地需要更多劳动力，这又使农业陷入人手不足的困境。面对这种临时性、局部性的劳动力不足状况，资本家并不是通过提高工资吸引劳动力就业，而是迫使乡村妇女和儿童也大规模参与田间劳动。这使得工人的平均年龄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工人的竞争，工人工资再次下降。此外，曾经在传统乡村起作用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被资本主义制度摧毁，农场主不再为雇农提供超出雇佣关系的额外关照和保护，雇农遭受着地主和农业资本家的双重剥削，他们的处境不断恶化。雇农“不仅被迫加强了劳动强度，而且他们为自己进行劳动的生产范围也日益缩小了”。

可见，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击并撬动了乡村传统的封闭结构，终结了乡村的稳态和停滞；另一方面，囿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限性，乡村发展陷入困境。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资本主义制度的乡村问题“完全归咎于已经不适应当前情况的社会制度”，即当前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不再适应乡村生产力的发展，反而破坏了参与乡村生产的重要要素，影响农业的持续发展，致使农民的境况不断恶化，城乡差距拉大，城乡对立加剧。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消灭问题，而是将问题转移到其他的乡村，乡村为服从资本主义生产而不断陷入危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要真正解决乡村问题，必须彻底变革已经不适应乡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只有破除限制乡村各类要素进一步发展的制度障碍，建立新的制度，并彻底重塑乡村结构，使各类乡村要素和资源按照更加合适的方式进行组织，让乡村突破传统分工桎梏，将乡村居民从固有职

能和岗位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乡村转型。

## 二、乡村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用于分析城乡关系演变以及影响乡村转型的决定因素，为研究城乡转型提供了具有一般性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农业生产力进步带来工农分工，城市和乡村由无差别统一走向分离，传统乡村摆脱隔绝分散、自给自足的封闭格局。但是，由于城市具有要素聚集和生产集中等优势，乡村在城乡转型中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原始公有制因不再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状况而解体。随着农业剩余产品的积累，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乡村利益分化导致权利结构变化，城乡关系转向对立，这既阻碍了乡村生产力的发展，也带来了城乡交换过程中的不平等。

### （一）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影响

技术进步推动分工深化，带来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促成生产力的提高。“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技术变迁、生产力发展和分工之间的关系及其动态变化也反映在城乡关系和乡村变迁上。

首先，农业生产力进步是推动乡村变迁的基础动力。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重农学派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经济思想，强调农业对人类生存、社会发展以及乡村变迁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农业生产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必需的物质资料。人类生存发展和创造历史的基本前提是能够生活。最文明的民族和未开化的原始人一样，都必须首先满足吃、喝、住穿等基本生活需求。只有实现了生存保障，人类才会去考虑更高层次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历史的创造。“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另一方面，超过人类生存需要的农业生产力进步促进社会发展与乡村变迁。在农业再生产过程中，技艺会更加熟练，技术会不断进步，生产条件会不断改善，农业生产力将得到发展，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使“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不致全被直接生产者的食物生产占去”，农业剩余劳动和农业剩余产品得以出现。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身消费的农业剩余产品越多，从农业中释放出来的剩余人口就越多，农业人口向非农部门转移的速度和规模也就越大。这些现象对乡村本身、非农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经济都将产生深刻影响，从而推动城乡发展和乡村转型。

因此，农业部门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的进步成为推动城乡发展和乡村变迁的基础动力，从而影响整个社会（包括乡村）的财富增长和文明进步。“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全部社会的基础。”“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

其次，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既能促成工农分工，也会导致乡村孤立化发展。农业生产力的进步使得农业产出持续超过直接劳动者的日常需要，仅一部分劳动者的农业劳动就足以整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需的物质资料，其余劳动者可以不再进行农业劳动，而是单独从事非农劳动，依靠交换从农业劳动者手里获取食物，实现工业和农业的分工。然而，这也使得城乡关系由无差别统一走向分离和对立。“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马克思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了工农分工、城乡分离对乡村发展的影响：

一是随着工业脱离农业并向城市集聚，乡村经济逐渐被简化为农业经济。受工农分工、城乡分离的影响，手工业从农业生产的间隙中被剥离出来，不再仅仅作为乡村副业而存在。一方面，工业发展要求生产的高度集中，需要“劳动力更加集中、更多地利用自然力、大量生产以及劳动资料等等的集中”，这就使得从事工业的劳动者以及投入工业的各类资源在城市不断集中；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工业的持续发展，“城市实业活动到处都对农村实业活动占优势”，致使乡村粗糙的手工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失去市场并逐渐瓦解。工业呈现向城市聚拢的趋势，乡村经济则逐渐走向单一，越发趋同于农业经济。

二是乡村居民受制于固定分工，经济机会仅限于农业生产。分工将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区分为不同的局部操作，并将各类操作分派给不同的劳动者。为了积累经验、实现熟练操作以提高生产效率，各个劳动者被长期束缚于固定的局部职能以及一定的劳动工具。城乡分离之后，“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社会居民第一次被划分为两大群体，即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乡村居民沦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只从事农业劳动，其生产依赖小块耕地和少量的农业劳动资料，生活范围被限制在一定的乡村空间之内，主要同自然和土地打交道，个人的全面发展受到阻碍。“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居民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

三是农业因资本与土地分离而回到传统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做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做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城乡分离使得资本能够脱离土地进行独立、自由的发展。在逐利目标的驱动下，资本会自发流向获益更多的城市部门。与此同时，农业部门自身的资本积聚仅在“狭小界限内进行”。农业中“资本的分散仍占优势”，能够积累的资金规模有限且积累速度缓慢。农民主要将农产品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并将其用于本人及家庭消费，除此之外的剩余才会作为商品进入城市贸易并换回少量的货币资本。因此，乡村能利用的资本有限，针对农业的投资处于极低水平，农民长期坚持“单凭经验的和刻板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乡村发展整体滞后，呈现“相对孤立化”的发展态势。

四是乡村因城乡生产力差距而陷入发展困境。工农业生产的技术要求不同，工农业发展所依赖的物质基础也存在差异。工业以资本的发展为基础，农业以土地的发展为基础，这使得城市和乡村在分工之后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得益于人口和资源的不断积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复杂的生产和交换，实现了“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带来了日益频繁的社会交往以及不断增长的国内外贸易。由于“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分工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交往的扩大反作用于城市，实现了资源的极大丰富以及资本的持续积累，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相比之下，乡村仍处于停滞状态，农民的人力资本没有改变，城乡生产力差距不断扩大。在不同的物质条件和分工水平下，城乡生产力发展始终处于非均衡状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后，城市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凡是大工业渗入的地方，“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

由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乡村内外矛盾激化，乡村陷入困境。一方面，城市及工业发展所需的历史条件，包括“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都建立在剥削乡村的基础上。乡村各类生产要素在市场作用和竞争机制的影响下向利润更高的城市部门流动，为城市提供了发展所需要的市场、资本和受压迫的劳动力，乡村自身则因为缺乏相应的物

质基础而发展受阻。另一方面，为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乡村屈从于城市统治，实现被动发展。虽然科技进步和机器发明在乡村和农业中得到应用，但这种发展却使得“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

## （二）制度作为生产关系的影响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相互交往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基本方面。生产关系的变革，尤其是原始公有制的瓦解和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引起了以所有制为核心的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林岗和刘元春，2000）。这使得物质资料占有方式发生改变，乡村和农业的要素结合方式也随之改变，乡村利益关系、阶级关系以及乡村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均发生相应变化，这些变化引发乡村变迁。

首先，所有制变迁改变了乡村和农业的要素结合方式。马克思将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划分为“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其中，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具体表现为参与生产的一切生产要素和物质条件。各类要素必须相互结合才能进行现实的生产活动，其结合方式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一般而言，所有制会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分工的发展以及经济条件的改变而演变。“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归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的一定关系。直到某一点为止，是再生产。然后，便转入解体。”一旦所有制改变，物质资料的占有关系就会改变，各类要素之间的结合方式也随之改变。

在乡村和农业中，所有制的变化会使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的变化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会改变旧有的经济条件，使各类生产要素和物质条件得到发展，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耕地。而且，农业劳动者本身也在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另一方面，能为新的要素进入生产提供可能。新的生产方式使原来无法参与生产的各种要素进入生产过程，新的交往形式有利于在更广阔的市场中获取更高级的新形态要素，从而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复杂程度。“农业越是发达，它的一切要素也就越是不仅形式上，而且实际上作为商品加入农业，也就是说，这些要素来自外部，是另外一些生产者的产品（种子、肥料、牲畜、畜产品等）。”因此，所有制变迁不仅改变了传统要素，还吸引新的要素参与生产，提高了要素复杂程度，为要素结合方式提供了更多可行空间。乡村各类要素之间的关系发生重构，乡村资源在农业以及非农产业之间重新配置，劳动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也发生改变。

其次，财产关系变迁导致了乡村利益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对立。马克思认为，私有制的发展不仅会改变城乡利益格局，还会改变乡村内部的利益关系和阶级关系，乡村经济中第一次出现“私有财产的集中”以及“由此而来的平民小农向无产阶级的转化”。

从利益关系看，由于“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在不同的所有制关系下，城市居民、乡村居民及其内部群体对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或占有关系存在区别，这使得不同群体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存在差异。因此，各个群体最终实际获得的物质利益（财产）的水平和性质也有所不同。一旦所有制发生改变，原有生产条件下结成的利益格局也会变化，城乡之间以及乡村内部的利益关系也

随之调整。私有制的出现，改变了原始公有制下财产共同占有的利益格局，使得财产朝向某一群体及其所处空间集聚，从而产生城乡之间以及乡村内部的利益不平等。

从阶级关系看，阶级的起源和发展基于社会存在的物质利益，阶级之间的斗争、冲突和对立“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城乡之间以及乡村内部利益格局的变化，进一步使城乡之间或者乡村内部的阶级关系也随之改变，从而使城乡居民在物质资料的生产 and 交换过程中发生矛盾冲突。私有制的出现，带来城乡以及乡村内部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得相关联的阶级关系出现对立。这种对立在城乡之间表现为城市和乡村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关系，在乡村内部则表现为乡村统治阶级对农业直接劳动者的压迫和剥削，城乡对立成为影响乡村变迁的重要因素。

最后，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变迁影响乡村居民的经济行为。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导致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城乡阶级的对立。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并缓解因物质利益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会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机构，以“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这一过程将推动以所有制为核心的整个社会经济制度体系的变迁。生产和交往过程会形成新的激励和约束，改变人们彼此之间结成的依赖和制约关系，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

乡村受城乡不平等制度的影响，居民的就业和经济权利受到限制；同时，农民生产也受到制度限制，需要向统治阶级提供剩余劳动。一方面，乡村会遭受城乡不平等制度的影响。这些不平等制度包括中世纪反对封建制度、维护城市工商业发展的行会规约，资本主义时期实行的歧视乡村劳动者的就业制度等。“法律规定了城市和农村、计件劳动和日劳动的工资率。农村工人受雇期限应为一年，城市工人则应在‘自由市场’上受雇。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这些城乡有别的制度安排会限制乡村居民顺利进入城市和工商业，使其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经济权利和就业机会，乡村居民能够选择的有限，被束缚于乡村和农业。另一方面，乡村的内部活动也会受到制度因素的约束。农民的生产不仅需要满足自身以及家庭的再生产，还需要服从一定的制度要求并向统治阶级提供剩余劳动。来自统治阶级的压迫越严重，农民需要提供的剩余劳动就越多，农民的经济行为就越受限制。在中世纪时期，农民“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交纳实物贡赋以后”，还能生产一定的商品用于交换。到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制度的渗入使农民不断提高劳动强度，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都服从于农业资本家的直接管理。

由此，以所有制为核心所形成的制度结构及其变化，会改变城乡居民之间以及乡村居民内部的利益关系。受制于既定的利益关系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城乡关系，乡村居民拥有的经济权利发生改变，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从所面临的收益机制中获利的机会和程度也存在差异。这些新规则所带来的激励和约束将影响乡村居民的经济行为。在对各种选择进行决策的过程中，乡村居民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制约下实现自身利益，他们追求利益、维系自身及家庭再生产的行为推动了社会关系的变动，进一步影响城乡关系和乡村变迁。

### （三）技术和制度的互动

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要与以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适应。技术进步、

生产力发展要求采用相应的生产方式将参与生产的经济主体组织起来，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推动社会制度体系的变迁，这会进一步影响城乡关系以及乡村变迁。

首先，生产力进步、分工发展以及由此增加的积累促成制度变革，使得乡村只能在城乡对立的条件下发展。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改变了人们进行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形式，从而改变人们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与早期社会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以及有限的自然分工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为原始公有制。在匮乏的物质条件下，人类只能共同占有少量的财产和工具，从事有组织的采集或生产劳动，并且分享劳动成果。农业生产力进步和城乡分工所带来的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不仅引发了乡村和土地所能提供的粮食和原料数量的增长，还析出大量农业过剩人口并使其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生产。这促成了物质资料的积累以及剩余产品的增加，由此产生了剩余产品的分配问题。不过，原始公有制的局限使得这种分配往往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为了缓解分配过程中由于分配不平等造成的冲突，并对分配结果进行确权、占有和保护，必须执行普遍认可的准则与规范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因此，不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原始公有制逐渐解体，以私有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伴随着“积累的必然性”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由于城乡分工已实现城乡居民的分离以及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私有制的出现强化了对城乡财产的分割和保护，这就使得城乡在持续的社会交往中为了各自利益而不断爆发矛盾，产生对立。“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乡村只能在城乡对立的条件下发展。

其次，制度变革加剧城乡对立，阻碍乡村持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私有制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最初只是“作为一种反常的、从属于公社所有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直到资本主义时期，“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才开始占据统治地位，进而引起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私有制不断发展，使得城乡之间的利益冲突和阶级对立越发尖锐，城乡分离所形成的分工格局不断固化。乡村屈从于固定分工，主要承担粮食和原料的生产功能，只能获得“片面的发展”，整体生产力发展受到制约。乡村生产是片面的，因而其生产成果也是片面的。然而，乡村居民对衣、食、住等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是全面的，所以，城乡居民之间必须进行交换，而偏向城市和工业的制度安排使得乡村因为不平等交换而遭受损失。马克思引用斯密的观点，认为城乡交换实质是“一定量的原产品同一定量的制造业产品交换”，城市通常会采取一定的制度和措施，例如“加在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上的一切约束和限制”，以促使制造业产品卖得更贵。这样，乡村就需要用蕴含更多劳动量的土地原产品进行支付，乡村剩余就通过城乡交换流向城市，这制约了乡村和农业的发展。“凡是在一个国家里能提高制造业产品价格的东西，都会降低土地的原产品的价格，从而使农业发展缓慢。”

最后，制度和技术对乡村变迁的影响具有阶段性。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在每个经济时期，适应技术发展和生产力进步的生产关系，会带来生产要素结合方式以及劳动技术和组织形式的改进。旧有的物质条件和生产要素得到发展，为新要素进入生产提供了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了经济主体的发展需要及其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随着统治阶级为巩固既得利益格局建

立起相关制度安排，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情况被固化，生产的劳动方式转变受到制约，社会发展新变化与现有分工形成矛盾，引发了利益对立和阶级矛盾，不利于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负向阻碍作用就显现出来。推及至乡村变迁，各个阶段的生产关系对乡村生产力的影响也呈现先促进后阻碍的“倒U型”变化，从而影响城乡关系和乡村发展。如图1所示：在促进阶段，制度适应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得到发展，乡村发展迅速，乡村与城市的生产力差距缩小，利益冲突或阶级矛盾尚未激化，城乡对立虽在私有制条件下已经存在，但发展较为缓慢；在阻碍阶段（自A点起），现存生产关系成为乡村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占据优势地位的城市为保护既得利益建立了城乡有别的制度环境，破坏了城乡交换的自然平衡，加深了城市对乡村的剥削程度，致使城乡对立日益尖锐，乡村发展受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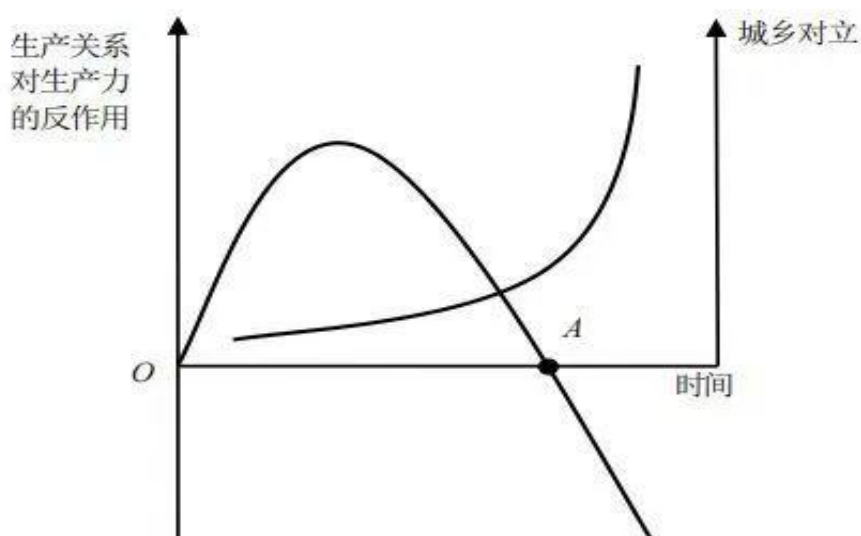


图1 各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对城乡对立的影响

（注：左轴表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水平轴以上的部分表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力起促进作用；水平轴以下的部分表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力起阻碍作用。各个阶段的乡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影响呈现先促进后阻碍的“倒U型”变化。右轴表示城乡对立的程度，生产关系促进乡村生产力发展使得城乡对立发展缓慢，生产关系阻碍乡村生产力发展带来城乡对立日益尖锐。）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表明，不同时期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使得乡村变迁呈阶段性变化。中世纪初期，农业的普及以及封建制度在乡村的建立使得乡村占据支配地位，实现了“乡村对城市的统治”，“工业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中世纪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城市手工业及其封建行会组织得以发展。行会制度造就了“城市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对农村的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优势地位”，使得在城乡交往过程中，城市能在经济上剥削乡村，通过“以较小量劳动交换农村较大量劳动”获取超额利润，实现城市资本的积累，城乡对立开始显化，乡村发展受阻。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代表当时最先进生产力水平和分工程度的工场手工业，最先在没有行会制度阻碍的乡村萌芽。这些乡村发展快速，逐渐变为城市，并且“很快就成为每个国家最繁荣的城市”。在大工业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带来城市和工业生产力的显著发展，使得农业屈从

于工业、乡村屈从于城市，城乡对立持续尖锐化，资产阶级凭借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加强了对乡村和劳动者的剥削。

### 三、乡村现代化的路径

社会现存的制度安排成为城乡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这使得城乡对立日益尖锐，乡村矛盾不断加重，乡村转型受到制约。如何实现乡村现代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其实已经为乡村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通过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来彻底铲除这些弊病的手段已经具备”，对不适合乡村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进行变革，破除限制各类生产要素尤其是土地要素持续发展的壁垒，在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条件下，重构城乡间的物质交换和要素流动，促成乡村各类要素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以更高级的形态和更合适的方式组织与联合起来，从而打破乡村的固定分工，有助于实现城乡、工农融合下的乡村转型发展。

一是乡村土地制度改革。作为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土地的占有问题关系着乡村的产业布局、农业的发展路径以及直接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乡村现存土地制度中占重要地位的两种形式——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均存在明显弊端，既不利于土地本身的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土地作为要素在乡村产业结构中的合理配置。

以土地被切割成小块、依靠家庭劳动并且缺乏投资为特征的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会产生对地力和劳动力的浪费，并且排斥现代农业的各种改良措施。第一，将土地切割成小块进行经营，会消耗土地的自然力，提高耕作土地的生产费用。小土地所有者通常仅将土地视为参与农业的生产工具，会根据个人的主观意愿或家庭的私人利益调整对土地的分割和利用，难以全面考虑这种分割和利用方式是否会影响土地本身的物理性质以及土地未来的发展状况。事实上，通过分割土地来调节生产也会影响土地和农业的持续发展，“土地的肥力随着土地被分割的程度而递减”，“耕作土地的非生产费用却按照这一生产工具本身被分割的比例而递增”。这就使得农民有限的生产资料只能被分散地使用，农民面临着“生产条件越来越恶化和生产资料越来越昂贵”的窘境，促成生产增长的各种需要难以得到满足。第二，将农民及其家庭束缚于分散的小土地范围内，造成了对人类劳力的巨大浪费。农民所拥有的小块土地通常存在一个限度，“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让他养家糊口的限度”。为了充分利用土地，并且保障土地的生产能够满足个人及家庭的日常需要，遵循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生产效率低下的农民及其家庭，必须将大量的劳动时间投入所占有的小块土地之上，由此导致对劳动力的极大耗费，使这些劳动力无法再参与其他部门的生产。由于土地是分散的，生产者也只能进行“孤立劳动”，日常往返于土地和定居点之间，只同自然发生交往，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发展有限。第三，缺乏资金以及小农自身的局限性致使土地不具备合理耕作的条件。一般而言，农民所拥有的资金有限，他们为拥有小块土地已经支出了一部分成本，“这其实是相应地减少了小农在他们的生产领域本身中可以支配的资本。这相应地减少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从而缩小了再生产的经济基础”，使得农民对土地进行持续投资、采用先进农具并应用科学技术的可能性降低，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某些地方，农民购买土地所支付的土地价格甚至会提高到农业生产难以进行的程度。“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

以土地的集中、大规模耕作以及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农业的繁荣，使得沿袭传统经验的农业经营方式转换为对先进农技和科学的普遍应用，但仍然难以实现农业的合理经营。马克思指出，农业经营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农业资本家无法同工业资本家一样，对生产过程进行“共同的、全面的和有预见的控制”。一般而言，参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物质要素包括各种动植物性材料、机器以及其他固定资本等。由于动植物性材料的生产和生长“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规律”，其投入数量无法完全按照农业资本家的个人意愿改变。而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等，却能够服从农业资本家的直接管理，只要花费一定量资本就能增加投入。因此，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投入的增加会相对更快，动植物性材料的投入会相对不足。但是农业生产需要依赖动植物性材料，机器等物资资料的投入增加，使得农业资本家对动植物材料的需求增加。这会使得对动植物材料的需求相较于它的供给增长更快，引起动植物性材料价格的上涨。动植物性材料的价格上涨一方面会导致相关需求减少，另一方面又会引起动植物性材料生产的扩大。这会促使人们从更远的市场采购原料或者使用其他有机原料进行代替，使得动植物性材料供给增多，甚至超过需求，由此又会引发价格暴跌，阻碍动植物性材料的再生产，再次影响动植物性材料的供给状况及其价格。如此重复变动，使得农业生产难以像工业生产一样实现资本家对生产过程的全面控制。“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此外，马克思还强调，在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基础上所实现的农业发展，不过是用来尽快增加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家的财富的手段，会破坏人与土地、乡村之间的物质交换，存在对地力的持续榨取和滥用，以及对农业劳动者个人发展机会的掠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两种土地所有制的展开形式尽管不同，但都体现了制度“对农业生产和对土地本身的合理经营、维护和改良所设置的这种限制和障碍”。因此，马克思认为，为了社会的利益，应该对土地制度进行变革，并且在不同的制度条件和生产力状况下采取不同的措施和手段。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决不采取暴力手段剥夺小农或者采取干预措施加速小农的灭亡，而是要通过示范或帮助将小农的私人占有和生产过渡到合作社的占有和生产，使小块土地结合成为大田庄，使小农能够进行共同耕种，并且按照“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与此同时，由于将土地结合起来进行大规模经营而变得多余的劳动力，可以在乡村从事工业劳动，不至于失去工作或者被迫集结于城市。在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将大地主私有的、由农业资本家管理的土地转变为“共同的、国家的财产”，将土地的直接使用和配置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能够使乡村和农业的生产服从于一个生产者阶级的统一指挥，从而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消灭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用于农业所带来的弊病。由此，土地占有和使用关系的变革，促使农业生产摆脱束缚，原来受土地小块化以及私有制限制而难以得到应用的科学进步和机器发明，将在新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农业生产方式中得到充分利用，联合起来的劳动者能在避免浪费地力和破坏人力的前提下，得到农业大规模、机械化耕作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乡村的产业结构也会得益于土地占有关系改变所带来的要素配置优化，从而形成更加合理的

布局，“农业、矿业、工业，总之，一切生产部门将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渐组织起来”。

二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互动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业发展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个别工业部门因为利用科技进步和机器发明而获取收益的行为，将会吸引其余工业部门相继效仿，从而推动工业部门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农业也直接或间接地获得科技进步、机器发明以及运输改善的益处，“一经形成的工业推动所带来的结果是无穷无尽的”。一方面，工业会对农业产生直接的带动作用，促使农业按照工业的方式进行经营。通过集中土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增加对土地的投资，广泛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改良土壤、使用先进农具、实行系统的轮作制等，并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农业生产者可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土地产量，满足日益增长的居民需要。另一方面，工业还会通过发展与农业相关联的工业部门，间接对农业产生推动作用。受益于工商业体系的不断完善，机器制造业、运输业、商业等与农业经济相关的产业部门也得以发展，大量劳动力通过从事“农业生产各要素的制造和输送”而间接参与农业生产，为农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这使得农业生产者能够更好地利用新发明的机械辅助工具，使用道路进行运输，从更远的市场购买便宜的机器和原料，并能雇佣到经过良好训练的农业工人。

随着工业对农业影响的不断加深，城市对乡村的带动作用也得以增强。城市可以借助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引导乡村走向新的发展路径。其一，以城市精神指导乡村。由于经济和政治集中于城市，代表城市的统治阶级通常会倾向于制定偏向城市的制度，这会使乡村被忽视，并因为要素流失而走向衰败。为破解乡村衰败困局，需要城市将乡村和农民整体囊括进发展规划，共同制定发展目标，发展起代表乡村利益的群体，注重乡村的权利保障和利益实现。“把农村的生产者置于他们所在地区中心城市的精神指导之下，使他们在中心城市有工人作为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其二，推动社会文明、消除乡村愚昧。城市的要素聚集和分工深化使得城市居民在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会经历复杂的社会交往和接触，这会引起城市居民的“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并促进个人的学习和发展，进一步实现整个城市文明的进步。因此，可以通过增强城乡的联系和交流，推动城市文明向乡村蔓延，逐步消除乡村长期只同自然打交道的落后和愚昧状态。其三，依靠城市解决乡村社会问题。受长期封闭、隔绝状态的影响，乡村存在局限性，难以依靠自身解决社会化、市场化冲击所带来的负面问题，需要依赖城市来破除乡村发展的桎梏。“社会机体的疾病，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疾病的真实性质和治疗的正确方法。”

三是重构城乡物质交换，实现工农结合和城乡融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下的生产力发展，以及工商业、机器和交通工具、世界贸易等的扩展速度和发展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私有财产和个人交换所能控制的范围，致使市场危机不断爆发，城乡对立日益加剧。因此，不仅要破除限制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桎梏，更要建立新的制度体系，促成“工业、农业、交换的共同管理”，使各类生产部门能以更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使各类物质要素在城乡、工农之间得以自由交换并且优化配置，以实现生产力在更大范围、更广空间的统筹布局和协调规划。具体而言：第一，要促进工业和人口在城乡间的均衡配置。一方面，要实现“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随着工业范围不断扩大，技术进步以及交通改善使得将部分工业转移到乡村进行生产和经营更具优势。这不仅便于“直接同原料的生产挂钩”，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和费用，还能帮助农业区建设起体现其禀赋优势的乡村工业，使



农民有机会就地就近参与工业经营、从事工业劳动，增强乡村的经济复杂度，促使乡村产业走向繁荣。另一方面，要促成“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通过工种变换和产业教育等方式使劳动者个人得到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能顺应社会需要并根据个人兴趣选择所从事的岗位和生活的地区，而不必局限于特殊的分工结构或特定的空间范围，从而实现劳动力在工农和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第二，要实现工农结合和城乡融合。马克思强调，只有消灭城乡对立、实现工农结合以及城乡融合，才能缓解现实世界中水、空气和土地的严重污染，重构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实现生产力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得到“田间作业和技术加工之间的有系统的紧密结合”所带来的一切好处。随着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逐步推进，在消除工农、城乡的差别之后，便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生产力的统筹规划，促成工农、城乡在更高形态上的结合，在“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的前提下将“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并促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紧密的联系”。

#### 四、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城乡关系与乡村转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探讨了乡村的独特形态及其特性，分析了城乡关系变化带来的乡村系统转变，探讨了影响乡村变革、引发乡村发展困境的作用机制，提出了乡村现代化的可能路径。马克思主义乡村转型理论对解决当下中国的乡村问题、实现乡村振兴有重要启示。

第一，城乡关系与乡村系统。马克思主义乡村转型理论将乡村视为一个系统，认为人类定居、土地的财产属性以及村落的出现使得乡村作为一种独特的形态而存在，乡村具有以土为生、工农结合、自给自足、自成一体的结构特征。城乡关系变化带来的是乡村系统的整体改变，工农分工、权利结构和大机器生产方式引发乡村结构的解体，城乡关系从无差别的统一走向对立，产生了巨大的城乡差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乡村城市化和农业社会化。但是，资本主导下的乡村城市化使得乡村出现了环境恶劣、空气污染、卫生恶化、疾病肆虐等“城市病”。农业社会化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使得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中断、土地肥力遭到破坏、农业劳动者技能单一化。资本化农业使得土地所有权向非农业经营者集中，地租上升侵蚀农业利润、机器排挤农业劳动、大农排挤小农，农业和农民状况恶化。中国当下的乡村问题是城乡关系演变的集中反映。中国拥有悠久的农业文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农工、农副互补，以及村庄的非正式关系使传统乡村形成了超稳定状态。中国共产党在重构乡村秩序、建立起国家体制秩序后，采用城乡二元体制和乡村服务于城市战略促成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也引发了城乡差距较大、农业发展滞后等问题。依循马克思对乡村变迁及乡村困境根源的分析，中国的乡村问题既是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之间生产力和财富创造能力差距的反映，也是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城乡差距加大的结果。改变乡村状况，既要弥合城乡生产力发展差距，也要改变导致城乡不平等的制度。如果简单按照城市的逻辑重构乡村系统，甚至继续将乡村作为城市的附庸，只会加剧乡村问题。因此，必须重新思考乡村系统的独特性和内在逻辑，寻找乡村系统复兴机理。

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认识中国乡村变迁。马克思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运用于分析城乡关系演变以及影响乡村转型的因素，为研究城乡转型和乡村变迁提供了具有一般性的分析方法。马克思认为，农业生产力进步是推动乡村变迁的基础动力。他同时也注意

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乡村孤立化发展，使乡村经济简化为农业经济，乡村经济机会单一化为农业生产，农业因资本脱离土地而回到传统生产方式。马克思强调，生产关系变革导致物质资料占有方式的改变，乡村和农业的要素结合方式也随之改变，乡村利益关系和阶级关系以及乡村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均会变化，从而引致乡村变迁。中国的乡村变迁受制度变革的深刻影响。传统封建地主所有制使得土地分配不均、主佃关系紧张，农业生产力发展受到限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将封建地主所有制变更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乡村秩序。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被认为难以适应国家工业化，因而国家开展了以集体所有制为特征的土地制度改革，改变了乡村制度根基。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生产和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内在缺陷挫伤了农民积极性，使得农业生产率增长缓慢、农民生活困难。为此，国家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民回归到家庭自主经营的结构当中，农业绩效明显改善，农村基层经济活力逐步恢复。中国乡村制度变迁的经验教训是：当生产关系变革适应生产力实际时，制度变革绩效显著；当生产关系变革超越生产力现实时，制度变革就会引发农村发展困境和农民问题。中国当下的农业生产关系面临新的变革，农民离土出村，农民的土地观念开始改变，村庄出现转型机会。如何在准确把握阶段性变化的特征下，推动新一轮土地制度变革，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与重新组合以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是当下乡村振兴的重大议题。但是，要避免重走封闭僵化的集体化老路，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关系变化情况，进行集体所有制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变革，积极探索适应时代要求的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明确界定由集体所有的资源的产权，避免出现以“私侵公”或“以权侵公”的情况。允许集体资源的多种经营形式，例如集体经营、合作经营和委托经营等，确保集体资源的经营收益由成员按份共有，避免不公平的分配。在组织农业生产时，需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权利，采取有利于改造小农和推动农业社会化大生产的制度安排，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成小农户与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建立紧密的企农利益共享机制，以克服传统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农场存在的弊端。同时，没有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乡村振兴。随着城乡互动的增强以及居民需求结构的转变，农业的内涵和功能也随之转变，农业由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具有生态、健康、休闲、文化等多种功能的复合型农业，农业产业链条延长、一二三产融合形态正在形成，农产品供给由低复杂度向高复杂度转变。这些变化孕育着农业产业革命。因此，必须适应需求转变以及农业发展新阶段，开发农业多种功能，促成农产品价值链的延伸。把握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变化新特征，通过加快农技进步和改进现代要素投入效率，有效规避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收益受损，提高农业报酬率，降低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提高农业竞争力。

第三，探索乡村现代化的可行路径。马克思设想了乡村现代化的路径：一是针对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的弊端，分别采取不同措施和手段推进土地制度变革；二是工业与农业互动发展；三是城乡融合。马克思关于乡村现代化的路径设想为中国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指引：

其一，乡村土地制度变革为乡村现代化奠定基础。土地制度是中国最为基础和根本的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乡村现代化的突破口。需要依据现有条件和生产力状况，进一步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一方面，持续推进农地制度改革。农民大规模离土出村使得集体所有权的行使和维护存在困难。需要明确集体所有权的权利内涵和边界，解决集体所有权、农民承包权以及土地经营权的关系模糊问题，以避免集体的权利受损。同时，加强对承包权的保护，探索农民自愿退出承包权的机制，并在

新主体进入农业后重视对耕作者权利的保障，平等保护耕作者通过流转合同取得的土地经营权，以实现农地使用和投资预期的稳定。另一方面，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制度。由于现行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制度改革滞后，乡村人口大规模转移带来农房和宅基地的闲置、村庄的破败。城乡互动增强使得人口和资本向乡村回流，新的居住需求和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用地需求要得到满足。需给予乡村更多用地权利，完善集体建设用地转让、出租和抵押的权利，允许农民和集体组织利用集体建设土地从事非农经济活动，以释放乡村产业发展活力。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宅基地权利，推动宅基地使用权向外来人口和资本有序开放，显化宅基地和农房价值，实现农民宅基地和农房的财产权益。

其二，实现农业工业化。依赖单一要素的数量增长或质量改进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根据要素成本收益结构变化促成劳动力、资本、土地、服务、技术等各类要素的重新组合与匹配，才能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带来农业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以及农业收益的增长。为建设有竞争力的农业，必须打破农业要素组合锁定，进一步完善农业要素市场，促成各类要素充分流动，持续优化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增加机械、服务或技术等现代要素投入，降低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并保持现代要素和传统要素的适度配比和协调一致，推动要素投入由数量增长转为组合适配，促进农业工业化。

其三，实现城乡融合。城乡互动增强使得资本等生产要素向乡村输入，城乡融合阶段已经到来。然而，仍存在一些阻碍城乡融合的因素，影响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配置。需要改变单向城市化或乡村突围思维，推动人口、产业等在城乡间的重新布局，促进城市权利向农民进一步开放，赋予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教育、养老等权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权利体系，改革征地制度，实现土地收益在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公平分配，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条件下促成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享有同等权利，鼓励使用者利用自主开发、转让、参股、租赁等多种形式开发集体建设用地；完善农村金融制度，健全社会资本下乡政策，降低要素城乡流动制度成本，吸引各类要素进入乡村，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作者：刘守英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陈航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23年第3期）**

# 论群学复兴

## ——从严复“心结”说起<sup>1</sup>

景天魁

1903年3月25日，严复在《群学肄言》译后感叹道：“惜乎中国无一赏音”，“吾则望百年后之严幼陵（严复字幼陵——引者注）耳！”。<sup>2</sup>现在，距离先生1921年逝世（“百年”）都已近百年了，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并力图解开他的这一“心结”呢？依笔者愚见，严复译介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一书，正值甲午战争惨败不久，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文化自信丧失殆尽之时。严复译书的初衷，本是希冀借西学之火种，让群学成为团结人心、鼓动民力民智的火炬，却眼见得西学之涌入大有湮没群学之势，故而感叹。果不其然，1903年之后百余年间，先是群学之“名”被“社会学”所取代，继而群学之“实”不仅鲜被提及，就连“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这样一个从来未被论证过的说法也被莫名其妙地广为默认为“定论”，以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学”早已不成其为一个话题了。

那么，到底“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学”？近年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史海拾贝，整理出了由4个基础性概念和30个基本概念构成的群学概念体系，<sup>3</sup>并进一步梳理出包括100多个命题的群学命题体系，据此证明了群学的历史存在性，论证群学即为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学或曰中国古典社会学。在这一研究基础上对群学有了几点新认识：1. 荀子不只提出了“群”的概念，也不仅创立了“‘群’论”，而是创立了“群学”；2. 群学既与西方社会学在内容上“相合”，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质；3. 群学作为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之学，既包含了解释中国社会之所以繁盛绵延的密码，又内藏着促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因；4. 群学虽是“旧学”，但在当代和未来堪当大任，负有新的重大使命，因而必将复兴。

### 一、群学正名

断言中国社会学只是“舶来品”，只能以严复译书《群学肄言》为“开端”，这就等于认定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一百多年来，这一陈见未经过任何论证竟然成为不易之论，以至于以采纳成说为原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非常肯定地断言，西方社会学的引入“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的开端”。<sup>4</sup>然而，中国社会学的开端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科史上的考证问题，而是与中华文明和中国学术的起源和特点、社会学产生的条件、社会学的性质和功能、以及这个学科在中国能否崛起等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

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学？第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当是严复。当他接触到西方社会学，开始译介斯宾

<sup>1</sup>此文曾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5期。后经作者做了补充修改，作为六卷本《中国社会学史》的总序（第一卷：群学的形成，已于201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sup>2</sup>严复：《译〈群学肄言〉有感》，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sup>3</sup>景天魁等著：《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sup>4</sup>社会学卷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塞的《社会学研究》时，肯定思考过中国有没有类似的学问呢？他决意将该书译为《群学肄言》，将“社会学”这门学问追溯到战国时代荀子的“群学”，建立起如此久远的历史关联，一定是有原由的。试想，严复译介斯宾塞，正值中国人文化自信顿失之时，若按一般识见，哪里还有底气搬出自己的祖宗去与西学相比附？当此情景，严复仍能请出荀子，足见其眼光之卓绝。此一作为，实际上就是肯定了中国古代就有本土的社会学。

严复在《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中，指明了他将“sociology”译为“群学”的理由：第一，字义相似。“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sup>5</sup>“群”和“社会”的字词含义，都是人群聚合。他列举近义词“邑”为证：“字书曰：‘邑，人聚会之称也，从口有区域也，从卩有法度也。’”西学“国”字的界说与中国字书的解释亦相似，由此“可知中西字义之冥合矣。”<sup>6</sup>

第二，概念义相合。严复所说的“群”，作为概念，就是西方社会学所谓的“社会”。他说：“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何以言之？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部勒，东学称组织。——译者注），祈向者，曰社会。’”<sup>7</sup>严复明确指出，荀子的“群”作为概念，与西方社会学对“社会”的界定是相符合的。由此“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

第三，学科义相同。严复明确指出了他把 Sociology（社会学）译为“群学”，是因为它们的学科意义相同。“‘群学’者何？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故锡彭塞氏（即斯宾塞——引者注）取以名其学也。”<sup>8</sup>严复直接用荀子关于群的论述，解释斯宾塞的社会学，说明他认为这二者在学科意义上是相同的。

第四，关于群学的学科性质和功用。严复认为：“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故肄言科而有之。”<sup>9</sup>在这里，严复明确肯定了“群学”具有相当于斯宾塞意义上的西方“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它不是如当时有些人从“群”“学”的字面意思所附会的学科“总汇”、“总称”，而是一个专门的学科。群学具有“诚正修齐治平”之功，是治世“之方”，这是它的功用，亦即中国本土社会学的特色。

第五，关于群学的学科地位。严复高度肯定群学（社会学）的学科地位，称其在诸种学问中，“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兴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呜呼！此真大人之学矣！”<sup>10</sup>那么，群学与其他学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在《国计学甲部》中，严复明确认为是“纲”与“目”的关系：“以群学为之纲，而所以为之目者，有教化学或翻伦学，有法学、有国计学，有政治学，有宗教学，有言语

---

<sup>5</sup>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黄克武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73 页。

<sup>6</sup>严复：译余赘语，严复译文卷，赫伯特·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年版，第 3 页。

<sup>7</sup>赫伯特·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严复译文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年版，第 3 页。

<sup>8</sup>严复：原强，黄克武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 页。

<sup>9</sup>严复：译《群学肄言》自序，黄克武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71 页。

<sup>10</sup>严复：《原强修订稿》，黄克武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8 页。

学。”<sup>11</sup>

既然严复肯定在荀子群学与斯宾塞所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元典之间，其字词义、概念义、学科义、学科性质和功用、学科地位都是相合相同的，那么，显然，他认为群学就是社会学，这就明白无误地肯定了中国古代有社会学。他说：“群学西曰梭休洛支（Sociology）。其称始于法哲学家恭德（孔德——引者注）。彼谓凡学之言人伦者，虽时主偏端，然无可分之理，宜取一切，统于名词，谓曰群学。”<sup>12</sup>

可见，严复并未因荀子和斯宾塞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不同、科学背景不同，而断言只有斯宾塞的可称“社会学”，荀子的只能叫“社会思想”。严复并未在“社会学”与“社会思想”之间挖出一条鸿沟，他用荀子群学解释斯宾塞社会学，用群学命名（斯宾塞的）社会学，明确肯定了“古人之学与西学合”，明确肯定了可以用中国之学解释西方之学，明确肯定了中国古典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是可以会通的。由此，严复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会通的道路，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的近代转型拉开了序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说，严复之译介西方社会学，非译也，创新也！他让刚刚移入的西方社会学接续了中国社会学的传统或“地气”，让当时渐失活力的群学传统焕发了新的生机。严复虽不像一些论者所说“是中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但确是中西社会学会通第一人，是中国社会学近代转型的开拓者。联想到当时对中国之学已开始弥漫的妄自菲薄情绪，联想到严复身后近百年来以西鉴中、以西代中的汹涌思潮，严复的贡献实在难能可贵！称此乃旷世之功，并不为过。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看出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相合”的中国思想家不只严复一人。<sup>13</sup>章太炎最以尊荀著称，他认为孔子之后唯荀子可称后圣，<sup>14</sup>他虽然从日本引入了“社会学”译名，却也发表了《尊荀》、《后圣》、《儒术真诠》等文章，“尝试将荀学与西方社会学合观”。<sup>15</sup>

梁启超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盛赞荀子是“社会学之巨擘”。认为“荀子以义为能群之本原”，“与欧西学者之分类正同”。<sup>16</sup>

刘师培认为，即使用西方近代划分学科的方法，也可以从“周末”（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学中，划分出心理学、伦理学、政法学、计学（经济学）、教育学等 16 个学科，其中，“中国社会学”赫然在列，居第四位。<sup>17</sup>他不仅从诸子百家之学中直接划分出“中国社会学”（可能是中国学者中最早正式使用此一学科称谓者），还曾尝试找到西方社会学与中国群学的结合点。

可惜的是，清末民初，西学大举进军中国，在中国军事上接连溃败、大清帝国不堪一击的同时，中国学术包括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更是丢盔弃甲，溃败得比军事更不堪一提。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迅速丧失，就连严复都顶不住压力，接受了从日本转口来的“社会学”译名。当此情景，谁人还会不识时务，去纠缠严复群学（以及他译介的斯宾塞社会学）与荀子群学的内在关联呢？辛亥革命后，一些

<sup>11</sup>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4 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 847 页。

<sup>12</sup>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4 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 847 页。

<sup>13</sup>康有为、谭嗣同对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都有自己的理解，也很有价值。但因学术界对他们使用的概念的含义有争议，为避免岔开本文的主题，这里暂不讨论。

<sup>14</sup>章太炎著、王小红选编：《二十世纪儒学大师文库·章太炎儒学论集》（下册），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71 页。

<sup>15</sup>陈昭瑛：人作为「类的存有」：荀子人文精神重探，儒学新浪·生命太极拳的博客转载（2016-01-15）<http://blog.sina.com.cn/u/2800456432>。

<sup>16</sup>梁启超：《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册，中华书局 1936 年版，总第 1317 页。

<sup>17</sup>刘师培著，李妙根编，朱维铮校：《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西书局，2012 年出版，第 189 页。

学人争相对中国传统之学自贬自损，“五四”后更是大加讨伐，竞相以自毁门户为能事。中国人对自己的学术传统自信心都没有了，群学与社会学的名实之争，也就不是被学术辩论解决了，而是被“政治”大势解决了，随着国运的衰颓而被丢弃了。

如果我们今天不再想从中国自己的“土壤”（费孝通语）即学术传统中生长出中国社会学，只是想把移入中国的西方社会学当作自己的“开端”，群学与社会学的名实之辨也就没有多大必要了。严、章、梁、刘的陈年旧案就没有再翻出来加以讨论的必要了。

这个重要问题在中国学术史上确实是长期“失忆”了。严复思考过并实际已经回答了的“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学”的问题，因尘封过久而被遗忘了。因被遗忘，整整 100 年后，严复译书《群学肄言》“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的开端”一说，竟然成为历史定论了。习惯成自然。自严复至今 120 多年，中国社会学界心安理得地“默认”了社会学只是诞生在 1838 年的西方，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的定论。

然而，在中国现代学者中，仍有敢于对此公开提出质疑者。费孝通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领导者，念兹在兹的一直是建设一种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的问题。而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中，他提出了具有振聋发聩作用的文化自觉概念，正是在此一概念下，他多次提到拉德克利夫·布朗 20 世纪 30 年代在燕京大学讲过“中国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这门学科”。费先生语重心长地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愿意作为这篇谈话的结束，找到这问题的答案也许正是我们中国社会学者值得认真思考并去追求的目标。我已年老，这只能作为我的希望留给新的一代了。”<sup>18</sup>费老在 2002 年，即他 92 岁时的那篇“继往开来，建设 21 世纪中国的社会学”<sup>19</sup>，尤其是他 2003 年的那篇学术生涯最后的长文“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sup>20</sup>，实质性地为后人指明了方向。

同样“提出这个问题”的，还有曾担任吉林省社会学学会首任会长的东北师范大学已故社会学家丁克全教授，他在 20 世纪 40 年代在日本学习社会学时，不仅“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做过论证。但他是如何论证的，笔者未见到确切资料。从有人对他的生平介绍中，可以推测他当时是从中日文的用词含义，论证中国古代已有“社会”一词，<sup>21</sup>但对“中国社会学”的内容是什么，未见论及。还有中国台湾的卫惠林教授，在其所著《社会学》一书中也明确地称荀子是“中国第一位社会学者”。<sup>22</sup>以上各位先贤均提出了穿透历史的卓越洞见。

到了今天，这一争论已经不是争其“名”——到底是叫群学还是叫社会学，这已经没有多大必要了，而是争其“实”，到底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学”（类似西方社会学的学问），它能否以及应否作为我们今天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必须追寻的学术史基础？更根本的，我们是否有必要以及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对于默认“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这里也暂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例如欧洲中心主义之类去评论，而是从纯粹学术的角度，认为这其实是学术研究上欠缺了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说清楚群学到底有哪些具体内容。如果根本不知道群学是什么，怎么可能判断它是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学呢？上述先贤尽管指出了荀子群学就是中国古代的社会学，但并没有阐明群学的具体内容，也就没有摆出可资证

---

<sup>18</sup>费孝通 1993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座谈会上的发言。以“略谈中国社会学”为题，收录于《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8-244 页。

<sup>19</sup>费孝通 2002 年 11 月 3 日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系 20 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收入《费孝通文集》第十六卷，群言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9-74 页。

<sup>20</sup>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载《费孝通文集》第十六卷，群言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第 147-174 页。

<sup>21</sup>回清廉：《回族社会学家——丁克全传略》，《回族研究》1992 年第 1 期。

<sup>22</sup>卫惠林：《社会学》，台北：正中书局，1980，第 17 页。

明的根据，这样，就致使不知者当然也就无从判断了。我们整理出了群学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不论在概念的阐释上、命题的表述上是否准确，总算有了一个评判的依据。尽管在西方社会学一方，“标准”也不一致，孔德、斯宾塞的社会学与后来的社会学也有不少区别，西方社会学至今也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范式”，甚至没有一个具有唯一性权威的定义，但是，以群学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在中西之间做比较总是可以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群学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的构建，是对群学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学的正名。以下从群学研究对象和领域、方法和特质等方面为正名提供证据。

## 二、群学要义

不仅仅荀子关于“群”的概念与“社会”的字词义、概念义相合，他还以群为核心概念，构建了群学的原初体系。换言之，严复将西方社会学译为“群学”，不只是找到了“群”这一个适切的翻译用词，而是肯定了群学这一学科的存在。

打开《荀子》一书，最直接讲到“群”的，首先是《王制》篇中的一段话：“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sup>23</sup>。然而，《荀子》全书不仅直接讲到分群、合群、能群、使群、善群、为群、利群、乐群、安群等，就是那些没有直接讲到“群”的篇章，其实也是与“群”密切相关的。关于群学的要义，涂可国将其概括为：“人而能群的社会本质论、能难兼技的社会分工论、群居和一的社会理想论和明分使群的社会治理论四个层面”<sup>24</sup>，很有见地；王处辉、陈定闾、谢遐龄、吴根友、庞绍堂和季芳桐、杨善民等在他们各自所著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一类<sup>25</sup>著作中都对荀学有专门论述，各有洞见，兹不一一介绍。笔者在《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一文中，将“群学要义”概括为“合群、能群、善群、乐群”。<sup>26</sup>做这样一个概括，准确与否、全面与否，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重要而且应当强调的是，我们努力将群学作为一门“学科”而不仅仅是作为“社会思想”来概括其内涵。<sup>27</sup>群学作为“社会思想”是并无争议的，而我们将群学作为“学科”却是直面了争议的焦点，翻了百余年来“旧案”，这一言说是有很大风险的。

为什么说“群学”可称为“学”呢？不仅因为其作为“社会思想”的丰富性，还因为其具有“学科性”。理由正在于群学概念体系的内在逻辑之中。这其实是严复和梁启超早已提示过的，即所谓群学与西方社会学“节目枝条”“暗合”<sup>28</sup>，“与欧西学者之分类正同”<sup>29</sup>。可惜他们对这一重要提示并未加以展开，群学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也一直不甚了了。如果说，作为一个学科的“学科性”，首先在于其是否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那么我们认为群学是符合这一“标准”的。

### （一）群学的研究对象与西方社会学“正同”

群学当然就是研究“群”。“群”既然是“人道所不能外也。”<sup>30</sup>那么“群”也就是“社会”。具

<sup>23</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127页。

<sup>24</sup>涂可国：社会儒学视域中的荀子“群学”，《中州学刊》2016年第9期。

<sup>25</sup>杨善民所著的书名为：《中国社会学说史》。

<sup>26</sup>景天魁：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sup>27</sup>至于“社会思想”与作为学科的“社会学”的区别，笔者在《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一书中曾经做过讨论，这里不赘。

<sup>28</sup>严复：《原强修订稿》，黄克武编：《严复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第37页。

<sup>29</sup>梁启超：《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册），中华书局，2015，总第1317页。

<sup>30</sup>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黄克武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3页。



体地说，荀子群学所研究的“群”主要是以人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所谓“以人伦为基础”，是因为“人伦”乃社会关系之“大本”。何谓“人伦”？荀子说：能够让不齐变得整齐，让弯曲变得有顺序，让不同得以统一的，就是“人伦”（“‘斩（不齐——引者注）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sup>31</sup>）。荀子讲的“人伦”，已经不是如他的前人那样停留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亲友这些表层的关系，也不是血缘、地缘、业缘、友缘这些“分类”的关系，而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社会名分。这样理解的“人伦”，也超出了一般所谓伦理道德的含义，而彰显了“群性”亦即“社会性”。孔繁认为荀子对社会的理解要比孔孟高明得多，<sup>32</sup>此可为一佐证。

“以人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相对区别于政治的社会关系、经济的社会关系、法律的社会关系、文化的社会关系等。但这种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粗略地说，与孔子长于教人、孟子长于议政、老子崇尚自然、墨子兼爱尚同相比，荀子长于知世治世，更加专注于社会关系和社会治理。正如梁启超所言：“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sup>33</sup>平心而论，荀子能够凸显出对于群性（社会性）的关注，在诸子百家中已数难能可贵。而最为可贵之处，集中体现在对群学要义的论述上。我们说，群学是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之学，而合群、能群、善群、乐群都是社会关系的不同形式和状态。

第一，合群是群性在“分”的基础上展开的初级社会形式和社会状态。它不是依靠动物性的本能而来的“合群性”，而是由“分”而来的社会性。“分”字在《荀子》全书中出现了113次，<sup>34</sup>是贯穿群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不论是作为“名分”、“职分”等含义，还是作为分工、分类、分配等含义，其表现的是最根本的“群理”：“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sup>35</sup>荀子又说：一个人不能同时掌握多种技艺，一人也不能同时身兼数职，必须分工合作，如果离群独居不相互依赖就会穷困，群居但没有名分等级就会争夺。穷困是忧患，争斗是灾祸，要救患除祸，没有比明确名分，使人们组成群体再好的了。（“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sup>36</sup>）

荀子认为：“明分使群”可以“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恣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sup>37</sup>如果按照字面含义，“分”与“合”是相反的，“分”可能是化解“群”的。然而，由于有分工，社会成员之间必须合作，必须“合群”。荀子在距今约2200多年前就洞悉了这个因“分”而“合”、由“合”而“群”、相反相成的道理，联想到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理论在其社会学中的基础性地位、涂尔干的第一本代表作即为《社会分工论》，将荀子的“明分使群”视为群学即其社会学的“第一原理”不为过矣。

第二，能群是在“义”的基础上达到的高一层级的社会形式和社会状态。荀子曰：“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

<sup>31</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51页。

<sup>32</sup>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39页。

<sup>33</sup>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3-44页。

<sup>34</sup>见陈光连：《荀子“分”义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sup>35</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142页。

<sup>36</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138页。

<sup>37</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51页。

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sup>38</sup>在这里，荀子是在群得以形成的机制这个意义上讲“义”的。“义”不论作为日常词语还是作为概念都有多种含义。而作为概念，它经过了从观念到行为准则和社会联结机制，再到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的演变过程。在荀子之前，“义”主要是在伦理观念的意义上表达“应当”、“正当”、“当然”等基本的含义；而在荀子之后，秦汉以降，“义”逐渐表现为社会制度，以及义仓、义社、义田、义学等社会组织和社会实体。而在荀子所处的战国晚期，“义”不但指社会生活中的规范，还代表社会阶层化的秩序。它作为阶层化的社会秩序，要求各人善尽自身角色的义务、职责和责任，服从长上的权威和社会等级秩序。<sup>39</sup>作为这一时期承前启后的大思想家，荀子的“义”概念成为一个上下接续的转折点，即把“义”从观念转化为“群”的社会联结机制。特别是在群学里，“义”的基本含义是明确“分”的准则，因为只有“分”得合理，才有秩序，才能团结一致，从而形成“群”。在个人，“义”决定荣辱：“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sup>40</sup>在家庭，以“义”“事亲谓之孝”，以义“事兄谓之弟”；而在国家，以义“事上谓之顺”，以义“使下谓之君”。<sup>41</sup>作为士仕者，尊义方为“合群者”<sup>42</sup>；作为君主，则可“义立而王”。<sup>43</sup>而在“天下”，荀子认为使天下富足之道全在明确职责名分（“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sup>44</sup>）正如耕种田地要划分田界一样，只有明确了职责名分，农民才会依据农时除草施肥，做好农夫份内之事；而促进生产，让百姓和睦，这是将帅之事；寒暑符合节令，让五谷按时成熟，这是上天之事；普遍地保护百姓，爱护百姓，管理百姓，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是圣君贤相之事。如此明分，即为治群之道。

荀子之谓“能群”是因“义”而明分，因“分”而能群。由是将“义”作为人们社会行为的普遍准则：“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sup>45</sup>如此，“义”就是维系社会关系的纽结。我们也可以说“义以明分”是群学的第二原理。

第三，善群是在“礼”的基础上达到的更高一级的社会形式和社会状态。如果说“义”主要是指行为规范和社会形式的内在方面，“礼”不论是礼制、礼仪和礼俗，则主要是外在的制度和规则，因为“礼”与“义”互为里表，荀子常常将二者连用作“礼义”；又由于“礼”对人的约束相对于刚性的“法”而言显得柔和一些，而其实“礼”“法”互通，因此荀子也常常“礼法”连用，强调“礼法”是纲纪（“礼法之大分”<sup>46</sup>）。正因为“礼”与“义”和“法”都有如此紧密的通连关系，所以“礼”在群学里居于至高的地位，“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sup>47</sup>不论是什么人莫不把“礼”作为最高标准。不论任何事、任何领域都要遵从礼，用荀子的话说，叫作“礼以定伦”：《荀子》首篇“劝学”即以明礼为学习的最高目的，以“亲师”和“隆礼”作为根本途径。“《礼》者，法之大分、类之

<sup>38</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127页。

<sup>39</sup>景天魁等著：《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下册）之第四章第五节“义：社会的基本规范”（高和荣、赵春燕、苑仲达撰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11页。

<sup>40</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42页。

<sup>41</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127页。

<sup>42</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76页。

<sup>43</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163页。

<sup>44</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146页。

<sup>45</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75页。

<sup>46</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179页。

<sup>47</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179页。

纲纪也”<sup>48</sup>。第二篇《修身》又讲“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sup>49</sup>“礼者，所以正身也”。<sup>50</sup>到了讲富国强兵，更是把礼的地位强调到极致：“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sup>51</sup>，“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sup>52</sup>处处都强调到无以复加的高度。

荀子强调，作为君主必须善群，而欲善群，关键在于谨遵“群道”，做到群道得当。群道得当，则万物就能各得其宜，六畜都能得以生长，一切生物可以尽得其寿命。荀子显然认为“群道”如同自然法则一样具有必然性，运用到人类社会，政令得当，则百姓就会团结一心，贤良就会心悦诚服（“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有，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sup>53</sup>而群道当与不当，决定于“礼”。

“礼”之所以居于如此高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定伦”。所谓“定伦”，首先是要定规矩。荀子曰：“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sup>54</sup>一旦设置好了，就没有人能进行欺骗了。

其次，“定伦”重在定名分和职责。“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sup>55</sup>“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sup>56</sup>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兄要像兄、弟要像弟，都是一个“礼”；农民要像农民、士人要像士人、工匠要像工匠、商人要像商人，也都是一个“礼”。

荀子讲“礼”，并不是绝对地只讲差序、只讲贵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承认差别，讲有贵贱，是为了形成秩序。虽有贵贱，但可以无偏贵贱。荀子曰：“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惟诚能之求？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如是，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sup>57</sup>如是则“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sup>58</sup>后来被指代表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并不是荀子提出的，而是到了汉代董仲舒才正式确定的，<sup>59</sup>虽然不能说与荀子没有继承关系，但处于战国末期的荀子志在总结几百年间战国纷争的经验教训，他不是只知强调“贵贱”“差等”，他的目的是强调秩序，实现“大治”，达到“至平”。诚然，荀子当年所讲的“礼”的具体内容是有阶级局限和时代烙印的，这些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改变而被克服和抹掉的，但“礼”的某些形式和功能是可以“抽象继承”的。不然，中国自古至今何以称得“礼仪之邦”？

总之，以“礼”定了规矩，也就定了名分和职责，这样就有了秩序，有了秩序才称得上“善群”。在这个意义上，群学就是“礼以定伦”的秩序之学，由此我们可以说，“礼以定伦”是它的第三原理。

<sup>48</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7页。

<sup>49</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15页。

<sup>50</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21页。

<sup>51</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250页。

<sup>52</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242页。

<sup>53</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127页。

<sup>54</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170页。

<sup>55</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126页。

<sup>56</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126页。

<sup>57</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176页。

<sup>58</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179页。

<sup>59</sup>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曾振宇注说《春秋繁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306页。

第四，乐群是在“和”的基础上达到的最高层级的社会形式和社会状态。首先，在群学中，“乐群”是有目标、有标准的。作为在“合群”“能群”“善群”基础上才能达到的最高层次，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乐群”是对“修身”“齐家”的最高要求；对群即社会而言，“乐群”是其治理要达到足以让人乐在其中的状态。这种理想状态怎样才能达致呢？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战乱纷争之后，人们体会到和平的可贵，故而以“和”为乐。出于荀子对人有欲、有欲必争，争则乱，乱则穷的社会过程的观察，他也深深体验到以“和”为乐的真谛。因而，“乐群”的目标就是“和”——“群居和一”。作为社会状态，“乐群”要达到的“标准”，荀子常用“至平”、“大治”、“大形”、“大神”来形容。而对于“天下”，荀子则用“和则一”、“四海之内若一家”<sup>60</sup>来表达“乐群”。“乐群”在中国和世界思想史上，是最早升起而永远指引人们向往追求的理想明灯。

其次，“和”是有前提、有条件的，也是要有办法和途径的。分可止争，不争则和；荀子曰：“调和，乐也。”<sup>61</sup>协调和谐，是乐的表现。怎么“调和”？要有“法度”。“法度”何来？“礼义生而制法度”<sup>62</sup>。荀子坚信：“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sup>63</sup>

荀子群学，虽然其强调等级名分的一面与汉初《礼记·礼运》篇所表述的“大同社会”并不合拍，但《荀子》中多次提到的“尚贤使能”、“无恤亲疏”、“无偏贵贱”，以及“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都为“小康”、“大同”思想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 （二）群学研究领域与西方社会学“暗合”

首先，群学的研究领域具有专门性。与其他学科相对而言，群学研究领域的专门性主要表现为基础性。所谓“基础性”是说合群、能群、善群、乐群是人们从事各种各样活动必须依赖的基础。欲要修身，重在合群；欲要齐家，重在能群；欲要治国，重在善群；欲要平天下，重在乐群。群是人们从事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各种活动的基本形式，换言之，人的各种活动都是在群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基础性是既渗透于又相对独立于各种各样的活动的，因而，群学相对于分门别类地研究社会的其他“学科”就具有相对独立的基础性学科的地位。荀子作为先秦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当然不仅仅创立了群学，在其他学科领域也多有建树，例如有的学者就对荀子在“名学”（逻辑学）方面的成就评价很高。但是群学创立者的这种跨领域、多学科的博学特点，并不能成为否定群学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理由。事实上，不论是孔德、斯宾塞，还是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他们的研究也都是跨领域、多学科的。

其次，群学研究领域与其他学科具有交叉性。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领域有所交叉，有所重合，是正常现象，不然，何来诸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之类的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

再次，群学关注的问题与西方社会学具有共同性。春秋战国时期，周代建立的礼乐制度已经崩坏，强国称霸争雄，弱国生灵涂炭，社会失序久矣，如何重建秩序，就成为群学的根本关切。荀子每每讲到群，都是针对“争则乱，乱则穷”的痼疾，希望找到破解之策，以定分至乱。可以说，合群、能群、善群、乐群全都是为了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这在宗旨上，恰与孔德 2000 多年后提出“社会学”冥想一处，尽管所处时代不同却问题相同，所“宗”（学术源头）不同而“旨”（意图）相同。不光是秩序问题，

<sup>60</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124页。

<sup>61</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218页。

<sup>62</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379页。

<sup>63</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30页。

荀子对群己关系、家国关系、治理问题、变易问题、制衡问题、天下问题的探讨，至少与孔德、斯宾塞时期的西方社会学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理论更为丰富；就是与经典的西方社会学相比，许多基本概念和命题也具备了，只是表现形态多为论辩式，而非叙述式；更为实用化，非纯学理化，表述形式不同而已。

最后，群学的进路与西方社会学具有相似性。荀子讲群学从劝学、修身切入，紧扣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论是讲群己关系、身心关系、身性关系、形神关系、天人关系，都是在讲如何培养合群性，亦即个人如何实现社会化。个人如何合群，也就是个人如何社会化。个人进入社会之后怎么办？要定分，按技能分工，按职业分层，按名分定序。涂可国认为荀子可能是“最早提出‘职业’范畴的人”，他非常重视职业分工对于社会秩序的调节作用。<sup>64</sup>事实上，荀子关于士农工商等的分层研究与今天的职业分层极为类似。荀子怎么分层？必须“制礼义以分之”，惟其如此，“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sup>65</sup>

荀子群学由“明分使群”而“义以定分”，由“礼以定伦”而“群居和一”，相应地开辟出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由治国而平天下的进路，这与西方社会学由个人而社会、由分层而结构、由组织而制度的进路异曲同工、何其相似，如果说有什么不同，恐怕只是另有中华文明的深厚意蕴在。对此，我们后面再谈。

由以上的论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论荀子在他所处的时代是否具有今天所谓的“学科意识”，尽管《荀子》一书不是按照单一学科体例编排的，但群学的实际内容却表明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上是可以与其他学科相对区分开来的，也与伦理学不同，与哲学并不属于同一个研究层次(后面还会谈到)，而与西方社会学的“节目枝条”“暗合”（亦称“冥合”），因此，说群学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是有理有据的。

### 三、群学特质

在所谓“学科性”中，“学科对象”很重要但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有很多交叉学科、综合学科可能共有相同或者相近的学科对象，但它们仍然是“学科”，对此这里不讨论。所谓“学科性”，除了要有确定的“学科对象”之外，还要有学科“视角”和“方法”，那么，群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是怎样的？我们认为，与西方社会学相比可以说是有同也有不同。

#### （一）群学的视角和方法

群学重视经验分析，善于历史比较，长于逻辑论证，承认在社会人事中存在着像自然法则那样的客观法则，这在先秦时期是难能可贵的。这些特点表明，其达到了比较高的“科学性”水平。

第一，荀子重视经验分析。面对复杂的研究对象，他擅长先划分为不同类型，然后做经验性的比较和分析。例如，荀子把“人臣”划分为四种类型：态臣（阿谀奉承的臣子）、篡臣（篡权的臣子）、功臣、圣臣。不仅用具体的经验性特征刻画他们的形象，还逐一举出“足以稽矣”即可以验证的典型：“故齐之苏秦、楚之州侯、秦之张仪，可谓态臣者也。韩之张去疾、赵之奉阳、齐之孟尝，可谓篡臣也。齐之管仲、晋之咎犯、楚之孙叔敖，可谓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sup>66</sup>荀子论述以“礼

<sup>64</sup>涂可国：社会儒学视域中的荀子“群学”，《中州学刊》2016年第9期。

<sup>65</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127页。

<sup>66</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209-210页。

义”“为人君”、“为人臣”、“为人父”、“为人子”、“为人兄”、“为人弟”、“为人夫”、“为人妻”，都不只是讲道理，还多有征引，使得“此道也，偏立而乱，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足以稽矣”就是说它们是经验事实完全证实了的。<sup>67</sup>

第二，荀子善于历史比较。他对三代以来的史实了然于胸，对《诗》《书》等典籍典故运用自如，每每论证一个观点，都能引用前朝旧事做历史比较分析；差不多每个重要论述之后，都能引述“《诗》曰”、“《书》曰”、“故曰”以为佐证。

第三，荀子长于逻辑论证。作为战国末期优秀的逻辑学家，荀子对群学原理的论证之严密，远胜于《论语》、《孟子》的逻辑水平。荀子能够三次出任齐国最高学府——稷下学宫的“祭酒”（类似于“教务长”的论辩主持人），应该与他的逻辑和论辩才能不无关系。

第四，荀子承认在社会人事中存在着像自然法则那样的客观法则。他讲“人伦”是“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讲“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sup>68</sup>讲“群居和一”是“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sup>69</sup>可见荀子讲“群道”，取法于自然之理，“群道”当与不当，要看其是否符合客观法则，由此说荀子接近于承认和得出“社会规律”的认识恐不为过；孔德、斯宾塞等人依据生物进化推断社会进化，荀子与此何其相似乃尔。

由上可见，群学对于社会关系、社会现象的研究是具有经验性的，或者说理论是依据经验事实的，研究方法也是重视“实证”（可稽）的。人的职业分工，技能分工，利益分配是实实在在经验性的，不是思辨的。总不至于认为，只有在诞生了西方社会学之后，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研究“伦”和以人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才能算是社会学，在此之前，不论怎样研究“伦”和以人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都不能算是社会学吧？

一些人过于迷信孔德所谓从宗教到哲学再到科学的三阶段论，并且把它绝对化，将其硬套到具有不同文明路径的中华文明上。这样硬套的结果，就将全部先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成果全部归之为“哲学”。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难道这一时期修建的都江堰、郑国渠只靠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不靠作为实证知识的“水利科学”、“气象科学”、土木工程等科学技术知识就可以完成吗？这些大型工程所体现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是直到今天还令人惊叹吗？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学（军事学）、农学、名学（逻辑学）、医学等等学科所达到的水平在世界科学史上也是叹为观止的，怎么能说那一时期就只有哲学没有科学呢？

同理，将群学归属于“社会哲学”，从中国学术源流看，则是不妥当的。因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按照恩格斯的界定，哲学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显然，群学不讨论这种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如果说哲学是讨论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显然，群学讨论的也不是世界本原这种抽象层次的问题，它所讨论的基本上还是人与人、人与群、群与群、家国社稷等等具象问题。

将群学归属于“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本无不可。但如果这种归类的理由只是认为它称不上是“学”，或者即使是“学”，也不能比肩于西方古典社会学，那就值得讨论了。哈佛大学本杰明·史华兹教授肯定荀子在儒家学派中是“最富于‘社会学色彩的’”<sup>70</sup>。他认为荀子是“以自然的实证化技术

<sup>67</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192页。

<sup>68</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303页。

<sup>69</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319页。

<sup>70</sup>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5页。

为导向的思想范式。假如诸如此类的观点在科学事业中多少也占有主导地位，那么，荀子可以勉强被说成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倾向的先驱。”“荀子的科学是完全以对于自然所作的具体观察为基础的，不过是依照自然自发呈现在日常经验中的样子进行观察而已。”<sup>71</sup>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著称于世的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甚至认为，作为科学方法的先驱，“荀子的观点也许是过于实证化和技术化了。”<sup>72</sup>我们总不至于要求 2200 多年前的荀子只有会做数据统计分析才算是实证研究吧？如果按照今天技术主义的标准，慢说是荀子，就是西方公认的一些社会学大家恐怕也要被逐出学科之门了。

## （二）群学的方法论特质

群学不仅在内容上有与西方社会学“相合”的一面，也有相异之处。但尽管相异，却仍是社会学，不过是具有自己的特质。“视角”、“方法”的不同，并不决定一个学科是否存在，因为一个学科内会有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但会决定学科特质的不同。那么，群学有什么特质呢？

说到“特质”，如实证社会学、解释社会学、理解社会学均有其特质。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具有某种特质的社会学可能成为主流，甚至有某种“代表性”，但却不但没有唯一性，也在正确性、可信性上没有什么绝对的意义。并不是实证的就是最高明的，更不能说非实证的就是不高明、不正规、不正确的；并不是经验研究就是真实可靠的，理论研究就是不真实可靠的。在学术发展史上，之所以区分开实证与非实证、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办法把它们统一起来，因而只好或者做成实证的，或者做成非实证的；或者做成经验的，或者做成理论的。渐渐地，却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局面。而社会对象本身是具有整体性的紧密联系的，社会学这个学科本来是以综合研究见长的，可以说，真正高明的办法是找到将实证与非实证、经验与理论统一起来的方法和途径，将来高明的社会学应该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社会学。而群学，正是坚持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古典样本，这是我们有必要重视群学的原因之一。

群学的这一特质，表现在四个方面：人本性、整合性、贯通性、致用性。<sup>73</sup>

第一，人本性是群学的最高原则。所谓人本性，首先是以人为主体。在荀子之前，在天人关系上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观念是“尊天”“敬天”。天神、天命、天道、天理、天心是必须顺从的，天是主宰人的，人是依附于“天”的，必须“唯天命而从之”，只能“以德配天”。唯独荀子敢于喊出“制天”口号，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这在当时即使不说是“大逆不道”，也无疑是“石破天惊”之论。荀子说：天有四时变化，地有丰富资源，人有治理之方，人能与天地相匹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sup>74</sup>）“参”古义同“叁”，肯定人是天地之外的独立主体，不管是否能与天地并立为“三”，总是能与天地互动的一方，这极大地抬升了人的地位。之所以可以赋予人如此之高的地位，是因为人有智慧。在《荀子·赋》中，歌颂人的智慧是其广大可以与天地相匹配，道德比尧禹还高尚，其小可以比毫毛还细微，其大可以充满整个宇宙（“大参天地，德厚尧禹，精微乎毫毛，而充盈乎大宇。”<sup>75</sup>）

人本性还指以人为本位。如所周知，天人关系是中国学术的最高问题，落实到人与物的关系上，荀

<sup>71</sup>同上，第 421 页。

<sup>72</sup>转引自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21 页。

<sup>73</sup>景天魁：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4 期。

<sup>74</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1，第 266 页。

<sup>75</sup>《荀子·赋》，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第 18 页。

子始终坚持人的自主性、能动性。正如胡适所言，荀子论天，极力推开天道，注重人治。荀子论性，也极力压倒天性，注重人为。他认为先秦思想以孟子、荀子为转折，儒家从极端的伦常主义转向突出个人（个人的知性和德性）；从重君权转到民本主义；从关注外界转向关注人的心理。<sup>76</sup>这也都是以人为本位、以人为中心。

就群学而论，这一“转折”的关键是坚持人的完整性——有感、有知、有情、有义。荀子并不像西方社会学那样，把“社会”看作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实在，如同自然界一样只是一种“对象”，只能“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认为社会事实必须用社会事实来解释。<sup>77</sup>群学讲的“群”是人的社会性存在，人是有性情、有温度、也有理性的。人不同于“物”，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是因为“能群”，而能群之本在于“礼”“义”。<sup>78</sup>荀子坚持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位、以人为主体，这是群学的最高原则。

第二，整合性是群学的基本方法。人、人的社会，毕竟不是自然物，离开了与整体的联系，其性质就发生变化，其功能就会丧失。因此，研究人和社会，整合性方法应该是最适当的。当然也需要分析性方法，但整合性高于分析性，分析必须在整合的统摄下进行，不能流于片面的分析。群学坚持不走分析主义之一途，不像西方社会学那样，将主体与客体、个体与整体、能动者与结构、结构与功能、事实与价值等等，一律二分，并常常二元对立起来。群学坚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以整体统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保持研究对象的整体联系。这样似乎不够清晰，但却保持了原本的真实性；而单纯地分析，割断了整体联系，其实就失真了。

当然，整合性方法，也是要进行分析的。荀子倡导的做法是“以类行杂”。<sup>79</sup>就是以整体性的法则来关照和整合细微杂多的分析。人就个体而言是千差万别的，荀子“人论”，首先是分类，“众人者，工农商贾也”，以上则是小儒、大儒，他们在“志”、“行”、“知”三个方面各有特点并有明显差别，但都可以用“礼”这个尺度去衡量，用“礼”去统合，使他们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大儒，可以做天子的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小儒可以做诸侯的士大夫，民众则当工匠、农民和商人。这既是治理社会的方法，也是认识社会的方法。如此，则“人伦尽矣”，<sup>80</sup>就是说这是最符合社会真实而又最适合人伦准则的研究方法。在这里，本体论与认识论是统一的。

第三，贯通性是群学的主要逻辑。“贯通性”，相当于荀子所说的“以一行万”。“仁”，贯通于合群、能群、善群、乐群四个环节；而后四者又通达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各个层次；这四者又参透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贯通于所有这些环节、层次和领域的就是“群道”。“群道当”则一通百通。西方特别是十八九世纪以来，偏好于把各门学问区隔起来，搞得知识界高墙林立，而且以为墙越高，越是专业，学问越是高深。我们的先人却是执着于贯通，领域通、门类通、概念通、学理通。通则明、通则行，通则成、通则盛。<sup>81</sup>

总之，在认识方法和研究方法上，荀子讲要“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sup>82</sup>从整体上把握纷杂的事物，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整合”；用统一、合

<sup>76</sup>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

<sup>77</sup>[法]E.迪尔凯姆（又译：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 35 页。

<sup>78</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1，第 127 页。

<sup>79</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1，第 126 页。

<sup>80</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1，第 112 页。

<sup>81</sup>景天魁：《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4 期第 13-14 页。

<sup>82</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1，第 126 页。



一的原则统摄万事万物，也就是“贯通”。总起来说，我们可以称之为“整合-贯通逻辑”。荀子强调，如果舍弃了这个原则，天下就要衰亡了。那是因为这个认识方法原则与“天下”通行的法则是相一致的。自然的本性是怎样的、社会的本性是怎样的，就应该按照它们的本性去对待它们、认识它们，这就是最高明的方法。这样，主观认识与客观实在就符合了，知与行就统一了。对荀子的整合-贯通逻辑，虽然没有必要与2千年后黑格尔第一次正式表述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的三者统一的观点曲为比附，然其方法论实质确有相通之处。

第四，致用性是群学的最终目的。贯通总的方向是达到实用。群学这门学问不是像西方社会学那样以“描述”、“解释”、“实证”为目的，而是为了用，致力于用，使之有用，达致其用。既然重在致用，就不太重视知识形态。而单纯从知识形态着眼，就会偏重于分析，越是条分缕析，知识就越是显得清晰；而重视实用，就会重视综合，因为实际事物的存在形态总是综合的，要在实践上解决比较重要的问题，往往需要动用多方面的整合性的知识，过于细分的知识难免显得片面，于事无补。<sup>83</sup>群学的致用性，体现了自夏商周以来“礼乐教化”的传统，“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sup>84</sup>，一直延续到当代。

基于以上论证，我们可以说，群学的原则是以人为本，方法是整合-贯通法——各个方面相整合，各个环节、各个层次相贯通。这与西方的那种区隔-分析法，确实是很不同的。群学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的内在逻辑表明，合群、能群、善群、乐群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茂盛大的基因，群学的内在逻辑——“以类行杂，以一行万”的整合-贯通就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群学可以为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发展乃至中华民族的兴盛和复兴提供最接地气的解释。这是群学之本，是现代中国社会学之源，如果“伐其本，竭其源”，“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sup>85</sup>

群学的这些特质，并不能成为否认其为社会学的理由。恰恰相反，这些特质是群学的巨大优势，不仅可以弥补西方社会学在方法上的不足，还可以推动社会学在整体上的发展。特别是面对未来世界的新问题新挑战，群学必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 四、群学新命

是否承认群学是中国古典社会学，可以讨论，一时达不成共识，可以存疑。但总不应该莫名其妙地漠视它，在自己一无所知的时候就拒斥它，因为自己不了解就贬低它。那么，现在已经是被称为“信息爆炸”的时代，世界上有那么多以“现代”、“后现代”为标榜的新理论、新学说，为什么还要眷恋2200多年前产生的群学，本文还要对“旧学”做出“新说”呢？因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sup>86</sup>“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司空图《诗品·纤秣》）<sup>87</sup>中华文化精神历来是志在“旧邦”、“与古”的传统基础上，创新和开拓未来。群学亦然，虽是“旧学”，其命复兴。群学新命有四：

##### （一）重振科学的人文主义

费孝通先生曾经深情地指出：“布朗曾说，社会学的老祖应当是中国的荀子，我一直想好好读一遍《荀子》来体会布朗这句话，但至今还没有做到，自觉很惭愧。布朗提醒我们，在我国传统文化里有

<sup>83</sup>景天魁：《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4页。

<sup>84</sup>过常宝：《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绪言第2页。

<sup>85</sup>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第156页。

<sup>86</sup>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2页。

<sup>87</sup>[唐]司空图著：《二十四诗品》（古典名著聚珍文库），罗仲鼎、蔡乃中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着重视人文世界的根子。西方文化从重视自然世界的这一方向发生了技术革命称霸了二百多年。……自然世界要通过人文世界才能服务于人类，只看见自然世界而看不到人文世界是有危险的。这一点在人类进入 21 世纪时一定会得到教训而醒悟过来，到了那时，埋在东方土地里的那个重视人文世界的根子也许会起到拯救人类的作用了。”<sup>88</sup>他还强调说，不光是荀子，“实际我们中国历代思想家思考的中心一直没有离开过人群中的道义关系。如果目前的世界新秩序正好缺乏这个要件，我们中国世代累积的经验宝库中是否正保留着一些对症的药方呢？”费老认为：“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指拉德克利夫·布朗——引者注）的看法，我们不容否认，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这样长的历史里，这样多的人口，对人和人相处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应当受到我们的重视，而且在当人类进入天下一家的新时期的关键时刻，也许更具有特殊的意义。”<sup>89</sup>

费先生的以上论述，指明了群学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以其独具优长的视角和方法，可以作为今日中国社会学崛起之宝贵资源。片面重视自然世界、技术工具的西方文化难免给人类带来危机，而中国文化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人文世界，必将在 21 世纪发挥匡正扶危的独特作用。这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发扬中国整合性思维之所长，促进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纠正西方二元对立的分析性思维之偏差，回归到以人为本的社会学，即以完整的人、全面的人、人的世界为基点的社会学。这种“回归”就是具有时空跨度和历史意义的“创新”。

研究群学，重要目的之一是探索支持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的方法论。西方社会学尤其是实证主义社会学，过于偏重于“物”，偏重于外在，偏重于理性，偏重于描述，偏重于分析，需要用“科学的人文主义”对之起到纠偏和平衡的作用。而群学所体现的中国传统的方法论，一向坚持人与物、外在与内在、理性与感性、描述与解释、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对于滋养和丰富“科学的人文主义”，从而推进社会学方法的均衡发展，可以起到以古鉴今、以古贯今的作用。

在社会学方法论上，确实到了蓦然回首的时候了。而在“灯火阑珊处”的，正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中国社会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如要在 21 世纪实现崛起，必须抓住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个西方社会科学没有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力争有所突破。而实现这个突破，就必须坚持整合性思维、贯通性逻辑、综合性方法。由此奠定我们自己的方法论基础，实现古今贯通，才能真正做到既总结西方社会学的经验又克服其局限，从而实现中西会通，在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上有所突破，闯出新路。

以荀子群学为学术史基础的中国社会学，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社会学，它不纠结于实证性与非实证性的二元对立，不把人当作物来研究；也不纠结于“价值中立”与否的两难困境，而主张研究者是通过加强本身的修养以及随着认识的深入，逐渐逼近客观真实的。因此，群学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元典。

要创建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结合的现代社会学，第一个古典范本就是荀子群学，它是最早体现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古典社会学，它是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当之无愧的学术史基础。因此，我们今天之所以必须讨论中国社会学的起源问题，第一个目的当然是为群学正名，确立其作为古已有之的社会学的历史地位；第二个目的就是创立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结合的新型现代社会学。这样，面对独霸社会学制高点已有 180 年之久的西方社会学，才可能真正争取到中国社会学的话语权。从而赢得中国社会学的崇高地位。

<sup>88</sup>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47-348 页。

<sup>89</sup>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 232 页。

中国社会学欲要崛起，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跟跑”之路，西方社会学在科学与人文“二分”的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学术积累很厚，这条路是现成的，我们要“上路”很容易，但要想摆脱“跟跑”的局面，就很难了，想要超越就更难。另一条是有望“领跑”之路，就是实现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我们有群学创立以来至今 2200 年的历史积累，走这条路是以己之长克彼之短，难固然也难，但有望超越。

## （二）为中国社会学崛起奠定学术史基础

我们今天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在实现政治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推动文化繁荣等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鲜活的实践经验无疑为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提供了充足的基础条件，为什么还要探寻其学术史基础呢？

2003 年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费老明确指出：“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的实践来看，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作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费老还明确指出了研究中国社会思想的路径和意义：“‘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涵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science）。”<sup>90</sup>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费老满怀着对人类将来必将走向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的坚定信念，他非常清楚西方社会学的单向性思维、二元化逻辑、过分强调对立和冲突的局限性，因而预见中国社会学正是在建立这一美好社会中可以大显身手的成熟的“学”。

而在西方社会学方面，所谓实证与非实证的对立，所谓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绝然的“二分”，在争来争去没有结果的无奈之下，发现造成这一“二元对立”背后的“科学观”本身已经过时了，所谓实证主义不过是对十七八世纪风行的科学观本来就很褊狭的理解，其最可靠的科学基础——牛顿力学已经变成了被超越的“传统”。就是在自然科学中，它在 20 世纪就已经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超越了，到了 21 世纪信息科学、网络技术、生物工程等新兴科学中，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纠缠、相互作用，使得传统的二元对立的科学观越发地不合时宜了。而在社会学中，将社会哲学、社会理论与社会学严格区隔开来的努力，被证明越是努力，就越是徒劳无功；越是严格，就越是自相矛盾；越是坚持，就越是难以自拔。本来，社会学长期坚持的整体性原则、综合性思维，正遇到了为新的科学观的形成做出贡献的难得历史机遇，社会科学如能抓住这个历史机遇，也许能够获得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地位，何苦继续追随着已经陈旧的“科学观”，像唐吉柯德一样去与风车作战呢？

中国社会学如果完全照着西方社会学的路子走，也许可以有所发展、有所壮大，但不会有真正的崛起。所谓“崛起”，必须有自己的概念、命题和学术体系，必须有自己的特质，有自己的特长和优势，要么能够弥补西方社会学的重大不足，要么能够彰显出新的视野、开辟出新的领域、回答和解决西方社会学未能解决或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讲了 90 年了，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却至今没有“化”成呢？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主流的倾向是努力与西方学术“接轨”。而在自己没有根基的情况下，无

<sup>90</sup>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

法实现真正的中西会通，因而，越是“接轨”，就越是“依附”；越想“充分接轨”，“学术依附地位”就越陷越深。什么叫“充分接轨”？难道完全接受和照搬西方制度就是“充分接轨”了？“接轨”必须是自己有个“轨”，才谈得上与西方的“轨”相“接”，如果自己什么都没有，就只能是全盘照搬，不可能是接轨。“充分接轨”应该是中西真正实现会通，没有会通就谈不到“充分接轨”。而“会通”就是创新，在会通中才能培养出“创造力”，离开“会通”就只能培养出“‘照搬’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知识创新力不足”，是因为学术积累不够，因为学术创新是以学术积累为前提和基础的。而学术积累不足，是因为舍弃了中国社会学（群学）的学术传统。任何人都不能“凭空起高楼”，所谓学术创新不过是在前人基础上做出一点“增量”。我们之所以“知识创新力不足”，是因为过于依赖西方概念去“套”中国经验，没有基于本土经验提炼自己的概念，没有实现自己概念与西方概念的“对接”（会通）。没有“根”，怎么可能长出“枝叶”，又如何可能“开花结果”？

当然，我们不是完全没有“开花结果”，鲜有的“花果”大多是基于本土经验提炼概念、形成理论与西方概念和理论会通的产物。例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概念和理论、潘光旦的“位育”概念和理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和理论既是如此。“位育”也好、“差序”也好，梁先生的“伦理本位”也好，都基于以“人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如前所述，在中国学术中，对此做出专门研究的当推群学。

这些成功的经验以及那些“化”不成的教训告诉我们，确立荀子群学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史基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我们确定群、伦、仁、中庸为基础性概念，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层次，还有 30 个基本概念，这样就构成了群学概念体系。<sup>91</sup>尽管这个概念体系肯定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甚至不当和错误也难以避免，但是自此之后，群学不再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具体呈现为概念体系，并进而呈现为命题体系了。不论承认不承认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总算有一个批评的“靶子”了。换言之，不能再不讲理由就说中国没有社会学了，不能再不加论证就说群学不是社会学了。同样，自此以后，中西会通也不再只是一个无法具体着手的愿望，而是可以明确：我们拿什么去与西方社会学会通？以群学去切实地与西方社会学会通；社会学中国化怎么“化”？可以不再停留在抽象的议论，就可以深入到概念和命题的层次了；怎么建立中国社会学的话语权？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可以从具体概念着手了。

总之，构建了群学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明确了群学即为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的学术史基础，起码成为一个可以具体评判、展开争论和批评的对象了。

### （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社会学的学理支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然首先要把自己国家建设好，但是，在当今世界，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以中国的体量、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影响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必定会影响到世界格局。换言之，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解决国内的发展问题，也要回答世界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拿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正如习近平在 2014 年**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指出的：“当今世界，人类文明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古代世界完全不能想象的。同时，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

<sup>91</sup>景天魁等著《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

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sup>92</sup>我们如能通过古今贯通、中西会通，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创造出自己的一系列理论，例如，以中国式的“伦”和“关系”理论对应西方的结构理论、以中国式的“群分”理论对应西方的分层理论、以中国式的尚贤理论对应西方的流动理论、以中国式的“礼”论对应西方的社会制度和规范理论、以中国式的“中庸”理论对应西方的均衡理论、以中国式的“中和”理论对应西方的冲突理论、以中国式的“位育”理论对应西方的治理理论，如此等等，就能够下接“地气”，上应“天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社会学的学理支撑。

我们坚信，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的文明，必有其独特的机理；中国之所以能形成这样一个人口最多、结构最复杂、生生不息的社会，必有其深层的逻辑。这个机理、这个逻辑，部分地深藏在群学之中。群学在历史上曾经参与建设古老中国的社会秩序，建立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塑造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对未来的中国和世界也必然有所启发。

我们研究群学，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复兴群学，更不是“复古”。而是为了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因为群学作为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之学，包含着中国社会学的基因，深藏着解释中华民族之所以长盛不衰的密码。因此，它对世界面临的问题必能做出有启发意义的解答。我们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就是要合群、能群、善群、乐群吗？我们自己想过好日子，也希望大家都活得好；难道未来世界能够靠霸权逻辑去塑造？能够容忍一国“优先”，对其他国家想制裁就制裁、想打谁就打谁的霸道行径？既然群学这一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之学在历史上曾经对形成和延续中华民族的繁盛起到重要作用，既然在中国走向民族复兴、走向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时恰恰需要解决合群、能群、善群、乐群的问题，那就很显然，群学的复兴当然就是顺天应时的。今天的家庭是长期历史演变的产物，今天的社会也是悠久历史过程的延续，没有历史根基、历史眼光，就没有充足的解释力，就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就只能描述现状，无法预测未来。

#### （四）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

“世界性的百家争鸣”，这是两位睿智的老人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预见。在哲学家中，华东师范大学已故的冯契教授早在 1989 年 8 月出版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的“小结”中，就有关于“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的论断，他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东西文化互相影响、趋于合流的时代。为此，需要全面而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也需要全面而系统地了解东方文化，并深入地作比较研究。……要通过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发展自己。”<sup>93</sup>到了 1993 年，冯先生在为赵修义和童世骏合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又重申了这一判断<sup>94</sup>。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中，费孝通先生做出了同样的前瞻。1993 年他在《略谈中国社会学》一文中说：21 世纪，“……这个世界还要经过一个战国时期，全世界的战国时期。”“我们社会学要在第三个秩序的建立上有所作为。这第三个秩序，即道义的秩序，是要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人同人相处，

<sup>92</sup>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新华网 2014 年 9 月 24 日。

<sup>93</sup>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97-598 页。

<sup>94</sup>赵修义：《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冯契先生对后学的期望》，凤凰网 2015 年 11 月 5 日。

能彼此安心，安全，遂生，乐业，大家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对于别人也能乐于相处。我们必须造就这样一个天下，这个天下要看在 21 世纪里造得出来还是造不出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以这个作为主要的轴心问题进行研究。”<sup>95</sup>

现在，“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事实上已经在许多领域有声有色地展开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争论，坚持还是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分歧、维护还是推翻自由贸易规则的争议、如何对待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国际秩序的讨论、一国“优先”还是合作共赢的原则之争、霸权主义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之争、共商共建共享还是动辄以制裁和武力相威胁的方式之争，如此等等。这些争论，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各领域，也势必在学术上、在理论上引出一系列空前深刻的话题。

对于社会学来说，有一些争论在西方社会学界内部已经展开了，而在中西社会学之间也必将形成真正平等而深刻的大讨论、大争鸣。其话题之广泛、论争之激烈，恐怕是难以预料的。中国社会学要参与这场大讨论、大争鸣，就必须首先明确自己立足的基础，否则怎么可能形成真正平等的对话？怎么可能开展真正有意义的“会通”？回想 2005 年，在我们创造了“和谐社会”理论之后，也曾努力寻找西方社会学家的相关论述，希望由此找到学理的支持。然而，因为“和谐社会”概念是中国人依据传统的“和合”思想而创造的，它的提出并不是受到西方什么理论启发的产物，事实上找了一通，也并未找到达到中国的“和而不同”、“群居和一”、“美美与共”这种概念水准的西方论述。这就提示我们，“和谐社会”就是“群居和一”的现代升级版，我们应该由此增强立足于中国学术资源发展现代社会学的信心。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长期是优秀文化和伟大文明的代表，群学则是这一社会历史过程及其宝贵经验的学术升华之一。群学是战国末期之前中华民族已有至少 3000 年<sup>96</sup>的文明早期发展的第一批学术结晶之一，是春秋战国时期长达五百年的百家争鸣的集成性成果之一，是中国学术第一个百花齐放的发展高峰的优秀代表。第一次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学术的基础，创造了诸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人为本、与人为善、和而不同、和谐共生、中和位育、天下大同等光耀古今的命题和理论；现在已经拉开序幕的“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将实现文明互鉴、会通、共生、合一。正如费老所预见的，应该出现一个与 20 世纪不同的“新的版本”。我们社会学要在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上有所作为，特别是建立大众认同的“道义的秩序”。他认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建立了这样的“大众认同”，能否在全世界也出现这样一种认同呢？“全世界五大洲能不能一起进入大同世界呢？这是社会学与人类学在 21 世纪一起要解决的大问题。”<sup>97</sup>

历史逻辑是奇妙无比的，中国优秀文化仿佛是为 21 世纪以后的世界准备的。中华文化复兴正是“应天顺时”。在“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中华民族建立“道义秩序”的历史经验，势必大放异彩。这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科学体系及其话语体系所应该具有的大视野、大气度、大胸怀。从“工具理性”到“健全理性”，从片面理性到理性与感性相统一，从科学与人文的原初统一，经过二者的分裂与对立，重回更高阶段的统一。不仅是可期待的，而且是具有必然性的。片面的发展、分裂和对立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了，而历史总是螺旋式发展的，必定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个过程将在从春

---

<sup>95</sup>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0 页。

<sup>96</sup>据李学勤教授讲：“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表，夏代的开始是在公元前 21 世纪的中间，……但夏代不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文明在这以前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所以我们想把考查的年代再往前推 1000 年，就是推到公元前 3000 年。”（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代前言第 14-15 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而作为“文明社会”标准之一的城市的出现，在中国已有距今 6000 年（河南郑州西山古城，见前引李学勤书第 16 页。）故此这里采用了战国时期以前的中华文明已有“至少 3000 年”之说。

<sup>97</sup>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0-231 页。

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今天“世界性的百家争鸣”的历史大轮回中得到呈现。

群学自创立至今 2200 多年间，遭遇的挫折比孙悟空经历的劫难还要多。在“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它必将“浴火重生”。就是说，它将成为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社会学，这是能够在 21 世纪参与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社会学。它将是 21 世纪世界社会学的制高点，是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必将铸就的学术高峰。

回到本文开篇提到的严复“心结”，那恐怕不是靠一篇或几篇文章而是要靠我们几代人的奋发努力才能解开的。待到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之时，我们就可以告慰列位先贤了。相信严复“心结”自然就解开了，中国历代社会学人不但可以“心结”顿消，而且定然“心花”怒放了。

#### 【参考文献】：

- 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 陈光连：《荀子“分”义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
- 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
-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费孝通文集》第十六卷，群言出版社，2004。
- ：《费孝通论社会学学科建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
-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1。
- 景天魁等著：《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 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
- ：《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36。
- 刘师培著，李妙根编，朱维铮校：《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西书局，2012。
- 涂可国：社会儒学视域中的荀子“群学”，《中州学刊》2016 年第 9 期。
-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4 册），中华书局，1986。
-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新华网 2014 年 9 月 24 日。
- 严复：《译〈群学肄言〉有感》，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 ：《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严复译文卷》，赫伯特·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 ：《群学肄言·译余赘语》，黄克武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 ：《原强》，黄克武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 章太炎著、王小红选编：《二十世纪儒学大师文库·章太炎儒学论集》（下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
- 赵修义：《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冯契先生对后学的期望》，凤凰网 2015 年 11 月 5 日。
- 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13。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来源：《社会学研究》2018 年第 5 期）

# 筑牢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

## ——大食物观下中国的粮食安全

孔祥智 何欣玮

**【摘要】**：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则是农业强国建设的基础。中国的粮食安全概念正在向更大口径的食物安全概念扩展，但当前粮食安全处于紧平衡态势的现状没有发生变化，通过对 2035 年中国粮食消费量的预测，可发现中国未来粮食安全面临较大压力。因此，需要树立大食物观，并以此来指导农业发展和食物供给体系建设。大食物观以跳出传统的“向耕地要食物”的观点、拓宽食物来源为最主要内涵，是顺应由粮食安全概念向食物安全概念扩展的重要理论创新。以大食物观推进中国的粮食安全建设，需要抓好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农机装备、政策保障，推进国土资源的全面开发利用。

**【关键词】**：农业强国、粮食安全、食物安全、大食物观、粮食自给率、粮食消费量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则是农业强国建设的基础。继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目标之后，习近平在 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农业强国建设作出了系统规划，提出“建设农业强国要体现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走自己的路，不简单照搬国外现代化农业强国模式”，并明确“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农业强国建设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很多方面，而确保粮食安全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底线之一。在外部动荡的国际环境和内部大规模农产品供需的环境下建设农业强国，首先要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自给自足。保障好中国的粮食安全，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和根本。

### 一、粮食安全：多维度考量

粮食安全一直都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习近平在前三次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时均强调了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提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面积、产量不能掉下来，供给、市场不能出问题”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中国粮食产量基本处于稳定增长态势，从 2004—2022 年，除了 2016 年和 2018 年全国粮食产量略低于上一年外，其余年份中国粮食均实现了增产。2021 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就已达 483.48 公斤，远高于人均 400 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线。2022 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 68653 万吨，增产 0.5%，其中谷物产量 63324 万吨。从这一数据来看，未来中国粮食增产形势是好的，但通过对现阶段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多维度考量可以发现，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的任务依然相当艰巨，容不得丝毫放松。

### （一）进一步考察现阶段中国粮食安全概念

#### 1、从粮食安全到食物安全：传统粮食安全观的扩展

197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首次提出粮食安全的概念，认为粮食安全就是“应该保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得到未来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这一定义主要强调了粮食的数量安全，其目的是确保所有人都能够获得可供生存的食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粮食产能的增长，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了《罗马宣言》，对粮食安全的概念进行了第三次定义：“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偏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2019年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指出，中国已实现稻谷和小麦的完全自给，谷物自给率也超过95%，“贫困人口‘不愁吃’的问题已基本解决”，“重点贫困群体健康营养状况明显改善”。从膳食结构来看，2013-2021年，中国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了2.76%，人均肉类、禽类、水产品、蛋类消费量分别增加了28.52%、70.83%、36.54%、60.98%。与联合国粮农组织顺应世界粮食产能增长对粮食安全定义的更新相对应，这一消费趋势的转变也赋予中国粮食安全建设以更加丰富的内涵，即以人民需求为中心，积极实现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健康”的需求转变。因此，在中国已实现口粮完全自给和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且传统的粮食安全观面临需求端的挑战和供给端的压力两大难题的前提下，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关注点也应从重视数量安全转移到数量安全与营养安全并重，实现从传统的粮食安全观向大口径的食物安全观的扩展。在2017年中央农村会议上，习近平就已经指出，“现在讲粮食安全，实际上是食物安全”。因此，食物安全作为居民消费升级过程中对传统粮食安全概念的拓展，蕴含着对中国粮食安全关注重点转向的判断，对于完善中国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向性作用。

#### 2、农业强国建设目标下的粮食安全

建设农业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对中国粮食安全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农业强国首先是一个比较概念，农业强国之“强”，必然包含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强，不仅体现为本国农产品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力和地位，同时也体现为在全球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维护、全球农业公共产品供给、农业国际规则制定、农产品定价等方面的能力，尤其是是否拥有有效统筹利用国际国内市场和资源，构建更具韧性、竞争力的产业链、供应链，从而能够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挑战的能力。反映到粮食安全领域，就是在全世界统一的开放市场条件下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保障中国的粮食需求，尤其是饲料粮需求。习近平指出：“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没有软肋的国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人多地少、农产品供需规模超大的现实决定了完全依靠国内土地、国内资源实现所有农产品的自给自足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但近年来中国粮食进口超快速增加的现象也反映出中国粮食需求对外依存度高的问题。根据2021年中国主要粮食品种进口数据（见表1），2021年中国粮食进口依然保持超高速增长，进口量同比增加了68.7%，进口额同比增加了49.5%。其中，增长最快的玉米2021年进口量和进口额分别增加了152.2%、222.9%，这无疑为中国粮食安全形势敲响了警钟。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保障粮食需求并非意味着过度的对外依赖，目前中国粮食进口的超高速增长趋势反映出中国在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增强粮食自给能力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建设农业强国，保障粮食安全，需要在进一步降低粮食尤其是饲料粮的对外依存度上下功夫。

表 1

2021 年中国主要粮食品种进口情况

类别	进口量(万吨)	同比增幅(%)	进口额(亿美元)	同比增幅(%)	贸易逆差(亿美元)
稻米	496.31	68.7	22.34	49.5	11.98
玉米	2835.10	152.2	80.32	222.9	80.24
小麦	976.99	16.6	30.79	31.0	30.36
大麦	1248.00	54.5	35.55	89.0	—
高粱	942.00	95.6	30.26	161.8	—
谷物总计	6537.35	82.7	200.97	110.0	189.20
大豆	9647.10	-3.8	535.25	35.4	534.38
粮食总计	16,453.90	18.1	748.10	49.2	730.46

数据来源:根据海关总署进口数据整理。

## (二) 进一步考察中国粮食安全的紧平衡态势

长期紧平衡是对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总体判断,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粮食生产情况的变化与国内外粮食市场环境的变化,增产空间有限、供需错配问题凸显、国际环境动荡等因素对于中国粮食安全紧平衡的维持增添了新的压力。

### 1、粮食增产空间有限

一是依靠提高单产带来的粮食增收空间有限。2002-2011年,中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长速度为2.56%,而到2012-2021年,这一增长速度已“腰斩”至1.10%。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2022年粮食产量数据的公告,2022年中国粮食整体平均单产为387公斤/亩,甚至比2021年减少了0.2公斤/亩。二是耕地保护任务艰巨。中国耕地总量处于不断减少的过程中,1957-1996年40年间耕地年均净减少约600多万亩;1996-2008年12年间耕地年均净减少超过1000万亩;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显示,2009-2019年10年间,耕地年均净减少1130万亩。这一趋势反映在人均耕地面积上,一调为1.59亩、二调为1.52亩、三调为1.36亩,目前中国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中国的耕地质量整体上也不断恶化,就总体来看,中国本身耕地质量偏低,位于山地、丘陵地区的耕地面积较大,地块零散、破碎、贫瘠。从耕地质量等级来看,《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将全国耕地按质量等级由高到低依次划分为一至十等,平均等级为4.76等,比2014年提升了0.35个等级。三是种粮比较效益低,农民缺乏种粮积极性。比较效益是影响用户是否种粮和耕作制度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摘要》显示,2020年中国三大主粮平均亩产值为1166.73元,总成本却达到了1119.59元,亩均净利润仅为47.14元;2011-2020年,中国三大主粮亩均生产成本增长了41.51%,净利润下降了81.15%,这也导致了2016-2020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的逐年下降。

### 2、供需错配问题日渐凸显

在中国膳食消费结构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相对滞后,口粮供给过剩和饲料粮相对短缺并存的供需错配问题逐渐凸显近年来,中国口粮自给率(人均口粮占有量与人均口粮消费量之比,其中人均口粮占有量利用人均小麦、稻谷产量计算)维持在170%以上,即生产的口粮超过了口粮消费量的1.7倍(见图1)。相比之下,中国饲料粮的自给率明显偏低,且处于下降趋势。以主要饲料粮品种大豆、玉米为例,2012-2021年,中国大豆的自给率从15.8%下降至14.2%;玉米作为三大主粮之一,中国的自给率较高,但随着近两年进口量的猛增,自给率也逐渐下降至95.5%(见表2),无法与小麦、稻谷一样做到完全自给。当然,这一供需错配部分是出于确保口粮绝对安全的需要,习近平在2017年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多了是问题，少了也是问题，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多了是库存压力，是财政压力；少了是社会压力，是整个大局的压力。”实际上，以大豆为例，自给率偏低的大豆作为土地密集型且单产相对较低的作物，若全部由国内土地生产，则会超出中国的耕地承载力，挤压其他农作物的生产。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中国粮食产业存在的供需错配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口粮在粮食消费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少和饲料粮消费的逐渐增加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若不加以控制，这一趋势的不断演化会持续加剧中国粮食产业的供需错配程度，从而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自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广大豆、玉米带状种植和粮豆轮作以来，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深入推进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将加力扩种大豆油料作为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重要方向，并在逐步扩大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实施好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这一系列举措，反映出了党和国家在改善这一供需错配问题上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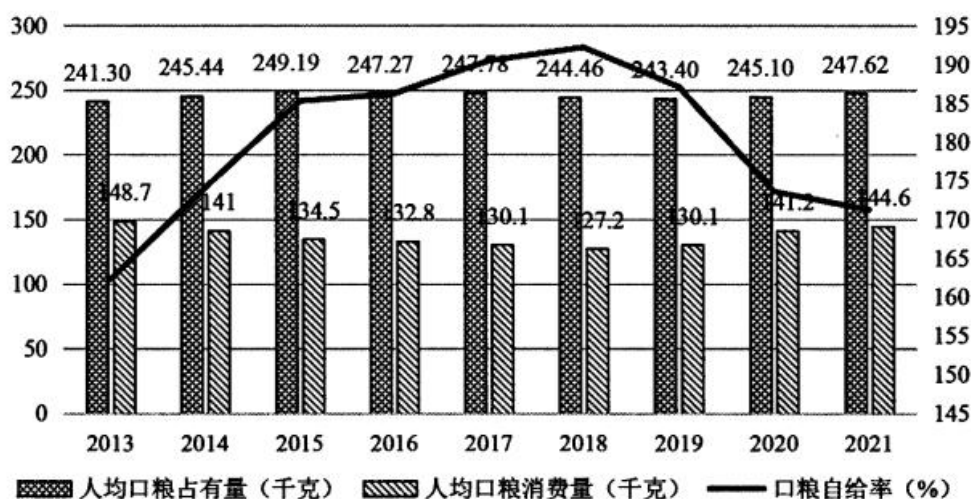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口粮自给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 2 2012—2021 年中国大豆、玉米自给率变化情况 (单位:万吨、%)

时间	大豆			玉米		
	产量	消费量	自给率	产量	消费量	自给率
2012	1181	7458.9	15.8	22771.9	22054.1	103.3
2013	1275	7953.4	16.0	20308.0	16389.0	123.9
2014	1385	8891.7	15.6	25985.8	18697.8	139.0
2015	1051	9346.0	11.2	26936.8	19897.5	135.4
2016	1185	11016.0	10.8	26085.5	25118.6	103.8
2017	1530	10996.0	13.9	25760.0	29702.1	86.7
2018	1570	9675.0	16.2	25717.4	31352.2	82.0
2019	1695	11000.0	15.4	26077.6	30336.6	86.0
2020	1759	11590.0	15.2	25865.2	28419.5	91.0
2021	1642	11597.0	14.2	27002.2	28267.5	95.5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 3、粮食安全形势面临动荡不定的国际环境的威胁

中国部分饲料粮高对外依存度以及在农产品供应链方面话语权不足的现状决定了中国粮食安全极易受国外市场波动的影响。诸如疫情、地缘政治冲突、局部战争等外部波动会通过粮食贸易政策变化、粮价波动等对中国粮食市场造成不可预测的影响，这一不确定性，毫无疑问会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一是威胁中国的粮食消费。尤其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粮食贸易保护主义会威胁中国粮食供需平衡，进口来源国的粮食出口限制可能会对中国粮食供需平衡产生影响。例如，2020年3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际，以越南为首的多个国家相继宣布禁止稻米出口，即使中国口粮完全可以满足自身需求，这一外贸限制也引发了中国部分消费者对粮食的抢购潮。若大豆、玉米等大量进口且来源国集中的粮食品类受到外贸管制，会对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和下游产业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二是威胁中国的粮食生产。中国同样是能源进口大国和化肥进口大国，由于中国的化肥和能源相关成本是农作物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市场的波动也会影响中国粮食的生产成本。例如，自2022年年初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国家开展对俄罗斯的制裁以来，中国的尿素、硫酸钾复合肥等肥料的价格快速上涨，进一步恶化了种粮比较效益，影响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 （三）进一步考察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形势

在当前中国粮食安全形势趋紧的情况下考察未来的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未来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能否更好地支撑自身的消费需求？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饲料粮安全上，部分是由于我们将粮食产能优先配给了更加重要的口粮生产，从而导致以大豆、玉米为代表的部分饲料粮产能相对不足，难以满足自身需求。因此，粮食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产能能否满足需求的问题。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其中第一步就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若粮食高度依赖进口，农业现代化建设也就无从谈起。那么，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际，需要多少粮食才能满足中国的消费需求？

粮食消费主要分为以下四类：口粮、饲料用粮、工业用粮以及种用粮。其中，口粮、饲料用粮是最主要的消费方式。从世界普遍经验来看，约80%的粮食用于口粮及饲料粮消费。在目前已知中国人均口粮消费量的基础上，饲料粮消费可通过人均肉类、禽类、水产、蛋类、奶类消费加以折算。本文采用罗其友等的折算比例（其中蛋类折粮比采用1.65），根据2013年以来中国的口粮、肉类、禽类、水产品、奶类食品消费数据，对中国2013-2021年的粮食需求量进行计算（如表3所示）。2021年中国人均口粮和饲料粮消费量约为290.96千克，若采用80%的折算比例，意味着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63.7千克，结合中国2021年的人口数量14.126亿，可估算得出2021年中国的粮食总消费量约为51376.26万吨。

为对中国2035年的粮食消费量进行预测，首先对2035年中国口粮和饲料用粮总消费量进行简单估计，2013-2021年，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呈逐年上升趋势，8年间累计增长14.77%。若简单推测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将保持这一速度持续增长，到2035年，中国人均口粮和饲料用粮消费量将达到370.27千克，即人均粮食消费量达到462.84千克。考虑到这一预测方式易受统计误差和极端值的影响，例如2021年的口粮和饲料用粮总消费量增幅较大，可能影响预测结果。为此，本文进一步利用改进的GM(1,1)模型对2035年的粮食消费量作预测。GM(1,1)即灰色预测模型是一种长期预测模型，应用GM(1,1)进行预测较之其他常规的时间序列预测法有以下的显著特点：第一，灰色模型是一种长期预测模型，将预测



系统中的随机元素作为灰色数据进行处理，而找出数据的内在规律。作预测所需原始数据量小，预测精度较高，无须像其他预测法要么需要数据量大且规律性强，要么需要凭经验给出系数。第二，理论性强，计算方便，借助计算机及其程序设计语言或相关软件间接计算，使得数据处理简便、快速、准确性好。

表 3 2013—2021 年各类食物人均消费量及折算的口粮、饲料粮消费量 (单位:千克)

时间	口粮	肉类	禽类	蛋类	奶类	水产品	折算的消费量
2013	148.70	25.60	7.19	8.20	11.70	10.42	253.52
2014	141.00	25.60	7.95	8.60	12.60	10.81	249.29
2015	134.50	26.20	8.36	9.50	12.10	11.18	246.37
2016	132.80	26.10	9.13	9.70	12.00	11.44	245.77
2017	130.12	26.70	8.89	10.01	12.13	11.46	244.74
2018	127.20	29.50	9.00	9.70	12.20	11.39	249.14
2019	130.10	26.90	10.80	10.70	12.50	13.57	252.46
2020	141.20	24.80	12.75	12.80	13.00	13.88	266.23
2021	144.60	32.90	12.30	13.20	14.40	14.20	290.96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为满足数据列的准光滑性，首先对折算的 2013-2021 年中国口粮和饲料粮总消费量进行检验，经检验，该数据列所有极比均落在可容覆盖范围内，满足应用条件。进一步参照以上方法，本文采用以对数法改进序列光滑度的改进 GM(1, 1) 模型，以上述 2013-2021 年的口粮和饲料用粮总消费量数据作为原始数据列进行预测，具体过程从略。表 4 汇报了 2014-2021 年根据改进 GM(1, 1) 模型的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的平均误差情况，为便于对比，同时汇报了采用传统 GM(1, 1) 模型计算得出的预测值。可以看出，采用改进 GM(1, 1) 模型形成的预测值与实际值的误差均在 6% 以内，且平均相对误差为 3.67%，相比于传统 GM(1, 1) 模型的 3.76% 更优。因此，采用上述改进的 GM(1, 1) 模型进行预测更为合适。根据模型预测值，可以得出未来中国口粮和饲料粮消费的预测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4 模型预测值与实际值的误差对比 (单位:千克;%)

时间	实际值	改进 GM(1,1) 预测值	相对误差	传统 GM(1,1) 预测值	相对误差
2014	249.29	243.52	-2.31	242.90	-2.56
2015	246.37	248.11	0.70	247.80	0.58
2016	245.77	252.79	2.86	252.79	2.86
2017	244.74	257.58	5.25	257.89	5.37
2018	249.14	262.47	5.35	263.08	5.60
2019	252.46	267.48	5.95	268.38	6.31
2020	266.23	272.60	2.39	273.79	2.84
2021	290.96	277.83	-4.51	279.31	-4.00

表 5 基于改进 GM(1,1) 的中国人均口粮、饲料粮消费量的预测值 (单位:千克)

时间	2025	2030	2035	2040
预测值	299.99	330.68	365.11	403.81

据此可以得出 2035 年中国人均口粮、饲料粮消费量的预测值为 365.11 千克，依然按照口粮、饲料粮占 80% 的比例折算，可得出 2035 年中国预计人均口粮消费量约为 456.38 千克。该预测数据与于昊辰等采用其他方法所得的预测结果相近，可以互为印证。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中国人口变化

的预测结果，2035年，中国总人口将降至13.42亿人，由此可估算得出，2035年中国的预期粮食总消费量约为61246.2万吨，比2021年约增长了19.21%。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在用于贸易、储备等消费之外用途的粮食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到2035年，中国至少需要达到粮食增产19.21%的目标，才能在粮食自给率不提高的前提下满足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保障中国粮食安全。虽然上一个1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5.5%，但更应注意到中国粮食未来持续增产正面临单产提升空间有限、耕地面积缩减等多方压力，且预期未来人口的缩减也可能会影响粮食产能。未来保障粮食稳产增产，满足国民消费、对外贸易、国家储备等方面需求的粮食生产任务依然艰巨。

## 二、粮食安全与大食物观

根据上文的分析，中国的粮食安全长期处于紧平衡态势，部分粮食种类对外依存度高，且未来粮食消费还将持续增加，粮食安全整体形势趋紧。在这一背景下，树立大食物观，并以此指导未来的粮食和食物生产就显得尤为重要。大食物观是新时期传统的粮食安全观创新和发展的产物。在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食物观被首次提出，并于2016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指出，“老百姓的食物需求更加多样化了，这就要求我们转变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因此，树立和坚持以不局限于耕地产出，而是通过多方面拓宽食物来源来满足人民需要，保障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为基本内涵的大食物观，是未来保障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

### （一）大食物观的科学内涵

大食物观的最主要内涵就是要跳出传统的“向耕地要食物”的观点，拓宽食物来源。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这就明确了大食物观的核心内涵就在于要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

第一，向森林、草原、水域等中国广袤的自然资源要食物。作为一个自然资源广阔、地势复杂多变的国度，中国存在着大量尚未得到合理开发和利用的林地、草地、水域等自然资源，存在着在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通过合理利用和转化这部分自然区域来获取食物资源的空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有耕地127.9万平方公里、园地20.2万平方公里、林地284.1万平方公里、草地264.5万平方公里、湿地23.5万平方公里、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36.3万平方公里。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需要充分利用草原、林地、水域的生产力，在做好规划、不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基础上，通过发展畜牧业、林下种植、渔业养殖等方式获取食物，拓宽食物来源。

第二，向生物资源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等要热量、要蛋白。向生物资源要食物，实际上是要向更好的品种及更好的培育或养殖方式要食物。在现有土地、水源等资源约束的限制下，提高食物产能和营养价值，就要依靠生物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依靠新品种的应用和新的培育方式的应用，实现食物产能及品质的提升，从而更充分地扩展热量来源，缓解粮食安全压力。

第三，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增强粮食生产能力。粮食是最基本的食物，树立大食物观的基础，依然是保障好粮食生产。一方面要做好“藏粮于地”，做好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保证粮食种植面积的稳定和增长。另一方面要推进“藏粮于技”，在种业振兴、农业机械化水平、装备水平提升上下功夫，挖掘粮食单产的提升空间，更好地向生物资源要

食物。

## （二）大食物观的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 1、大食物观是顺应粮食安全向食物安全扩展的重要理论创新

根据上文的分析，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和膳食结构的变化，传统的粮食安全观的内涵扩展为更广范围的食物安全概念。与之相对应，树立大食物观，以大食物观来改造和完善食物供给体系，自然成为未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必然要求（如图 2 所示）。首先，树立大食物观是在扩展的粮食安全观下完善中国食物供给体系的科学判断，能够为扩展食物来源、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支撑。“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在传统的粮食安全观下形成的维护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对保障中国粮食产能、稳定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具有重要作用。在粮食安全观从聚焦口粮供需向更大的食物概念扩展的背景下，保障中国的食物安全就不仅仅需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同样需要在大食物观下的“藏食于林”“藏食于草”等。因此，大食物观包含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要求，并在这一基础上提供了中国粮食安全的另一层保障，只有树立好大食物观，中国的粮食安全才能行稳致远。其次，树立大食物观，拓展食物来源，是更好地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食物消费需求、改善膳食营养结构的重要方式。结合表 3 的数据也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人均粮食消费整体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肉、蛋、奶、水产品、蔬菜瓜果类食物的人均消费量均在不断增加。这就需要在在大食物观指导下，合理开发中国广阔的山河湖草的食物产能，为人们提供优质、安全的食物，改善人们的营养健康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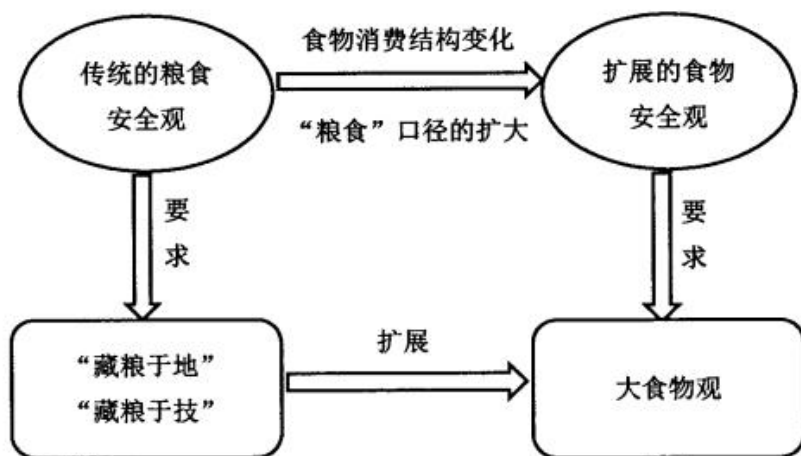


图 2 从“藏粮于地”到大食物观的理论创新

### 2、树立大食物观是缓解中国粮食安全压力的重要手段

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创造了用世界上 7%的耕地养活世界上 21%的人口的世界奇迹。但就总体来说，目前中国的耕地能够使 14 亿人吃饱饭，但不能吃得更好。近年来中国粮食进口的快速增长也说明，仅仅依靠中国现有的耕地面积已无法满足国民消费需求。根据 2021 年稻米、玉米、小麦和大豆的净进口量数据，结合 2021 年上述作物的单产数据，可以计算得出，若中国三大主粮和大豆全部自产，则还需要 8.4 亿亩耕地才能够满足需求，已经接近中国总体耕地面积的一半，且上述计算并未把高粱等其他粮食作物和蔬菜水果等非粮食作物计算在内（见表 6）。因此，中国现有的耕地资源无法满

足不断升级的居民食物消费需求，只能依赖进口，未来居民食物消费需求的进一步升级无疑会对中国的耕地资源造成更大压力，导致中国粮食进口量的进一步扩张，加剧中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因此，只有树立大食物观，通过拓宽食物来源，向江河湖海和生物资源要食物，才能减轻中国耕地压力，提高中国粮食自给率，缓解粮食安全形势。

表 6 2021 年中国主要粮食作物净进口量及折合的耕地需求

类别	净进口量(万吨)	单产(kg/亩)	折合的耕地需求量(万亩)
稻米	251.52	478.69	525.43
玉米	2834.33	419.40	6758.06
小麦	968.60	387.39	2500.32
大豆	9639.57	129.88	74219.05
总计	13694.02	—	84002.86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 3、树立大食物观是振兴乡村产业，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在 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振兴乡村产业与树立大食物观、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具有路径上的一致性。挖掘草地、林地、滩涂等自然资源的农业生产能力开展食物生产，是树立大食物观下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振兴乡村产业，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现实需要。此外，由于西部贫困地区往往地势起伏更大，草地、林地、滩涂资源往往更为丰富，在这些地区贯彻好大食物观，发展特色农业生产，对于壮大脱贫地区的产业基础，发展脱贫地区的村集体经济具有关键作用，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完成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也具有重要意义。

### 三、大食物观下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大食物观的科学内涵要求我们做好多途径拓宽食物来源和抓好粮食生产的统一。一方面，要通过抓好耕地保护、抓好种业振兴、抓好农机装备、抓好政策保障的方式确保中国粮食产能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在大食物观的指导下推进国土资源的全面开发和利用，充分释放蕴藏于中国广袤自然资源中的食物产能。据此，本文提出在大食物观下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 （一）抓好耕地保护，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土地是农业的最基础要素，抓好耕地保护是未来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的根本。早在 2013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明确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抓好耕地保护，一是做好耕地数量保护和占补平衡工作。应以牢牢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为底线目标，明确落实耕地保护责任，挥好守护耕地红线“指挥棒”。各地也应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树立底线思维、红线意识，推动形成以村为最小网格、以镇街为落实主体的耕地保护责任网，实现保护责任全覆盖。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做好耕地补充，杜绝“占多补少”“占优补劣”现象，严格落实补充耕地管护资金和管护责任，紧紧围绕耕地数量、质量以及生态保护的要求，切实加强补充耕地项目的后续管护利用工作。二是做好耕地质量提升工作，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根据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印发的



《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高标准农田相比于传统农田，在提高机械化水平，促进节水、节电、节肥、节药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亩均节本增效可达500多元。应按照中共二十大报告的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将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逐级分配落实，做好补贴工作和考核工作。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实现耕地质量和生态环境的共同提升，强化技术指导，加强对优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研究及改进。三是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加强常态化监管，根据耕地“非粮化”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空、天、地、网”一体化全覆盖的“非粮化”监测机制，重视对耕地流转尤其是工商资本介入的跟踪监管，了解耕地种植情况，对私自改变耕地用途的行为进行严惩，确保高标准农田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优质耕地主要用于粮食生产。

## （二）抓好种业振兴，拓宽粮食增产空间

早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强调了科技尤其是种业对于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用。“耕地就那么多，稳产增产根本出路在科技”，“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确保中国粮食稳产增产，更好地向生物资源要热量、要蛋白，离不开强大的种业作为支撑。在全面推进种业振兴顺利开局之际，继续扎实有力地推进中国种业振兴，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也是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明确指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要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把种业振兴行动切实抓出成效，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为此，一是要推进种质资源共享利用。针对中国现存的种质资源利用程度不足的问题，要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立足中国丰富的种质资源，针对中国在部分品种、部分领域存在的不足，以及重要粮食种源，组织规模化育种主体进行集中攻关、联合开发。推动种质资源共享利用的体制机制建设，完善种业数据服务、信息服务，增强中国种质资源共享利用能力。二是要强化种业研发能力。优化种业科研要素配置，对于种业基础研究，要加大投入力度，为公共研究机构、科研院所的种业基础研究项目提供充分支持；对于商业化育种研究，要建立健全多元主体联合投入、协同开发的体制机制，充分实现商业化育种的经济价值。三是要完善种业产权保护制度体系建设，强化针对种业侵权行为的法制建设，增强执法能力。只有具备健全的种业产权保护制度，才能更好地保护种业创新主体利益，激发种业创新动力。

## （三）抓好农机装备，增强粮食生产能力

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装备水平，是增强中国粮食生产能力，更好地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动力。习近平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是要保粮食生产能力，确保需要时能产得出、供得上。这就要求……把现代种业、农业机械等技术装备水平提上来”。一方面，粮食种植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能够直接提高种粮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经营效益；另一方面，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的农业机械化应用程度以及农机装备水平的提高也可以起到节本增收的作用，从而能够推动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节约的土地可用于粮食种植或其他作物种植，更好地缓解中国粮食安全压力。目前中国种粮机械化水平提升的一大瓶颈在于大量山地、丘陵地区存在耕地细碎化、交通不便、水土流失等问题，限制了大型机械设备的应用范围。为此，需要针对山地、丘陵地区等耕地细碎化地区，加强工作方式灵活、适应性强的中小型机械设备研发攻关和应用试点，提升中国粮食生产的整体机械化水平。同时，着力提高部分种植规模较大经济作物的机械化水平和先进装备应用水平，通过推广温室栽培、水肥一体化、自动化控制等方式推进其产能和质量的提升，提高其土地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 （四）抓好政策保障，提高种粮推动力度

保障好农民种粮的收益，农民才有种粮积极性，粮食才能增产增收。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强调，要“健全农民种粮挣钱得利、地方抓粮担责尽义的机制保障”。抓好农民种粮收益提高的政策保障，一是要着力提高种粮补贴力度，增加种粮比较效益。加大财政对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种粮补贴力度，推动实施“谁多种粮食，就优先支持谁”的补贴办法，在补贴发放过程中要明确补贴主体根据“谁种田、谁受益”的原则，对种粮经营规模大的主体进行精准补贴。同时可以推动成立补贴发放检查小组，对发放的补贴进行落实追查管理，确保补贴真正惠及种粮者，推动农民种粮效益的提升。二是多方面完善种粮补贴政策。建立健全针对改善种植结构、提升耕种环节机械化水平的精准补贴政策，例如针对双季稻种植的早稻种植补贴和对稻谷机械化插秧的补贴政策，推动粮食种植结构的改善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三是尽可能确保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稳中有增，确保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水平保持稳中有进。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适当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稳定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和稻谷补贴政策。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继续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谷最低收购价。而在2022年初以来俄乌冲突爆发，粮食生产能源成本、化肥成本快速上升的背景下，未来更应稳定稻谷、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格和玉米、大豆的生产者补贴政策，尽可能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

#### （五）以大食物观为指导，推进国土资源的全面开发和利用

中国现有的林地面积约为耕地面积的2.22倍，现有草地面积约为耕地面积的2.07倍，现有湿地面积约为耕地面积的0.18倍，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食物生产潜能，对于缓解中国耕地压力、稳定粮食安全形势具有重要作用。为此，应加强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可充分利用林下环境阴凉潮湿的特点，发展食用菌种植、中药材种植等产业；充分利用部分光热条件较好、地势相对平坦的山区灌木林地，开展规模化特色种植。充分利用草地资源，在草场的生态承载范围内，合理开展畜牧养殖活动。合理利用湿地资源，可通过稻虾共生、桑基鱼塘等方式，探索湿地资源有效利用与合理保持相结合的经营方式。进一步开发江河湖海的水产资源，2013-2021年，中国人均水产品消费增长了36.28%（见表3），未来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和膳食结构的改善，这一消费量还会继续增长，未来应当通过开展科学养殖、合理捕捞，更好地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在对中国现有自然资源进行开发的同时，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友好的原则，避免竭泽而渔的开发方式，在充分考察评估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开发和利用，充分防范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风险。

**（作者：孔祥智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欣玮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河北学刊》2023年6月3日）**

# 大食物观：结构变化、政策涵义与实践逻辑

程国强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军的新阶段。如何辨识新阶段我国居民食物结构变化趋势，深刻认识把握大食物观的政策涵义与实践逻辑，促进粮食安全向食物安全深化拓展，全面提升我国食物安全保障的能力和水平，既是一个亟待研究的理论课题，也是必须系统谋划的重大战略问题。本文拟在分析我国食物消费结构特征及变化趋势的基础上，阐释大食物观的现实意义与政策涵义，并初步评估我国食物安全保障现状与今后的挑战，提出了新发展阶段践行大食物观的实践逻辑与政策取向。

## 一、我国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及趋势的辨识

揭示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特征的班尼特定律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长，食物消费呈结构升级的趋势，即人们对米面等淀粉类主食消费逐步减少，而对营养丰富的肉类、蔬菜和水果消费大幅度增加。若以我国小麦大米等主食、食用植物油以及肉类消费作为分析样本，可观察到近 30 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提高，居民食物消费也随之呈现总量增加与结构逐步升级的趋向，验证了班尼特定律揭示的不同发展阶段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

### （一）近 30 年我国食物结构变化特征

与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趋势相适应，过去 30 年我国主要食物的消费结构呈现典型的分化趋势。过去 30 年我国居民食物消费已基本完成从“吃饱”向“吃好”的跃迁，逐步迈向追求营养健康的消费升级新阶段。其中，主食消费、食用植物油已经进入相对稳定阶段，而肉蛋奶等动物性食物消费仍处于持续增长阶段。小麦、大米、食用植物油以及主要肉类产品消费结构变化呈如下特征。

第一，小麦、大米等主食的人均消费，由改革开放初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温饱需求的刚性增长阶段，转向逐步下降并进入基本稳定阶段。

第二，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1991 年以来的 30 年年均增长率达 5.79%，是增长最快的食物。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仅 7.4 公斤，远低于同期日本（16.1 公斤）和韩国（13.4 公斤）的消费水平。2000 年以来，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到 2017 年，人均消费达到 25.8 公斤。按照东亚地区食物消费模式，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也进入成熟稳定阶段，目前基本稳定在 26 公斤左右的消费水平。

第三，猪肉、禽肉、牛肉与羊肉四大肉类产品，30 年间人均消费从 20.4 公斤增加至 55.8 公斤，增长 174%，显著地反映了收入增长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我国居民主食消费进入稳定阶段后，猪肉人均消费也于 2012 年突破 30 公斤，虽然近几年受疫病等因素的影响有所波动，但增长趋势仍然没有逆转；禽肉、牛肉与羊肉消费则持续保持增长势头，即使是 2010-2022 年的 10 多年间，年均增长也分别达 2.99%、4.85% 和 2.69%，仍处于消费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我国今后跨入高收入阶段，

肉类消费潜力也将随之进一步呈现出来。

## （二）新发展阶段我国食物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窗口期，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202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9918国际元，大体相当于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同OECD成员20世纪90年代初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从发展阶段看，我国2010年以来的人均GDP增长，相当于韩国20世纪90年代的增长水平。

这意味着，从现在起到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有可能经历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韩国自2010年以来类似的变化过程。根据日本、韩国等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一般经验，得到初步判断，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的新发展阶段，在人口增长目前达到峰值、人口老龄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将主要受经济发展、收入增长的驱动。今后我国居民食物消费在总体上保持传统消费模式的同时，将进一步向多元化、营养化、健康化转型升级。其中，小麦和大米等主食以及食用植物油消费，将基本稳定在目前的水平。今后5-10年在跨入高收入阶段后，肉蛋奶蔬菜水果水产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消费将保持持续增长势头，特别是人均肉类产品消费水平将逐步向具有类似消费模式的东亚先行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看齐，仍然具有一定增长潜力，这是食物消费结构变化新阶段。在此基础上，到本世纪中叶前后，各类食物消费增长将基本趋于稳定，食物消费结构也将随之进入成熟稳定阶段。

## 二、大食物观的战略考量与政策涵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把解决好十四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不断完善粮食安全政策机制和关键措施，探索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粮情的粮食安全道路，使我国实现由长期“吃不饱”到“吃得饱”，进而再到“吃得好”的历史性跨越。

从本质上看，大食物观是粮食安全向食物安全的边界拓展和战略深化，是顺应新发展阶段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新趋势的战略考量。为此，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为导向，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推动从粮食安全向食物安全深化拓展，建设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安全的国家食物安全综合保障体系。

大食物观的政策涵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保障目标和范围，要从“吃饱吃好”向“吃好”“吃得营养健康”升级，从以保障粮食（“米袋子”）供给为主，到守好“米袋子”的同时，也保障“菜篮子”（即肉蛋奶蔬菜水果水产品）和植物油（“油瓶子”）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全覆盖。第二，保障资源，要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向整个国土资源要食物，从植物动物微生物获取热量、蛋白资源。第三，保障方式，要从主要注重粮食等农产品生产，向加强“产购储加销”一体化为基础的食物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增强食物安全综合保障能力转型。第四，保障路径，要从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向立足国内保重点、在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的同时，统筹建立安全可控的多元国际农业供应链拓展。

深刻认识和把握大食物观的政策涵义与实践要求，对新发展阶段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食物消费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战略意义。首先，树立大食物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党的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其次，这是应对世界变局加速演化的复杂局势和各种风险挑战的基础支撑。第三，这是立足基本国情统筹利用

国土资源的战略需求。

### 三、我国食物安全保障现状与今后的挑战

#### (一)我国食物安全保障现状

目前衡量和研判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大多用粮食自给率指标(即国内生产量与消费量之比)，也有部分国家或地区(日本等)用国内粮食生产的热量等值与粮食消费的热量等值之比表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方针是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要求粮食自给率达到95%。

新发展阶段树立大食物观，要求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因此有必要建立与大食物观相适应的食物安全保障水平测度方法。衡量我国食物安全保障水平，不仅要继续从生产消费角度关注口粮产品以及肉蛋奶植物油各产品的自给率，研判供给保障能力和自给水平，还要从农业资源供给角度，构建农业资源自给率以及食物自给率指标，形成食物供给保障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系统评估我国食物安全综合保障能力和水平。

为此，首先根据主要农产品供需状况，用传统的产消自给率指标，测算主要作物产品、主要动物性食物的自给率，初步评估近30年我国粮食和主要食物产品供给保障水平的变化情况。

进一步从国际经验看，日本为综合评估食物自给率水平，在从生产消费角度测算各农产品自给率的同时，还采用食物热量等值方法测算其食物综合自给率。但这种方法局限于粮食安全的热量自给水平，不能反映食物消费需求的资源特征，因此不适用我国大食物观要求下对食物自给率的评估。

为综合测算评估我国农业资源自给率和食物自给率水平，本文引入“种植面积需求等值”概念，将各类食物产品的消费需求，转化为在国内现有技术条件下生产时所需种植面积(或称虚拟土地需求面积)，即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满足1单位食物产品消费的生产所需要的土地种植面积数量。在此基础上，用国内实际农作物生产种植面积总量除以所有食物消费的土地面积需求等值之和，即可得到能够综合反映食物供给保障水平的食物自给率。

1991-2022年，我国水稻、小麦等口粮产品保持高水平自给，但综合从农业资源配置需求看，反映食物供给保障水平的食物自给率呈持续下降趋势，具体表现为如下特征。

第一，粮食实现高水平自给；第二，肉蛋奶等食物产品国内供给保障水平较高，基本实现高水平自给；第三，自给率较低的是食用植物油(29%)，大豆仅17.8%。这意味着，畜产品自给率保持较高水平，是与其蛋白饲料原料主要来源——大豆大规模进口、自给率大幅下降为支撑。第四，食物自给率持续下降。20世纪90年代我国食物消费是以口粮为主、肉蛋奶消费较少的结构，反映了当时农产品出口被作为我国获取外汇的重要途径之一，使紧缺的农业资源错配，呈现出反向溢出效应。而自新世纪初开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食物结构的逐步升级，我国食物自给率持续下降。尽管目前我国保持口粮100%和谷物95%以上的高水平自给，但从农业资源供给和食物安全综合保障能力看，我国食物自给率只有67.6%。

第二，这意味着，目前我国保持粮食高自给率的同时，食物消费的近1/3需通过利用国外农业资源来供给。大豆2022年我国净进口9096万吨，若按目前我国大豆单产水平在国内生产的话，需要6.9亿亩种植面积；植物油净进口708.7万吨，需要种植2.8亿亩大豆。2022年我国净进口肉类557万吨、乳制品近70万吨，按现有养殖技术水平，我国需要9463万亩玉米和6767万亩大豆，共1.6亿亩的种植面积来提供饲料供给。

进一步地分析，最近20年来我国食物自给率持续下降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人口持续

增加使农业资源约束更加凸现。第二，收入增长推动食物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导致农业资源自给水平持续下降。第三，国内农业供给体系存在结构性短板。

## （二）今后我国食物自给率的趋势与挑战

根据新发展阶段我国食物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十四五”阶段及今后一段时期，随着我国逐步迈向高收入阶段，我国食物消费将进入总量进一步增加、结构持续升级的新阶段。根据预测，今后我国食物消费及其保障水平将面临如下趋势和挑战。

第一，口粮及食用植物油消费基本进入成熟阶段，人均口粮消费和食用植物油消费将分别保持在目前的140-145公斤和27-28公斤水平，随着2022年我国人口增长到达峰值并进入负增长阶段，加之人口老龄化的深化，今后口粮消费总量将持续下降，因此小麦、水稻作为口粮刚需的供给压力将逐步得到减缓。第二，食物消费结构将进一步升级，肉蛋奶等动物性食品消费将持续增长。第三，谷物消费需求总量将进一步增加，饲料消费将成为谷物需求增长主导因素。

在此基础上，初步估计2025-2050年我国食物自给率变化情况。在假定农业科技不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形下，今后30年我国保障口粮和肉蛋奶植物油等食物有效供给，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本世纪中叶，当食物消费结构进入成熟稳定阶段，我国食物自给率将逐步回升至目前水平。

值得重视的是，尽管今后我国将保持水稻、小麦的高水平自给，有能力牢牢守住确保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但部分谷物以及大豆等饲料原料供需缺口扩大、自给率进一步下降的局面难以逆转。随着国际局势的日趋复杂，我国肉类、植物油等食物供给保障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增加，今后我国食物安全保障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 四、践行大食物观的实践逻辑与政策选择

### （一）践行大食物观的实践逻辑

深入践行大食物观，顺应新发展阶段我国食物结构变化的新趋势、应对食物安全保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必须准确把握大食物观的实践逻辑，加快谋划新发展阶段我国食物安全保障战略与政策。

首先，要树立大资源观。必须立足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紧张的基本国情，适应新发展阶段食物结构升级、消费多样化的新需求，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要向森林要食物，发展木本粮油、森林食品；向草原要食物，推动草原畜牧业集约化发展；向江河湖海要食物，稳定水产养殖，积极发展远洋渔业，提高渔业发展质量；要向设施农业要食物，探索发展智慧农业、植物工厂，有效缓解我国农业资源的瓶颈约束。要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发展生物科技、生物产业，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

其次，要树立大农业观。要坚持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统筹“粮经饲”生产，推动“种养加”一体，农林牧渔结合，促进农业供给体系结构优化、高质高效，推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

第三，要树立大市场观。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增强粮食和食物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全面提升粮食、肉类、蔬菜等各类食物保供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从战略上提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要畅通国内国际农业食品循环，提高农业食品国际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还必须确立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为践行大食物观的核心基础和边界底线。首先，要以粮食安全为核心基础。这就要求，必须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坚持集中资源保障粮食有效

供给这个重点，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其次，要以生态安全为底线。这就必须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加注重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食物资源和生产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第三，要以食品安全为红线。要根据食物来源拓展多元对食品安全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坚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强化食品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吃得安全、吃得健康。

## （二）保障我国食物安全的政策选择

新阶段应对食物消费结构变化我国食物自给率持续下降的挑战，确保国家食物安全，必须深入践行大食物观，突出重点、综合施策，抓紧建立完善我国食物安全综合保障机制。第一，加快构建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底线、以确保食物有效供给为重点的国家食物安全综合保障体系。要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方针，全面践行大食物观，建立完善以确保口粮绝对安全为重点、促进肉蛋奶菜油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强化以应对突发事件、维护市场稳定为重点的农产品储备调控和应急保障体系；加强以安全有效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资源为补充的国际农业食品供应链建设，全面提升国家食物安全综合保障能力和水平。

第二，坚持系统观念，建立高质高效协同可持续农业资源配置机制。一方面，要面向整个国土资源统筹农业资源配置，根据市场需求和区域比较优势，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促进农业生产体系结构优化、均衡供给、可持续发展。如可通过适当降低玉米自给预期，加快补齐油料作物短板，推动国内能量饲料原料和蛋白饲料原料的平衡供给。另一方面，要统筹布局农产品加工产业，有序退出粮食深加工。

第三，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推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面提档升级。今后我国农业资源约束矛盾将更加突出，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的根本出路在农业科技创新和综合生产能力提档升级。目前我国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的单产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突破，着力提高土地生产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将促进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我国农业资源供需缺口至少可压减 2-3 亿亩，不仅将基本抑制住食物自给率下降趋势，而且将全面夯实我国食物安全综合保障根基。

第四，抓紧建设安全可控、持续稳定的国际农业食品供应链，确保国家食物安全综合保障的战略主动。我国必须继续坚持实施农业对外开放战略，将国际农业资源用得更好更足更安全，把宝贵的国内资源用在守好口粮安全底线、把住食物安全主动权上。因此，必须加强全球农业食品供应链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建立健全全球农业贸易投资与市场监测体系，促进风险防控关口前移至供应链上端；加快培育全球性农业食品企业，鼓励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农业生产、加工、物流、营销及贸易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把农业食品贸易投资、国际物流运输要道、港口码头等关键节点风险防控与安全管理，纳入国家安全防卫体系统筹保障；深度参与全球农业与粮食安全治理，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拓展农业国际合作、促进投资贸易建设的平台作用，抓紧构建安全可控、持续稳定的全球农业食品供应网络。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来源：《农业经济问题》2023 年第 5 期）**

# 诗画合璧传千载

## ——何遂、吴石《长江万里图》长卷赏析

何迪 郑立

为了实现 90 岁高龄叔叔何达临终前的嘱托，经多方人士共同努力，一幅由何遂作画、吴石题诗，于 1941 年 4 月完成，近 70 米诗画长卷《长江万里图》在何家珍藏了 82 年后，终于在 6 月 10 日这一天，1950 年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将军在台殉难日，捐赠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

何遂生于 1888 年，歿于 1968 年 1 月 10 日，吴石生于 1894 年，牺牲于 1950 年 6 月 10 日；他们是同乡，福建福州（闽侯）人；是军中将领，官拜中将；是文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又都有欧、日观战留学的经历与视野。他们参与了辛亥革命、反袁护法、民国肇建、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至新中国成立，始终站在了历史进步的一方。吴石自许为“戎马书生”，从军一生，但以文化人自居；何遂则是“武胆文心”，效仿“鲁仲连”，合纵连横，但骨子里是中国传统的“侠”与“士”。

这幅长卷不仅仅承载着何遂、吴石的兄弟情谊、文化素养、共同追求、理想信仰，诗画背后的故事更反映出中国近现代史上悲壮而光辉的一页。

### 一、六游长江三次作画

长江是中国历代文人墨客最钟情的题材。宋元明清都有大画家留下的传世佳作：宋有夏圭、米黻（芾），元有王蒙，明有戴进、吴伟、沈周、文徵明，清有王翬，这些不同版本的《长江万里图》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地；但是除了清代王翬的 16 米长卷为长江全貌图，其他名家都只取了长江之一段，包括前两年轰动一时的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也只取了长江的庐山和鄱阳湖部分。绝大部分画家也并未走过长江全程，像王翬的长卷是取自前人画作中的神游。

何遂则不同，在 1940 年冬作画前，已 5 次沿长江而行，他既受到了先辈画家的影响，又有亲眼的观察和体验。当他 75 岁，1963 年 11 月第 6 次游长江时，在两幅大画上作诗并题记，回忆“乘江蓉（船名）东行至汉，计离渝已十八年，予十二岁入蜀，溯江五次。自思前后，因成此诗，并写为图以志盛代。”他录下了 15 岁时的诗作：

滩行最险处，涛声乱入耳；仰视不可攀，返顾莫能止。

何安复何危，瞬息决生死；远游良多艰，壮心未能已。

题曰：“此予一九零三年由蜀返闽，舟过瞿塘所作。今已历六十年矣，生平遭际一何近似乃尔。”

何遂把自己的人生与长江相连，把自己的理想、情感注入了《长江万里图》的诗画之中。图中万里长江源出岷山，横贯四川；闯出三峡，奔向江汉；辗转九江，回旋湘赣皖；漫淌苏浙，穿越宁沪，奔腾



入海。近 70 米的长卷在九江段、武昌段、三峡段、川江段均留下了吴石的诗句，画龙点睛，道出了两位军旅之人在抗日战争中共同的经历与情怀，也用文字描述了画中山水的韵味，让一幅出自二人合作的长江更有了画面的解读。

## 二、“三春鬓改”“十丈图成”

何遂、吴石诗画合璧的《长江万里图》完成于 1941 年春，为首画。自 1937 年“七七事变”，经 1937 年 12 月南京失守，于 1938 年 3-4 月的豫东会战，6-10 月武汉保卫战，首次长沙会战，何遂先后任第一战区高参室主任、桂林行营总顾问；吴石为国防部第二厅（情报厅）副厅长、第四战区参谋长，他们作为军人直接参与了对日作战。1939 年底至 1940 年初，中日桂南战役，国军获昆仑关大捷，阻止了日军切断南部供给线，陷陪都重庆于困境的企图。何遂随同战役总指挥白崇禧亲临前线，战前他写下了：

“昆仑关北迁江路，不断闲云自来去。淡淡波光浮一缕，斜阳如血，小梅几树，无那愁情绪。”

在桂南战役指挥部广西迁江时写下：

“韬略从君仔细论。月光洗地凉如水，壁垒无喧，剑气诗魂。”

“昆仑关外依然月，有胡笳满地悲凉。矛头薶食，威弧动处，射落天狼。”

鏖战之际，他又写下：

“文酒从容宴，半付与军书旁午。誓扫胡虏纵横，布衣还问吾土。”

这是何等的豪情与气概！他也曾“画虎题赠白健生（白崇禧）将军”：

“昂头风起，传声谷应，山君一怒凭临。家国播迁，乾坤板荡，寇氛可叹陵侵。”

他期望与挚友一起，“并力澄清天下，大斗为公斟。”

而吴石作为桂林行营参谋处长参与了昆仑关战役，并以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总顾问名义，为在战役中牺牲的三位日本籍烈士松山、大山、鲇川写下了祭文：

“太和浩劫，产此鸱鸢。兴戎误国，荼毒生灵。侵略华夏，师出无名。压抑人民，墨动大兵。民生凋敝，农作不兴。灾黎遍野，哀哀其鸣。懿欤烈士，先觉天民。蒿目日弊，急谋自新。誓除军阀，拯溺国魂。一致反战，联结同盟。昆仑广播，警惕愚顽。正义浩荡，河岳星辰。天胡不吊，斫丧鸿熏。闻者哀悼，风悲日昏。英灵不灭，长存永生！”

1940 年 4 月，桂林行营撤销，改为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何遂仍任总顾问。他在“将之桂林”《水调歌头》词中写下：

“昆仑月，今古在，亦雄哉。”

“还剩闲愁清兴，付于画心词笔，怀抱豁然开。豪气冲牛斗，泱泱逼人来。”

是年冬，何遂开始作画，写“题长江万里图”，首句便是：

“浪淘人物今如故，遗恨旧游重省。鱼复云屯，马当风送，难写当时心影。”

尽管有昆仑关大捷，他仍难忘“廿七年（1938 年）六月十二日随白健生巡视马当，廿七日晨离去而马当即于是日沦陷。”

马当是长江九江段中的关键要塞，有坚固工事与重兵把守。由于守军长官怠误，使保卫武汉的门户

大开。吴石在画中距马当 40 公里的九江段写下了他的第一首七绝：

“依旧烟岚入画图，年时游屐遍匡庐，  
云中五老女相顾，识得劳人面目无。”

这是在描绘入画的“烟岚”，回忆“游屐匡庐”。1937 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声明：“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国共第二次合作、抗击日寇，九江庐山，成为见证。

但是，马当之耻难以忘怀，再追忆南京失守、武汉战役，何遂写道：

“吴头楚尾凝望。溯从天到海，雄奇无尽。十丈图成，三春鬓改，举首苍冥高迥。”

当年与吴石同离南京，溯江武汉：

“铁瓮城，何苍莽。秦淮水，休惆怅。正纵横胡骑，谁堪乘障。半着已教全局误，大言不自今朝诳。抚无弦汉上且羈迟，吾犹壮。”

诗中有着何遂对南京失守的悲愤，转至保卫大武汉；马当再失，撤离武汉；至 1941 年春，“三春鬓改”，心痛所致；“十丈图成”，情系长江，抒发“吾犹壮”的豪情；“誓扫胡虏”的意志，“布衣还问吾土”的决心，尽蕴含于《长江万里图》中。

### 三、抚今思昔“鸿文椽笔”

1941 年春，作画之时，正值黄花岗起义 30 周年纪念日，何遂作“鹧鸪天”两首，题记：

“黄花岗纪念日。回忆辛亥春仲，将有广州之役，时方声洞、陈更新、严汉民、王印芴诸君集桂林福棠街二号予所（现改江南街三号，在江苏会馆对门）比首涂，予与方韵松、刘崑涛、杨子明送之大圩而返。及三月廿九日广州事败，予等未及发而罢。诸君中有生还者，复来桂寓予所。门外侦骑四集，予驱走之。再接再厉，遂有八月十九日武昌之役。予分道北走，于九月十日率十二混成协至石家庄，与晋革命军合。九月十二日，吴公禄贞至。予衔命赴娘子关，约阎百川来会。十四日阎吴既定策。十六夜吴公忽被刺。翌日晋燕军举予为燕军都督，兼燕晋联军副都督，以继吴公。已而清军大集，阎遂不出关，事竟无成。抚今追昔，感慨系之。”词中“英雄各有文章在，圣义应教性命轻”，舍生取义成为一代辛亥志士的信念。

吴石在《长江万里图》武昌段，题诗：

武昌夏口大江流，廿二年前忆旧游。  
几度探幽攀古阁，也曾寻醉踏芳洲。  
孤心郁勃隐双剑，共济安危托一舟。  
楚客江篱无限感，秋风斜日更添愁。

“武昌夏口大江流，廿二年前忆旧游”，这两句记载了 1919 年，吴石初识何遂。时广州护法军政府委何遂为“靖闽军司令”，联络福建志士，共襄义举，推翻军阀李厚基，事泄失败，牺牲十余人，何遂、吴石等结伴逃亡至武汉。

“孤心郁勃隐双剑，共济安危托一舟”，这两句吴石写下了与何遂的共同理想与抱负，这让他们成为了生死之交！

回到现实，中日激战已三载，再溯历史，何遂寻古访重庆合州石头城，感慨万千，借古寓今，写下了《满江红·登合州钓鱼台访余玠故城》：

“独钓中原，竟难遣怒涛声歇。扼东川卅年筹战，歔歔前烈。断础天池遗恨石，峭岩城堞伤心月。叹南风不竞死声多，何凄切。孤臣涕，终消雪。同仇忾，宁渐灭。赖鸿文椽笔，补苴亡缺。剑气犹张余玠胆，炮风空喋蒙哥血。剩寒蛩处处吊颓宫，讎危阙。”

余玠为南宋名臣。曾任四川安抚处置使。开府重庆，筑合州钓鱼城。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围攻合州，被炮火击伤死，故有“蒙哥血”一句。全词以追思余玠为主线，洋溢着悲壮的情绪，表白了自己愿效仿余玠，与日寇血战哪怕为国捐躯的决心。“剑气犹张余玠胆”与吴石的“孤心郁勃隐双剑”，都是军人在国家危难之际，一剑在手，责任在身，以诗言志，必胜顽敌！

#### 四、“奇险夔门”“沧桑可论”

三峡是自古文人墨客描绘长江诗画最多之处，何遂、吴石也不例外。《长江万里图》何遂在此着墨最多、最奇，也最为险峻、最为壮观，因为这里是通往四川的大门，战时陪都重庆的关隘。何遂在1963年夜泊白帝城时，有感“有若风云者，波浪盖天湧，千古不能扫。”于是作画夔门，题诗：

瞿塘峡八里，奇险在夔门。  
岩石如斧劈，尚留亿年痕。  
四川旧内海，沧桑若可论。  
内水与外水，劈开万山根。  
因此成奇景，请君看夔门。

画是当年《长江万里图》三峡的放大版，气势更加雄伟，因为“远游良多艰，壮心未能已”，十五岁留下的豪言壮语，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更显得悲壮。

吴石题写的诗句：

远览方知天地宽，心安蜀道未为难。  
香溪初望昭君里，险水又经崆岭滩。  
艘牒顺流飞鸟过，峰峦当路怒猊蟠。  
欲探何处闻猿峡，一为停舟着意看。

则尽显了这对军人将领的胸怀，对未来必胜的信念，险水峰峦，“心安蜀道未为难”，因为“远览方知天地宽”。同时也描绘了画中三峡险滩急流，峰峦盘旋的景象，观飞鸟闻猿声，着意停舟，道出了文人雅士的情怀。

1941年何遂迁居重庆，与立法院同仁在北碚筑屋，与文人画家交往频繁，在“擅壑专业之馆”（何遂1943年作画题图），即战时国画界同仁专业画室，开始创作《长江万里图》。

四川旧为蜀国，诸葛武侯是何遂心中的偶像，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更令他怀念这位名相。看定军山武侯墓图，一连作词三首，借古抒情：“大星（诸葛亮）仍未陨，终古有光芒”，“壮志依然在，不道禄千钟”，“手有横磨剑，行矣破黄龙”，“日暮吟梁甫（意为葬歌），宇宙共悠悠”。诸葛精神不死，千载风骨仍存，这也成为《长江万里图》川江段的主题。

吴石为此段题图呼应：

恕无俊语酬风物，如此江山处处幽。  
杰阁凌虚吞远势，孤城衔日入深秋。  
四峨隐约云中辨，三水飞腾峡里流。  
胜地故应人杰萃，摩挲往迹思悠悠。

两千年诸葛亮的精神不灭，“摩挲往迹思悠悠”，“胜地故应人杰萃”，蜀地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心，中华民族魂魄皆在川江段气势磅礴的山水之中！同时也描绘了画中有气吞长江的凌虚杰阁，深秋暮林的衔日孤城，云中隐约的峨眉山峦，峡里汇入的奔腾瀑布，一幅大好河山，怎能让敌寇染指。吴石与何遂生死之交的兄弟，他们的诗画也互为表里。

### 五、画卷重展“荡涤倭氛”

1943年，中日全面战争已进入第六个年头，但是中国再不是孤军奋战。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战时同盟，开辟了太平洋战场、中缅印战场，在中国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作为军人，何遂、吴石参加了三次长沙会议，吴石作为第四战区的参谋长，在前线作战，何遂则作为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在后方坚守。

“癸未（1943年）盛夏客贵阳，一晴十雨气候如秋，重展长江万里图，纷然往事都在心头，叠赠劬堂（何遂好友，著名学者柳诒徵）韵，再题此图。”何遂睹画思友，“系孤舟吊黄虞畔，天涯愁共人远。”尽管“笔端无尽豪游兴”，“可奈宫移羽换”。战乱的漂泊已成习惯，画中“看一派岷峨，江绕千峰乱”。

尽管战事频繁，但是文化活动不断，在桂林、川渝，以至1943年夏天居住在贵阳，何遂与各界文化学人交往，留下了许多诗赋绘画，有立法院的张维瀚、彭醇士、陈孝威，参议员钱永铭、章士钊，故宫的马衡，考试院的周钟岳，贵阳名家桂百铸，历史学家梁敬錞、诗人陈颂洛，图书版本大家柳诒徵，篆刻大师周哲文、林半觉，大画家徐悲鸿、马万里、高甜心等等文人墨客不一而足，其中交往最密切的好友，属吴石、缪秋杰也。何遂曾作词《水调歌头》曰：在漓江仿兰亭集会，聚四十余人，“陪都胜，名流集，发清讴。犹今视昔，千古天地一沙鸥。筹笔卧龙西蜀，磨剑屠鲸东海，烽火靖高楼。”继承光大中华传统文化，守土卫国抗击日寇是“戎马书生”的责任，也是“武胆文心”的彰显，两者实为一体。

何遂“廿八年（1939）年春偕次辰（军令部长徐永昌）却长绍戡参议游龙隐岩，见有于龙隐洞侧凿石作洞者，放翁（陆游）诗境刻石已罹此劫，行将及于宋三平蛮碑矣，次辰亟为言于健生主任而止之。三十年（1941年）三月重来桂林，半觉兄出示桂海碑目，知将于来月集全桂石刻拓本开会展览，属予为文记之。”这是何遂为篆刻家林半觉作《龙隐访碑图》写的后记，记述了为保护广西碑刻遗址的故事。林半觉时年32岁，与何遂相差19岁，为桂林政府文化科员，地位也颇悬殊，但为了保护桂林岩刻碑文，成为“忘年交”。林半觉耗时3年，将广西摩崖石刻拓片3000余幅，在湘桂大撤退时，抛家弃业而不舍拓片，保存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何遂在诗中夸奖：“护维文物独有卿，凿碑作石使人惊。即今桂海访碑录，平蛮三将永留名。”

另一位是北平图书馆馆员许国霖，因敦煌文献与何遂成为好友。许国霖一生从事敦煌遗书编目工作。

1943年在贵阳与何遂相识，“以所著《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及《敦煌杂录》见视，其治学之笃，不以乱离转徙而有小异，意极可感。予自劫后图书尽失，文献无征，仅能就记忆所及拉杂书之。”这是何遂写“校经图序”的开篇，完稿于9月6日。该文列出四点，对列强强夺敦煌文物、国内盗卖文物痛加谴责，随后又详细阐述了他对中华文物保护的五点意见。对于外国掠夺中华文物，他痛心疾首，“这于民族意识的消沉，真令人不寒而栗，可叹可恨”，“此可忍孰不可忍”。对于国内盗卖文物者，“尤其可恨”，“几千年来文物不幸而有这黑暗无比的遭际，真可算是中国民族史上万分不名誉的一页了。”他把这归结为“清季全面腐败史的缩影”。何遂的五点意见明确提出了禁止文物国际买卖，“古物国有”，通过外交途径收回流散国外的文物，国家设立“关于文化古迹的专管保存及研究机构”，“古物应专属中央，地方士绅及人民绝不许容喙”。在中日激战之时，仍对中国文物保护大声疾呼，尽管有商榷之处，今天读来，仍可见一颗中华赤子的拳拳之心。在文中何遂列举了他的收藏，“个人所搜集的即逾万件，分存于北平图书馆、中央研究院、上海博物馆，并为著录成书十六七种，‘八一三’后寄存于北平故宫博物院所建之南京朝天宫库中。且同时尚寄存有赠与青岛博物馆者八箱，内金石彝器及拓本刻板千余种，并记于此”。最后他身体力行，万余件文物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中秋至，倍思亲。吴石五十初度，何遂为挚友写下了《百家令》“对酒当歌”，为得是“一洗胸中块垒”，词曰：

“前身谓汝，恰中秋，明月人间能几。收拾乾坤归腕底，吾辈固应如是。多少英雄，古今人物，去去长江水。蓬莱清浅，望中澄澈无际。相与高唱分题，清谈据坐，莫问今何世。且尽平原旬日饮，侧耳羽书闻喜。荡涤倭氛，廓清禹域，方快平生意。老松仙鹤，一声横笛吹起。”

“荡涤倭氛，廓清禹域（中国别称）”是军人的天职；“多少英雄，古今人物，去去长江水”是两位景仰苏东坡，发文人之感叹及对《长江万里图》合作的怀念；“收拾乾坤归腕底，吾辈固应如是”，何遂与吴石重整祖国山河，彰显中华文化，挥洒赤子之血的壮志雄心跃然纸上。

何遂生前捐赠文物上万件，他大概不会想到去世55年后，他与吴石爷爷的诗画长卷《长江万里图》会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感谢中国国家博物馆，您们收藏的不仅是一幅诗画长卷，中国历史艰难光辉的一页，更是收下了两位爷爷对祖国大好河山的忠诚守护、对中华文化的无比热爱的赤子之心！

**（作者：何迪系何遂之孙；郑立系福州党史学者。2023年6月10日）**

# 有了 DHI，多产奶育好牛

冯建伟

奶牛生产性能测定（DHI），是对奶牛产奶性能和乳成分测定的一项技术，国际通常用奶牛群体改良（DairyHerdImprovement）的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DHI”来表示，说明生产性能测定是奶牛群体科学管理和遗传改良中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工作。

现如今逛超市，甭管规模大小，奶制品区都在最显著的位置。各种品牌的酸奶、牛奶等奶制品琳琅满目，加上商家的花样促销，一定会让您越挑越花眼。很多家庭还会专门订制鲜牛奶，每天加工好的鲜牛奶配送上门，打开即食，省时又方便。

把时间拉回到 20 世纪 80、90 年代，当时的中国城镇家庭要想让老人孩子喝上牛奶，要骑自行车自带瓶子，到城乡结合部的养殖户家里打牛奶，回家后煮沸晾凉才能喝。即便是在大城市里，居民通过牛奶公司订牛奶，也跟现在是两个概念，不可同日而语。

据 2019 年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统计，2018 年我国居民牛奶的人均占有量比 1996 年增长了 333.3%。

当牛奶已经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寻常食品，面对眼花缭乱的牛奶制品，您可曾想过，是什么原因让曾经“每天能喝一杯牛奶”由奢望变成现实？也许您会说，有了好牛就能产好牛奶。那么问题又来了，我们的好奶牛从哪儿来的呢？据国际公认的各技术因素对提高奶业生产效率的贡献率分析结果，良种和群体遗传改良技术的贡献率占 40% 以上。伴随奶牛群体遗传改良技术的发展，我国奶业在培育奶牛良种和持续进行选育提高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 DHI 是什么？

“2022 年，全国 1324 个奶牛场采集 162.9 万头奶牛、生产性能测定记录 840.7 万条……”这是一组来自中国奶牛数据中心的统计。串联起这组数据的关键词是奶牛生产性能测定，那么什么是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呢？

奶牛生产性能测定（DHI），是对奶牛产奶性能和乳成分测定的一项技术，国际通常用奶牛群体改良（DairyHerdImprovement）的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DHI”来表示，说明生产性能测定是奶牛群体科学管理和遗传改良中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工作。

其主要技术内容是，在奶牛个体每个泌乳月定期测量产奶量并采集牛奶样品，分析得到乳脂率、乳蛋白率、乳糖率、体细胞数等乳成分指标数据，同时根据奶牛个体测定数据进行分析 and 诊断，及时发现牧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进而通过科学管理实现奶牛生产水平的不断提升。通俗地讲，通过性能测定可以判断一头牛或一群牛健康的状况，还可以指导育种。

尽管我国养牛的历史悠久，但绝大多数牛品种均是缺乏乳用遗传素质的地方黄牛。我国乳用牛品种的培育工作仅能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一种毛色为黑白花的荷斯坦牛被引入我国以后，一方面在小范围内进行纯种繁育，另一方面为了扩大奶牛的数量，也进行杂交改良。在此基础上，又经过长时间的选育工作，逐步形成了特性表现一致、遗传稳定、生产性能高、适应性强的奶牛群。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科技工作者对 170 余头后备荷斯坦公牛进行了后裔生产性能测定，探索了当年美国使用的“同期同龄牛比较法”“同群牛比较法”和“改进同期同龄牛比较法”等方法估计性状育种值，借用美国的奶牛总性能指数 TPI (TotalPerformanceIndex) 公式，将产奶量、乳脂率及体型外貌评分 3 项性状育种值合并为 TPI 指数，按测定公牛的 TPI 指数排队，选留了 60 余头育种验证公牛，这在我国奶牛育种技术发展过程中是一次重大进步。

1984 年，“中国黑白花奶牛”新品种育成并通过国家审定。1992 年“中国黑白花奶牛”更名为“中国荷斯坦牛”。在中国荷斯坦牛刚育成的十年间，各地为了扩大奶牛群体数量走了不少弯路，1992 年，我国开始推进 DHI 技术应用，成立全国 DHI 工作委员会，制定《中国荷斯坦奶牛生产性能测定》行业标准，成立“中国奶牛数据处理中心”，并逐步建立了完备的检测实验室。2008 年，国家又发布实施《中国奶牛群体遗传改良计划（2008-2020 年）》，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推广 DHI 工作。

近些年来，我国科技工作者总结出一套奶牛群体的遗传育种改良技术体系，在牛群中实施准确规范的生产性能测定和体型鉴定，组织大规模的青年公牛进行基因组选择和后裔测定，并经过科学严谨的遗传评定技术选育优秀种公牛，然后广泛地应用人工授精技术将优秀的遗传物质推广到全体牛群，全面改进牛群的生产性能。

“有测定才能有数据，有数据才能管理，有管理才能提高。”中国农业大学张沅教授认为，DHI 数据能更好地为育种提供依据、为技术服务提供支持。由此可见，DHI 作为奶牛群体遗传改良工作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直接影响群体遗传改良进展的总体水平。

据中国奶牛数据中心统计，2008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奶牛生产性能测定以来，全国建立起专用于 DHI 相关牛奶、饲料、疾病检测的专业实验室由项目实施前的 7 家增加到 39 家，测定范围覆盖全国。实验室总面积达 8832 平方米，配备了世界先进水平的乳成分分析仪、流量计校正仪、全自动检测机器人等先进大型检测设备 66 台套，年检测能力达到 200 万头以上。

### **仅凭检测奶，能判断奶牛好坏？**

“我是 1997 年开始接触奶牛生产性能测定……”隆鑫奶牛养殖场负责人李学钦回忆起那次放弃了同学聚会从河南洛阳跑到陕西西安参加的培训，至今仍觉得那是一次十分正确的选择。

李学钦的奶牛养殖场位于洛阳市偃师区高龙镇逯寨村，养殖规模不大，只有 700 多头牛，但“隆鑫”却凭借着奶牛品质好、产量高的优势在河南奶牛圈内小有名气。

1997 年，由原农业部组织，中加奶牛育种综合项目在西安开展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培训。李学钦满怀疑惑参加了那次培训。“那时候采样还是人工挤奶，当时觉得很神奇，通过检测奶就能判断一头奶牛的好坏？”为了那次培训，他放弃了大学同学毕业 10 年聚会。

从那时起，李学钦就开始参加奶牛生产性能测定项目，他连续三年邀请国外专家到他的养殖场进行

技术指导。“当时我场的牛奶产量很低，每头牛每天产奶 15 公斤，年产三四吨算高产奶牛。”这些年来，他们每个月定期给河南省奶牛生产性能测定中心（以下简称：河南 DHI）送检测样本，系统性连续性的检测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在他办公室门上，贴着一张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常用指标表，他经常站在对照表前查询对比指标变化，“通过大数据来指导日常生产和改良繁育，不然没有参考值，全凭经验可不行。”

经过多年的选种选配改良，隆鑫奶牛的平均产量已经达到 40 公斤/天，年产量 12 吨。“过去民间就有相牛经相马经，现在最可靠的就是性能测定。”李学钦认为，持续实施生产性能测定和性状改良，他的奶牛产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今年 5 月中旬，河南 DHI 发布了《2022 年河南省荷斯坦牛品种登记的联合公告》。公告中，他们依据奶牛系谱完整度、牧场和奶牛个体年均 305 天产奶量、奶牛体型外貌鉴定等条件，从全省去年新增登记的 84098 头奶牛和跟踪登记的 114758 头奶牛中，筛选出 9314 头优质母牛作为核心群并向社会推荐。

“我们有 137 头奶牛入选省里选的核心群。”李学钦对这个成绩非常满意。“母牛入选核心群，再采用优质冻精配种，生下的小牛产奶量高、价格好。”

成立于 2008 年的河南 DHI，是一家集奶牛良种登记、生产性能测定、后裔测定、遗传评估、生鲜乳质量监测、营养分析、疾病检测、遗传物质检测和牧场信息管理等为一体的区域奶业服务机构，是国内首家、省内唯一通过农业农村部现场评审认证的 DHI 测定实验室。

“要养好奶牛、产好奶，就要摸清、掌握牛群和育种状况的全部家底！”河南省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河南省种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河南 DHI 负责人张震博士说，从 2016 年至今，河南 DHI 已累计完成 337 个奶牛场 35.16 万头奶牛的生产性能测定任务，测定样品 581.84 万个，出具报告近万份以上。据中国奶业协会统计，河南省奶牛 DHI 参测比例达到 54.5%，在全国奶业主产省中名列前茅。

经过 10 年时间，河南 DHI 建立了完善的测定体系、数据采集体系和品种登记体系，摸清了河南省牛群和育种状况的全部家底。2022 年 12 月底，河南 DHI 已经建成了“河南奶牛综合数据服务平台系统”，共累积了 484243 头奶牛的系谱、体型外貌鉴定、照片等数据，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省级奶牛品种登记平台。

不仅河南省摸清了奶牛生产性能的情况，全国奶牛生产性能也实现有数据可查。30 多年来，我国累计有 3720 个奶牛场、557 万头牛参加测定，积累了大量的奶牛性能数据。借助积累的奶牛生产性能数据，2008 年我国开始了首次奶牛自主遗传评估，坚持至今，累计为行业推荐优秀种公牛达 3000 余头，为我国奶牛自主育种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关键的物质基础。

### **奶牛体形外貌好，能多产奶？**

“养殖场从 2015 年投产就跟河南 DHI 开展紧密合作。我们每月定期采样进行各项检测，再根据检测报告调整养殖管理。”河南花花牛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世坤对 DHI 检测报告的应用可谓驾轻就熟，他认为有基础数据做支撑，比凭经验找感觉更精准。

王世坤负责的公司前身是河南省奶牛繁育中心，是首批十家国家级核心育种场之一。在公司的养殖场里，一头头体型健硕的荷斯坦奶牛悠闲地在圈舍里吃着饲草，到了挤奶时间就有序地排队前往挤奶大



斤挤奶，年产优质原料奶 2.65 万吨。

公司奶牛的耳朵上都戴着专属的 15 位数的身份信息耳标，脖子上挂着蓝色的智能监测项圈，每一头牛的运动规律、采食实况、泌乳情况、休息数据、什么时候发情等信息都及时反馈到技术员手机上。

“奶牛养殖不同于肉牛，牛奶是奶牛怀孕后生产的产物，所以奶牛是否怀孕对养殖场有重大意义，技术员最关注的就是母牛项圈上检测到的发情数据。”王世坤算过一笔账，奶牛空怀多喂养一天成本就会增加 16-32 元，多喂养一个 21 天的发情周期，成本增加 330-670 元，同时多喂养的发情期内奶产量相对减少 60 公斤。

为了增加效益，王世坤采用了早孕快速检测技术，在奶牛配种第 21 天便能采样进行早孕检测，较常规 B 超检测时间缩短 10 天左右，大大提前了检测时间，节约养殖成本。凭此一项技术，河南 DHI 去年在全省进行早孕检测共计 52273 份头，识别空怀母牛 18050 头，显著提升了参测牧场的繁殖效率和牛奶产量。

“我国传统的相牛经就是对牛体型外貌评定的应用，属于经验型方法。奶牛体型结构好，个头高，乳房结构好，后尻宽度好，这些跟产奶量、长寿性和机械化操作等都有关系。”长期从事奶牛体型外貌的鉴定的闫跃飞是国家级奶牛体型外貌鉴定员，只有经过他鉴定出来的奶牛体型外貌数据，国家育种中心才认可。像他这样有奶牛体型外貌鉴定资质的鉴定员，全省只有 8 个人。

“从优生优育的角度讲，奶牛体型外貌好，产奶量才会高。”王世坤非常认同闫跃飞的观点，前些年，他们从国外引进的奶牛普遍存在背腰凹、尻宽不够等问题，奶牛容易出现难产、产奶率低等问题。经过这些年的持续改良，这些不良性状都已经得到很大改善，奶牛产奶率也不断提升。

为了把好乳品安全的第一道关，河南 DHI 从 2012 年开始牵头，建设了河南省生鲜乳质量安全检测数据平台，研发了奶牛疾病检测预警与诊断系统，实现涵盖奶站、运输车辆、收购站和生鲜乳第三方检测等全链条的生鲜乳检测全过程信息化。

目前，河南 DHI 先后承担了农业农村部、郑州、新乡等地的生鲜乳第三方检测等任务，共完成生鲜乳检测 7080 批次。河南省参测奶牛日产奶量、305 天产奶量、乳脂率、乳蛋白率和体细胞数分别是 33.63 公斤、9700.81 公斤、4.04%、3.31%和 21.06 万个/毫升，生鲜乳质量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到 2022 年，河南全省连续参测 8 年以上奶牛场平均单产突破 10 吨，平均乳蛋白、乳脂率和体细胞等指标超过欧盟标准。

### **用 DHI 指导育牛，能多卖 2000 元？**

花花牛畜牧科技公司在奶牛去往挤奶厅的通道上安装了体型智能测定设备，奶牛在通道上顺序站上智能测定设备，只需要等待 15 秒，就能测定出奶牛的体重、体高、胸围、胸深等多个数据。以前两人一组人工测量一天最多能测 80 头牛，效率远远低于信息化设备。“每头牛都要在 2 岁前进行至少 6 次的体型测定，以确保能及时筛选保留优质种牛，淘汰不符合要求的牛。”王世坤认为，河南 DHI 每次检测后提供的关于奶牛营养、育种、疫病等技术服务和数据支持，对公司科学管理帮助很大。

“我们将测定的生鲜乳理化指标、繁殖指标和健康指标直接反馈给牛场，为饲养管理、选种选配、经济效益分析等提供动态依据，引导他们运用 DHI 报告指导生产，通过信息化精细化的管理，实现科学

高效养殖。”河南 DHI 闫磊博士说。

“选牛首先看产奶量，牛的后驱发育要好、肢体要强健，还要尽可能长寿。”李学钦选公牛有自己的秘诀。近些年来，他不断根据 DHI 的性能测定数据调整改良选种选配方向。牛场里目前最早的奶牛是 2012 年的，每天还能产 30 公斤牛奶，还有两头 2014 年的奶牛，泌乳期的第 5 天就能产奶 41.3 公斤，产后 60 天达到产奶高峰期，每天产奶 50 公斤以上。“我们的奶牛平均利用胎次 3 胎，超过河南省奶牛 2.3 胎的平均值。”

根据 DHI 的性能指标给每一头牛制定了育种方案，对每头牛综合性状进行改善是王世坤的成功经验。他们的牛三代系谱非常完整，养殖投产以来，已经卖出优质母牛 1000 余头，遍布内蒙古、宁夏、新疆、山西等地。

先后两次购买花花牛畜牧科技公司 50 多头优质奶牛的河南绿源奶业，今年还打算再买几十头他家的奶牛。“他的母牛产奶量高，平均在 30 公斤以上，价格比普通奶牛能贵 2000 元，但买回来 2 个月左右就下牛犊，而且 90%是母牛。”绿源奶业负责人贾香莲说。

DHI 数据的全面性和多样性，是牧场生产管理的重要借鉴依据。河南 DHI 通过整合 DHI 检测结果和牧场数据，可以分析和判断牧场管理和牛群中存在的问题，成为新型牧场管理工具。新乡市畜牧技术推广站李焦魏表示，河南 DHI 推广的一系列检验检测服务提升了基层养殖效率，特别是疾病检测服务让兽医告别了凭经验治病，为养殖户节约了养殖成本，还实现了养殖减抗的目标。

自河南奶牛 DHI 检测项目开展以来，参测牛场从 DHI 技术的应用中获得了良好的效益，奶牛场生产管理和技术指标也都有明显的提高。“十三五”期间，河南 DHI 累计完成各类常见病检测 32386 头（份），为牧场节约成本 1619.3 万元。特别是最近 5 年，河南 DHI 累计完成 321 个奶牛参测场的 34.22 万头奶牛测定工作，测定规模达到 389.16 万个奶牛样品。

### **高产奶牛基因如何选择？**

“一头小牛将来能不能生产高质量冻精？母牛未来能不能高产奶？现在可以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来判断。如果没有高产奶的基因，就可以作为商品牛育肥。”王世坤负责的养殖场，已经告别了传统检验种公牛的办法，传统办法需要 5 年时间来验证，现在依托连续积累的 DHI 的基础数据，通过基因组检测和评估，准确率能达到 75%以上。

去年底，王世坤采取超排培育移植技术，选育了 40 枚优质胚胎。过去采用进口胚胎移植产下的好牛成本要 5 万多元。现在有了自己的优质良种，成本降低到 2000 元左右，效益显而易见。

要快速扩大良种奶牛的种群，就要迅速扩繁。要实现迅速扩繁，就要建立具备国际竞争力自主奶牛种质评价机制，DHI 是奶牛群体遗传改良的基础性工作，是我国奶牛自主育种体系建设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应用基因组选择技术可实现青年公牛早期准确选择，大幅度缩短世代间隔，加快群体遗传进展，目前基因组选择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朱化彬研究员认为，规模奶牛场育种特点不是培育新品种，而是选择、强化需要的目标性状，培育生产需求的奶牛群，选择优秀种公牛和选留母牛，组建核心育种牛群，可依据系谱和生产性能把牛群分为核心群、生产群和淘汰群。

在原农业部的支持下，自2008年起，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沅、张勤团队承担了中国荷斯坦牛基因组选择技术平台的研发。“基因组选择的首要工作是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参考群体，用于估计基因组中每个标记对目标性状的遗传效应，建立基因组育种值预测方程。”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孙东晓表示，我国从2006年开始组建参考群体，经过持续扩充，至2022年底，群体规模达到了1.7万头，测定了所有牛只的产奶、健康、体型、繁殖等性状的表型记录，并利用高密度SNP芯片测定了标记基因型。

“通过基因组检测筛选更好的牛，建立我们自己的核心群，再通过胚胎移植办法快速扩繁，有了这些基础才能扩大种群，有了DHI的数据支撑，大家才相信牛的质量好。”张震认为，虽然我国已经建立自己的参考群，但是相比发达国家，还存在基础数据少、准确性差等问题。作为育种人，我们要牢牢掌握话语权，减少对进口的依赖。”

2020年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和全国畜牧总站启动了“奶牛基因组选择参考群体建设项目”，并同步开展了新增牛只的系谱、DHI和体型外貌等育种数据的第三方核查项目。一方面通过大规模、高质量的奶牛参考群体基因组组建，进一步完善我国奶牛基因组选择技术平台，提高我国荷斯坦公牛基因组遗传评估的准确性、可靠性；另一方面，在扩容参考群规模的同时，更加注重了参考群质量的管控。

2021年4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印发新一轮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的通知》和《全国奶牛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年》，作为国家层面启动的第二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其中，奶牛聚焦主导品种，创新联合育种机制，扩大生产性能测定规模，完善奶牛基因组选择技术平台。

从2022年起，河南DHI在全省范围内选取10个牧场对奶牛进行遗传性能评估，在去年已筛选出9314头奶牛的基础上，今年再筛选出8000头的繁育群，从繁育群中选择4000头作为育种核心群，再优中选优从育种核心群中选择500头作为种质母牛群，为种公牛自主培育工作奠定基础。在连续开展全省品种登记和遗传评估工作以来，河南省奶牛群的各类表型性状和数据库建设逐步扩大，而且越来越完善。

目前，我国奶牛常规和基因组遗传评估技术平台已经实现青年公牛基因组检测全覆盖，每年定期发布《中国乳用种公牛遗传评估概要》为奶牛良种选育提供了详实数据。

不久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传来喜讯，他们选育的一头荷斯坦种公牛基因组综合选择指数（TPI）高达3118，为国内TPI值率先突破3100的优秀后备种公牛。这头优质种公牛的选育成功，证明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以奶牛品种登记、生产性能测定、体型鉴定、公牛后裔测定、种牛遗传评定、基因组选择等为主要内容建立了中国奶牛育种技术，为客观评价乳用种公牛遗传品质提供了保障。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2023年5月23日）**

# 光皮楝木果食用油项目简介

胡益文 姚 军

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68）号文中指出：“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量持续增长，需求缺口不断扩大，对外依存度明显上升，食用植物油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文件为进一步加快我国木本油料产业发展，大力增加健康优质食用植物油供给，切实维护国家粮油安全，指明了发展方向。

## 一、发展光皮楝木果油的必要性

### 1. 光皮楝木（引用自中国植物志）

落叶乔木，高5-18米；树皮灰色至青灰色，块状剥落；幼枝灰绿色，略具4棱，被灰色平贴短柔毛，小枝圆柱形，深绿色，老时棕褐色，无毛，具黄褐色长圆形皮孔。冬芽长圆锥形，长3-6毫米，密被灰白色平贴短柔毛。叶对生，纸质，椭圆形或卵状椭圆形，长6-12厘米，宽2-5.5厘米，先端渐尖或突尖，基部楔形或宽楔形，边缘波状，微反卷，上面深绿色，有散生平贴短柔毛，下面灰绿色，密被白色乳头状突起及平贴短柔毛，主脉在上面稍显明，下面凸出，侧脉3-4对，弓形内弯，在上面稍显明，下面微凸起；叶柄细圆柱形，长0.8-2厘米，幼时密被灰白色短柔毛，老后近于无毛，上面有浅沟，下面圆形。顶生圆锥状聚伞花序，宽6-10厘米，被灰白色疏柔毛；总花梗细圆柱形，长2-3厘米，被平贴短柔毛；花小，白色，直径约7毫米；花萼裂片4，三角形，长约0.4-0.5毫米，长于花盘，外侧被白色短柔毛；花瓣4，长披针形，长约5毫米，上面无毛，下面密被灰白色平贴短柔毛；雄蕊4，长6.2-6.8毫米，花丝线形，长5毫米，与花瓣近于等长，无毛，花药线状长圆形，黄色，长约2毫米，丁字形着生；花盘垫状，无毛；花柱圆柱形，有时上部稍粗壮，长3.5-4毫米，稀被贴生短柔毛，柱头小，头状，子房下位，花托倒圆锥形，直径约1毫米，密被灰色平贴短柔毛。核果球形，直径6-7毫米，成熟时紫黑色至黑色，被平贴短柔毛或近于无毛；核骨质，球形，直径4-4.5毫米，肋纹不显明。花期5月；果期10-11月。

产陕西、甘肃、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省区。生于海拔130-1130米的森林中。模式标本采自湖北西部。

本种是一种木本油料植物，果肉和种仁均含有较多的油脂，用土法榨油，出油率为30%左右，其油的脂肪酸组成以亚油酸及油酸为主，食用价值较高；叶作饲料，牲畜特别爱吃，又为良好的绿肥原料；木材坚硬，纹理致密而美观，为家具及农具的良好用材；树形美观，寿命较长，为良好的绿化树种。

### 2. 光皮楝木果树是目前已知产量最高的木本食用油树种

据于都县志记载：光皮楝木树在于都县宽田乡已有3000多年生长历史，光皮楝木果树“成年树每株可产鲜果100余公斤，榨油20余公斤，**产果期长达200余年。**”（附件2：于都县单株产果300斤的光皮楝木果树）

我公司和江西省林科院对2000株光皮楝木树产果实测结果，每株产鲜果在150斤左右，如果不做矮化处理（株高10-12米），每亩按种植35株计算，亩产鲜果将在2500公斤以上，可产油500公斤以

上。

人工种植的光皮楸木树：湖南林科院在山地种植的光皮楸木树已经结果实，6年生（丰产期应为10-12年）、株高不超过2.5米的光皮楸木树测产，结果每亩产鲜果625-681公斤，进入丰产期后产量至少在1500斤以上，产油300斤以上。（附件3：湖南林科院测产报告）

在已知的木本食用油树种中，光皮楸木果树是产量最高的。

### 3. 光皮楸木果树适种区域广

植物志记载：光皮楸木树产：陕西、甘肃、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省区。生于海拔130-1130米的森林中。我公司的适种验证在黄河以南的地区都可种植。而且，光皮楸木树到了北方，演变为“光皮毛楸”，光皮毛楸可在辽宁以南种植，可见楸木油可在我国大部地区种植，种植光皮楸木树不缺土地。

光皮楸木树适宜大规模种植，并可在贫瘠土壤种植，包括石灰岩土地等。

### 4. 光皮楸木果油食用安全

在江西省于都县，山区农户有200多年的食用光皮楸木油的历史，在赣州的其他地区，也有食用光皮楸木油的记载，因此食用历史证明食用光皮楸木油是安全的，为了保证新食用油的食用安全，我们用了3年多的时间，按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要求，对涉及光皮楸木果食用油食品安全的各个方面做了全面的检测、分析、论证，各项指标证实，食用光皮楸木果油是安全的，2013年12月，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光皮楸木果油为我国的新食用原料，光皮楸木果食用油项目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阶段。（附件4：国家卫生计划委员会新食品原料批复）

### 5. 光皮楸木果树是石漠化改造的好树种

光皮楸木树不仅仅可以在中性和弱酸性的山地种植，也可以在碱性土壤种植，在于都县，有很多野生光皮楸木树分布在石灰岩山地上，长势很好。江西省林业厅在修水县的中度石漠化山地的石漠化改造项目中，试种了2000多亩光皮楸木树，目前2000多亩石漠化山地的植被已经得到完全恢复。广西德保县、湖南龙山县在石漠化改造中都选种过光皮楸木树，现在长势都很好。

每年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贵州、云南、广西等省的石漠化改造，效果不是很好，究其原因主要是石漠化改造资金本身缺口就很大，没有能够在石灰岩山地种植的好的树种，经济效益无法体现，后续管理资金根本无法保证。光皮楸木果树可以在石灰岩山地种植，经济效益很高，如果能够利用石漠化改造资金，在石灰岩山地种植光皮楸木树，将很好的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融合，也将根除边改造边砍伐的问题。

### 6. 种植光皮楸木树与乡村振兴

2021年我国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法”，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得到了各级政府支持，于都的情况证实，房前屋后种植的光皮楸木树由于采摘方便无需矮化，因此单株产量在200斤左右，如果在每户房前屋后种植50株光皮楸木树，进入丰产期后，可产鲜果10000斤，收益2万元（目前收购价格2元/斤），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产业振兴好项目，于都县宽田乡2021年春在李屋村“五美乡村”建设中，在房前屋后及路边种植了2000多棵楸木果树，已经显现绿化美化效果，估计明后年经济效果也将体现。

## 二、光皮楸木果食用油和其他油种的比较

### 1. 光皮楸木果食用油品质的比较

果肉及种子富含油脂，可供食用及药用，是主要的木本油料树种。油脂主要含C16和C18脂肪酸，

其中亚油酸含量近 50%，亚油酸有显著降低胆固醇，防治血管硬化和预防冠心病的作用。光皮树果实精炼油经国家粮食部鉴定为一级食用油。（附件 5：江西医药关于食用楸木油降血脂的论文）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光皮树干果含油率 33%-36%，出油率 25%-30%。

其油富含人体所必需的脂肪酸，**食用价值高于豆油和花生油，为一级优质食用油**，长期食用治疗高血脂症有效率达 93.3%，其中降低胆固醇的有效率达 100.0%。

光皮树油脂主要成分为月桂酸、肉豆蔻酸、棕榈酸、硬脂酸、油酸、芥酸、亚油酸、亚麻酸等。纯的油酸钠可用于治疗胆石症；大量的科学研究证明，共轭亚油酸具有抗肿瘤、抗氧化、降低动物和人体胆固醇以及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抗动脉粥样硬化、提高免疫力、提高骨骼密度、防治糖尿病等多种重要生理功能，还可以降低动物和人体脂肪、增加肌肉等。

（以上摘自《光皮树研究进展》江西农业大学园林与艺术学院：谢凤、潘斌林、胡松竹、胡冬南）

油脂主要含 C16 和 C18 脂肪酸，其中亚油酸含量近 50%，亚油酸有显著降低胆固醇，防治血管硬化和预防冠心病的作用。

（以上摘自《对大力发展光皮树的几点思考》赣州市林业局）

2017 年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对光皮楸木果食用油的品质做了全面分析，《分析报告》指出**光皮楸木果食用油甾醇维生素 E 等微量元素含量比较高楸木油的品质可“媲美橄榄油优于山茶籽油”**。

## 2. 光皮楸木树产量与其他木本油种的比较

在已知的木本食用油树种中，光皮楸木果树是产量最高的。并且产果期长达 200 余年。

人工山地种植的光皮楸木树：每亩产食用油 200 斤以上（房前屋后不矮化产量更高）。

油茶产量：正常情况山茶油每亩产食用油仅 30 公斤左右。

## 三、光皮楸木果食用油研发历程

1、2007 年-2008 年和南京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湖南林业科学研究院等专家，在安徽和县，试种多种木本食用油树种，经选择最终确定光皮楸木果食用油为的研发重点；

2、2008 年-2009 年针对土法生产对楸木油口感和色泽问题，研究试制了国内第一条工业化光皮楸木果食用油生产线；

3、2009 年生产了国内第一批符合国家食用油标准光皮楸木果食用油；

4、2010 年 2 月根据研究成果，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报发明专利，2011 年 12 月批准授权；2011 年根据光皮楸木果食用油的研究成果，向当时的卫生部“申报新资源食品”；

5、2011 年至 2013 年配合卫生部对光皮楸木果食用油的食用安全、食用历史、各种指标，租赁、作了广泛的研究；

6、2012 年 6 月成立了于都中和光皮树开发有限公司，开始林光皮楸木树嫁接苗扦插苗的研究，在于都建设了一个年产 50 万的苗圃；（附件 6：光皮楸木果树苗木培育基地）

7、2012 年和于都县政府签订了开发光皮楸木果食用油合同；

8、2013 年 12 月 4 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光皮楸木果食用油为我国的新食品原料；

9、2013 年光皮楸木果树扦插苗技术取得突破，成活率达到 70%以上，在国内达到领先水平；

10、2013 年至 2015 年，流转了近 4 万亩林地，开始了人工种植光皮楸木果树的试验；

11、2015 年初，在于都县人工种植的光皮楸木果树结果；

12、2015 年 4 月，国内第一份光皮楸木果食用油标准在江西省卫生厅备案；

13、2015 年 12 月，国内第一个光皮楸木果食用油加工厂及办公楼在于都县宽田乡建成；

14、2016年3月，于都中和光皮树开发有限公司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到了国内第一份**光皮柃木果食用油生产许可证**；（附件9：生产许可证）

15、2016年7月于都县标准最高的现代化钢化玻璃恒温育苗棚建成预计2017年后，公司可年产200万株光皮柃木果树苗；

16、累计2016年前在于都县建设了2个苗圃，可年供200万株光皮柃木果树苗，种植了1万多亩光皮柃木树；

17、2017年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受国家粮食局委托，对柃木果食用油做了全面分析，结论“**柃木果食用油可以媲美橄榄油，优于山茶籽油**”；

18、2017年11月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于都柃木油**”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9、2017年11月，江西省林业局批准于都中和光皮树开发有限公司**万江西省林业龙头企业**；

20、2018年10月产品通过“**有机食品**”认证；

21、2018年12月，企业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22、2019年12月柃木果食用油认定为“**江西省名牌产品**”；

23、2019年12月，国家林草局认证企业为“**国家林业科技创新企业**”；

24、2020年元月成功地提炼出花青素；

25、2020年元月陈健民被评为“**江西最美林业人**”；

26、2020年9月在江西省双创比赛中，获得江西省双创比赛**二等奖**；

27、2020年12月国家林草局聘陈健民为国家林草局“**林草乡土专家**”；

28、2021年企业被评为江西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9、2023年以线下体验为主的实体店在于都县开业，以线上直播为主的直播基地，在广州开始运营，和有关企业合作正在研发以治疗三高及糖尿病为主的柃木果荞麦饼干、于都柃木油无糖凝胶糖果。

#### 四、于都中和光皮树开发有限公司目前情况

目前在于都，已经种植了1.45万亩柃木果树，部分已经结果，连续6年在于都县收购柃木果实，为于都县农户带来了几百万收入，成立了二个专业合作社，惠及15个乡镇数千农户。

每年生产的2-5万斤柃木果食用油销售一空，产业发展前景很好。目前公司又完成了柃木果实深加工的研究，现在公司产品不仅仅有柃木果食用油，还有柃木果花青素去屑洗发水、柃木果花青素沐浴露、花青素祛痘面膜，品牌已经有了一些影响，为了完成品牌建设，公司和深圳互联网企业合作，正在建设企业全网数字销售系统，为了使企业的发展惠及农户，今年公司柃木果实收购价格从2.0元提高到2.5元/斤，农户种植柃木果树的积极性将进一步提高。

2022年公司正在和政府配合实施柃木果树种植乡村振兴项目，计划利用乡村路旁沟边、房前屋后种植柃木果树，这样在不占用农田的情况下，为每个农户种植50株柃木果树，预计一个500户的乡村，按照进入丰产期每株柃木果树产果200斤、每斤收购价格2.5元计算，可增加收入1250万元，项目完成后，乡村美了（绿化效果），农户收入提高了（户均增加收入2.5万元），工厂解决了原料问题，国家提高了食用油自给率。

（作者：国际生态发展联盟广州代表，单位：于都中和光皮树开发有限公司。2023年1月18日）

---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农村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及各研究所  
发：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

总 顾 问：刘 坚 郭书田

副 主 编：辛 梅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www.moagov.cn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石 卉

邮 编：100125 100810

电 话：010—59195293 66117652

010—66067899 66167899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